

全球化译丛



Property for People, Not for Profit :

Alternatives to the global
tyranny of capital

资本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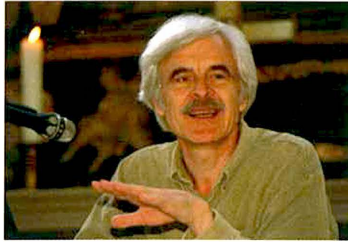
产权为民，不为利

[德] 乌尔里希·杜赫罗 著

[德] 弗朗兹·J. 欣克拉麦特

Ulrich Duchrow & Franz J. Hinkelammer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乌尔里希·杜赫罗 出生于1935年6月13日。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教授。曾在蒂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苏黎世大学、巴塞尔大学和巴黎大学从事神学和哲学研究。曾任海德堡跨领域新教研究所研究员（神学-哲学研究、和平研究等等）、日内瓦路德教会世界联盟研究部主任、日内瓦博西基督教协会客座教授、普世基督教协会顾问。

弗朗兹·J. 欣克拉麦特 1931年1月12日出生于德国埃姆斯代滕。现为哥斯达黎加埃雷迪亚国立大学教授。曾任圣地亚哥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社会学教授、圣地亚哥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研究所主任、圣地亚哥智利天主教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促进基督教团结研究部教授兼研究员。

全球化译丛

资本全球化 产权为民，不为利

**Property for People, Alternatives to the global
Not for Profit: tyranny of capital**

〔德〕 乌尔里希·杜赫罗 著

〔德〕 弗朗兹·J. 欣克拉麦特

Ulrich Duchrow & Franz J. Hinkelammert

倪延硕 肖 炼 译

肖 炼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opyright © Ulrich Duchrow and Franz J. Hinkelammert

Property for People, Not for Profit: Alternatives to the global tyranny of capital

Published by Zed Books Ltd, 2004

本书根据齐德书籍有限公司 2004 年版译出。

目 录

序 言	(1)
中文版前言	(1)
墨西哥学者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	(1)
导 语	(1)
第一章 绝对产权是产生贫困、债务和奴役的根源 ——产权经济在古代的起源和圣经选择	(1)
第二章 人对人是狼 ——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所有制市场的 出现	(42)
第三章 约翰·洛克 ——在资本主义产权名义下的人权倒置 ...	(64)

第四章 全球市场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取消维持生命的
承诺 (119)

第五章 世贸双塔的坍塌

——通过绝对帝国贯彻整体市场 (170)

**第六章 需要增长的是增强生命的产品，而不是
资本主义产权**

——拉丁美洲更新的从属关系理论 (225)

第七章 另一种可能的世界

——从生命和公共利益的角度自下而上地
重新建立所有权制度 (250)

第八章 上帝？还是财神？

——在社会运动环境下基督教组织的
忏悔 (331)

附录一 (365)

附录二 (369)

序 言

2005年1月26~31日，受世界教会会议和巴西教会会议邀请，我参加了在巴西阿雷格里举行的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在论坛上，我又一次遇见德国朋友——德国海德尔堡大学教授乌尔里希·杜赫罗（Ulrich Duchrow）。其间，我们对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学术交流。上一次，我们两人的交流是在2003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当时，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问题。这一次，我们专门讨论产权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两人参加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讲演的万人大会前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乌尔里希认为，“产权私有化不能解决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产权私有化的结果导致私人产权的扩张和公共产品的退化。要通过社会

资本的控制来制约资本积累为少数人牟利，避免公共产品成为私人产权牟利的特权。私人资本积累扩大并不等于实际投资的扩大，不断积累的产权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外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私人产权通过逃税而追求利润最大化，如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Daimler Chrysler）竟然 10 年没纳税。中国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要避免和控制资本虚胀，因为，这种资本虚胀并没有真正扩大国内经济基础。如果不控制资本的虚胀，将引起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和生态失衡，将引起分化并导致类似拉丁美洲的社会分裂。只要中国能够控制产权私有化，控制产权为少数人牟利，控制资本投机和外流，使产权为人民服务，就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

乌尔里希还认为，中国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就是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中具有很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像中国这样把 13 亿人口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如果中国能够加强与南半球国家的合作，将赢得世界的主要市场，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正在走下坡路。

同时，乌尔里希还从产权的角度分析了集权和民主的关系。他认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主以及民主的起源。世界的民主首先起源于古希腊，当时规定是私有

产权的民主，而没有私有产权以外的民主；18世纪英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建立了议会民主，但没有工人的民主，没有妇女的民主，从而导致了世界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现代民主产生于1929年，它给了老百姓政治投票的民主，却没有赋予其经济民主。因此，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全的民主，中国不要轻信西方的民主宣传，如果中国能够吸取西方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获得比西方更大的民主。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要确保法制的透明度，用法制和透明度来制约执政党的行为。（2）防止传媒被资本所控制，防止传媒被垄断。（3）任何一个民主的参与者不能控制其他的参与者，不能发生垄断行为。

乌尔里希告诉我，他的基本观点都囊括在《资本全球化——产权为民，不为利》这本新书之中。这就引起了我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我把书中的基本观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做了汇报，并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5年第7期做了介绍。在此，我也十分感谢社科院领导和社科院办公厅主任黄晓勇对本书在翻译、出版和发行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静女士的帮助，使本书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本书的译者是我的朋友，《北京周报》的英文

记者兼编辑倪延硕先生。在此，我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增光添彩。最后，我还要感谢王云志女士对本书所做的文字校对工作。

乌尔里希·杜赫罗和弗朗兹·欣克拉麦特合著的《资本全球化——产权为民，不为利》一书，是关于制度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的新著。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产权处于经济系统的中心位置，这使得利益能够被随意最大化而不重视人类的生存和自然的完整性。其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并不是和人们的使用价值相联系，而是和产权所有者进行的无限制金钱资产积累的交换价值相联系。”“以生命为中心的道德把公共利益作为指导性价值观，并寻求促进人类社会生命的延续与自然生命周期的和谐共存。这样，它就成为了改变我们当前以产权为资本的市场社会的标准。”本书正是抓住了这一探索的中心环节，强调“所有形式的产权，从个人产权到经济生命最本质因素的所有权，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水和空气以及知识和金钱，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要从生命和共同利益的角度自下而上地重新建立产权秩序。”本书把重点放到了改变产权观念的重要性上，加强了论述的深度，并为道德评判提供了本质上的标准。本书强有力地驳斥了新自由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施加

强制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驳斥了认为没有可以代替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的论断。

令人高兴的是，在完成本书的中文翻译后，作者还应我的要求，撰写了针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前言。他们所提出的宝贵建议，对当前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在此，我深表感谢。

肖 炼

2005 年 8 月

中文版前言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著作《资本全球化——产权为民，不为利》被翻译成中文。我们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尤其感谢中心主任肖炼教授组织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同时，我们还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我们认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非常及时。中国向全球市场及其自由资本开放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压力。资本寡头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不会替中国人民谋福利，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即集聚他们的财产和权力，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为此，我们建议中国认真地考察其他国家人民的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分析评价，以便在新自由资本经济主宰全球的情况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生产资料的私人产权和合同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础，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产权所有者、股份持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是普通人民的需要。为确保经济服务于全体人民生活、同时又保护自然，必须采取的措施是：要么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水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如教育、医疗健康、运输、能源、通讯等重点基础产业实行公有制、合作制或国有制；要么让私人产权负起社会责任，用实行累进税的方式来保护公共产品。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对资本和货币实行严格的控制。如果中国在 1977 年完全放开其资本市场，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亚洲金融危机。有许多方式获得法律的和制度的选择，使经济为生活服务。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我们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分析和战略性建议进行认真的讨论。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以其聪敏才智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乌尔里希·杜赫罗和弗朗兹·欣克拉麦特
写于德国海德堡和哥斯达黎加散约瑟
2005 年 8 月

墨西哥学者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

当今的全球化风暴不仅增加了边缘化国家和核心国家^①的暴力、痛苦、灾难（尤其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平等和贫穷以及自然生态的破坏），而且还制造了全球产权的独裁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贸易谈判的中心，使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条款以及与投资相关的贸易措施在许多国家得以实施。这种新型资本主义（极端资本主义）迫使世界大多数居民去购买他们过去曾经通过历史传统方式就能够获取的生活必需品，如水、空气、植物、动物、能源。全球产权私有化不仅排除了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而且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推向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甚至把他

① 边缘化国家泛指受到全球化伤害、被全球化抛弃的发展中国家；核心国家泛指受惠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译者注

们推向犯罪的深渊。

本书作者认为，产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讲，都是值得仔细探讨的。讨论的切入点在于，产权问题至今还没有透彻的分析，或者说，至多只是简单地“借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争论中的一些概念，而且是被推向极端的教条：要么是哈耶克提出的以私有产权为导向的市场极端模式；要么就是全民国家的社会主义。但是，本书作者认为，在边缘化国家和核心国家中，产权具有多种存在形式，它们包括在国家或政府、地方、地区、全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通过对公共产品的政治调控）。结果，关于产权辩论的历史教条至今还在讨论，尤其是在选择全球化和极端私有化进程的辩论中，从范围和时间上考虑居民和自然的特殊需求等问题。作者在书中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其中，关于产权的特殊形式作者进行了实质性的探讨。

作者对全球化所造成的破坏性和排他性进行了公开的探讨。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生命和生存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因此，要采用从“符合实际”的产权新模式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绝对的、教条的和集中的选择方式来进

行重新讨论。保护生命和生存的新模式、收入的重新分配、削减投机和金融资本的力量以及引进简化资本再生产的社会计划，将成为一种在一定范围和时间之内的选择。

本书的背景是过去 20 年来拉丁美洲所发生的初始私有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完全的私有化企业，都接受了仅仅由国际资本和跨国组织提供的选择。然而，拉丁美洲、亚洲、尤其是中国目前所进行的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的经验，则反映了选择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关于产权问题所进行的原始的、教条的和极端的争论，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远远脱离实际。在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多数景况下导致垄断所造成的低效率，它以损害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为代价。国有企业改革，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导致产生私人企业（在多数改革中，所有者既可以是单个人，也可以是一伙人），或者产生归地方、地区和全国不同级别的团体（communities）所拥有的公司。显而易见，离开范围、时间以及居民的特殊需求，就不会找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秘方。

最后，作者对主张继续加深经济开放、期盼全球化带来积极结果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在多数边

缘化国家和拉丁美洲，全球化过程导致贫困差距扩大，并把绝大多数居民排除在外。

恩日克·杜瑟尔·彼特^①

^① 恩日克·杜瑟尔·彼特系墨西哥国家奥托玛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经济机遇和挑战”（《研究》第8期，德国发展研究所，2005年）的作者。

导 语

不是我们朋友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

如果只有两种选择，就选择第三种。

——古谚语

在冷战时期，产权的问题只有简单的两种形式：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因此，当时显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要么是中央控制的社会主义。诚然，在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以后，世界上富有的工业国家的经济为其社会福利做了大量的准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出现。随着 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所有的障碍都被清除，资本主义丑陋的嘴脸再一次开始征服世界。

这种破坏性的影响在世界上随处可见，特别是曾经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创伤，国家资源被瓜分的国家。甚至在一些曾经因此而受益的北半球的国家里，肆意的全球市场机制、结构性失业、社会排斥以及福利状况恶化的迹象也已经显现。

然而，世界各地的相关人员也纷纷以不同形式对此进行着抵抗。各种运动，包括当地居民、妇女、农民、无土地者和失业人员、工会、生态保护积极分子、团结团体和人权组织，因他们都有过这种切肤之痛的经历而站起来反对。他们所反对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一种纯粹服务于利润的最大化，而对人类的生命和自然毫不关心的经济制度，一个支持这种经济制度的政治阶级，一种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学术地”论证这种制度的正确性，让大多数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批评和抵抗的对象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制度本身的关系上：金融系统、支持这种制度的一些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的世界自由贸易以及自命的 8 国集团政府。

但我们需要了解这种制度的哪些秘密组成部分进而来反对它，并改变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面前，我们经常会被这样的事实所打击，即自从“真正的”社会主义

结束以后，所有权的问题便在讨论中完全消失。那些全球化的批评者们似乎也在回避这一话题，以使自己不被怀疑在继续追求那种已经被本身所否定了的中央集权模式。所以，看起来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项不能触及的禁忌。

这种禁忌必须被打破。毫无疑问，以绝对私人产权的形式出现的全球化正在超越自己，而且带着货币和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又一次反弹了起来。所以，当抵制具有破坏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开始的时候，了解货币和市场所有权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何时出现的？它们在历史上有过何种形式以及它们如何连接成现在的这种情况？一些国家为产权做出合乎宪法的保障，并进行环境保护——我们称之为对生活的承诺——这样做的重要性是什么？除了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外，还有没有另外一种选择？本书探索了这些问题。

第一章介绍了公元前 8 世纪的所有权、货币和相关市场机制以及它们给整个古代近东所带来的结果，特别是以色列。圣经传统，特别是预言性批评和变革，与相关社会影响有很强烈的相关性。耶稣和早期基督教组织一直继续着这种批评，并寻求变革。

在第二章里，我们以具有典型资本主义现代形式探索了在中世纪和封建社会时期通向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社会途径。这一次的发源地是在英国。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 17 世纪早期首先提出了这一新的社会理论。

比托马斯·霍布斯更进一步的是约翰·洛克，他运用他的所有权理论，把 1688 年的光荣革命中大地主实施政治统治的假想，以及帝国主义攻占北美洲和印度的行为合法化。他的重要性，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写的那样，不仅仅包括他的理论为西方的宪法提供了基础这样一个事实。

通过一系列斗争，特别是劳工运动，在 1929 年之后，在自由主义和产权综合保障里加入一些和共同利益有关的社会义务的可能性变大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对生命的承诺。在第四章里，我们于是首先以德国基本法（宪法）为案例，分析了它的含义。全球化的惟一目标就是从各种社会和生态障碍中把资本积累解放出来。其结果就是整体市场，这个过程不仅会摧毁生命，也会摧毁它本身的基础。

这种破坏与自我破坏的相互关系是第五章的主题。2001 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明显地促使西方国家，

在美国的领导下，决心作为一个帝国来对付抵抗整体市场的行为，它看起来并不像是反恐的理由。

这种情况会有什么改变呢？第六章从拉丁美洲和新独立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产权经济独特的特点已经把大部分人口排挤到了非正式的圈子里。问题是，他们通过制造简单商品重新进入正式的圈子后，能否提供一种全球经济的更新来遏制生产过剩和资金流向投机的金融市场。

这种途径在第七章里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其出发点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扎根于真实生活和公共利益的新所有权体制？这会引出关于一个灵活的“自下而上”方式的论述，会有一个丰富的产权形式的表达。在瑞士宪法改革的宾斯万格模式的帮助下，我们研究了一个可行的合法模式，并最终从地区层面到世界层面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最后，第八章讲到了社会运动，特别是反对全球经济不公平和生态破坏的全球基督教运动所积累起来的结果。这些活动包含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种威胁生命的全球体系是否不应该像对待邪恶的德国纳粹主义和南非种族隔离主义那样被明确地处理掉呢？这关系到基督教组织本身，他们需要审视自己资本所有权的处理。但

他们也必须有一个清晰、公共的位置。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起草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阻止这场人类和自然的悲剧还是有希望的。中心条件是产权要从其随意而具有破坏性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不仅服务于社会，还要服务于生命。

第一章 绝对产权是产生贫困、 债务和奴役的根源

——产权经济在古代的起源和
圣经选择

关于产权的起源有诸多不同的理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产权的雏形是在公元前 18 世纪末期产生，并在希腊和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得到发展。还有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货币也是在相同的时间里起源的（但并非以硬币的形式）。尽管研究人员在货币是如何起源这一问题上尚未达成统一，但至少这两种制度，产权和货币，肯定在相互之间有联系。

第一种假想，也是流传最广泛的一种假想是货币起源于货物交换，同时也是产权增加的手段。第一个提出经

过论证理论的是亚里士多德（传自柏拉图）^①。他把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家庭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城邦）提供基本需要的物品（oikonomike），另一类是用于为自己增加货币的占有（kapilike，买卖成为了占有物的人造形式的一部分，khremastike）。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经济形式源自以前的自然经济形式，因为货币也可以用来作为交换重要物品的工具。货币起初是以贵重金属的形式，比如银子和金子，后来有了硬币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和柏拉图也有关系——用人类的愿望（epithymia）来说明第二种“非自然”形式的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经济。这种无止境的货币积累给个别人造成一种幻觉，即无限量地积累生活所需物和用于快乐的物质以达到永生的目的。这种获取更多的以货币形式体现的产权手段是建立在生命永恒愿望的基础上，超越了个人愿望的目标。由于这种幻觉的引诱，这些人破坏了社会。为了阻止这种破坏社会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建议：第一，伦理教育，第二，政治禁止（比如说保护城邦的共同利益）。下面我们会有详细的论述。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第一册，第8～13章。又见杜赫罗1995：20。

第二种理论把货币的起源和寺庙的牺牲祭祀以及王国和帝国征收贡品联系起来，这里也有货物交换的元素（见威坎普 1993：32，和基彭贝格 1978：51）。根据《圣经·旧约》中的“申命记”（14：24），它的基本出现是在公元前 17 世纪后期。据推测，远离中心寺庙的犹太人想把自己的祭祀物品换成银子，以便能够买到在耶路撒冷的寺庙用的牺牲供品。一些作为早期货币使用的祭祀用的矛，增强了货币的出现和寺庙活动有关这一理论的说服力。寺庙中的大量珍宝也印证了这样的结论，牧师们在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在耶稣后来对寺庙的批评中（马可福音 11：15）也提到，在所罗门王支持下提出的祭祀制度是对穷人的洗劫，而不仅仅是通过使用货币来简化交易程序。

货币的这种祭祀功能在其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帝国对其被征服的臣民征收贡品的手段。有记载称波斯王国的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22～公元前 486 年）是第一个用此手段的君主。他提出用国家担保的货币作为账目的通用单位。这样一来，贡品就可以全年征收，而不用只在收获的季节征收，还可以从全国各个地方进行征收。

第三种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因私人产权而出现的新的信贷关系（海恩索恩 1980；海恩索恩和斯泰格尔

1996；杜赫罗 2000a；匈格 2000)。海恩索恩和斯泰格尔认为：

1. 产权经济是随着古代（和现代）农奴在危机时刻分配封建土地而出现的革命中起源的，是按照家长制的原则以平均主义的方式进行的。

2. 海恩索恩和斯泰格尔认为，货币起源于信贷契约。这是建立在产权拥有人可以抵押他们的产权而成为债务人，以及“持有”其产权而成为债权人的新条件上。由于信贷契约规定，债权人必须“持有”他的产权，而且不得自己使用，他允许以利息的形式进行支付，来补偿这种“所有权报酬”（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流动资产报酬”演变而来）的消失。然而债务人不仅要偿还抵押款和利息，还要抵押他的产权作为保证，通常是土地。如果这种信贷契约是书面的，那么这些文件（就像汇票一样）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了。这不仅有债务人的产权抵押作为保证，还有债权人的“持有物”作为保证。所以信贷契约的文件是发财的一种手段。简单地说，货币就是持有产权的一种主张。债务人不得不以尽可能优惠的价格出卖他们负债生产的产品，而且还互相竞争。市场就是基于这个事实而出现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持他们的债务。

3. 海恩索恩和斯泰格尔认为，产权经济一开始是平均主义，但经过社会上的债权人－债务人机制，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平等（阶级）。那些不能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也就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进而全家都被债务束缚，以期摆脱利息和借款。从这个意义上说，债权人也在积累土地和财富。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必要确切地描述产权和货币在历史上的出现。无论这些制度以及相关机制是在哪里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这些在公元前 8 世纪中期的希腊和以色列，以及后来的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已经非常普遍了。^① 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在希腊、罗马和古代以色列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因为它们提供了我们产权和货币现代发展的类别基础，也给我们提供了寻求改变的不同选择。

古 希 腊

托马斯·马尔森在他的《产权拥有者还是市民？亚

① 海恩索恩（1984：116）认为，一场主张私人产权，或者至少主张可转让的债权人－债务人契约的类似革命的运动有可能在纳波纳萨尔统治下的巴比伦王国和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统治下的亚述王国在公元前 747 年之后爆发。

里士多德和古雅典的家庭、经济和政治》（1998年版；又见宾斯万格 1995）一文中描述了古雅典美好环境。希腊城邦与产权和货币在同一时间出现。为了能了解在公元前 8 世纪后期，特别是公元前 7 世纪出现的这一事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雅典和阿提卡（古代希腊中东部一地区）。城邦并不是城市，而是带有城市性质的农业区。“城镇和乡村……并没有等级上的区别……相反，市民，城邦居民（polites）……通常是土地的所有者和居住者，而且只有市民才能从根本上拥有土地。因此，拥有土地是市民身份最初的正式前提”（马尔森 1998：67）。海恩索恩展现了前一时期战争贵族的决定性转变。所有的农民都原则上变成了土地所有者，并一起建立了城邦的范围。于是在自己的城市王国里，他们不再通过进贡而依附于别人。

他们使用奴隶耕种土地，过着自给自足，不依赖外来援助的生活；他们只是为了让生活更舒适才自愿地做一些交换。这种自给自足以家庭和能够满足需要的经济和生活空间为单位。这里对农民的管理是以家长制的形式进行的，家长管理自己的奴隶、女人和孩子。在此基础上，农民们以城邦居民和市民的身份在集会和城市中心获得自由和休息，并讨论履行社区的一般事务。这里

还举行贸易以及宗教、司法和体育活动。人们也在这里开会。由于这些活动需要时间，市民们也就需要休息。没有奴隶的小土地所有者以及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继承市民身份，但只能有限制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依靠公款才能参加政治事务。

非市民，包括奴隶、自由民和外来民和市民是有所区别的，他们不能参与政治生活。外来民指的是从其他城邦来到这个城市的希腊人，绝大多数是商人和工匠。他们和拥有土地的市民不同，需要交纳人头税。在产权法方面，描述如下：

- 市民可以拥有一切事物；
- 作为“有灵魂的工具”，奴隶按照法律甚至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但可以拥有他们的主人不使用的可移动物品；
- 作为非市民的外来民不能拥有土地，而且通常不能在这个城市买房子。所以外来民不能通过土地抵押发放贷款——如果贷款不能履行他该怎么办呢？外来民的所有权是流动性的，包括钱和贵重物品、衣服、工具、动物和奴隶，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
- 奴隶所获得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必须要经过他们主人的同意；

- 女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她们可以享有自由人和所有者的身份，但不能享有法定身份，在没有获得她们丈夫和男性监护人的同意之前，也不能享有继承权或拥有财产；

- 这对孩子和未成年人同样适用（马尔森 1998：69）。

与海恩索恩和斯泰格尔不同，马尔森在比较希腊和罗马（见下一节）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希腊城邦在产权和占有权在术语和法律上的区别，尽管在实践中这种区别很明显（同上：69）。*idion* 这个词被用来表示属于某人的东西以及某个人所获得的东西，这个字的意思是“对一件物品的实际支配的权力”。如果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把城邦看作是统一市场就会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比如农业生产、城市工艺生产、贸易以及货币交易，都是由非市民在进行。但货币逐渐在城市工作的契约性组织里以外部信用安排的方式开始起作用。^①正式市民只是通过土地所有者、矿山出租者和有风险的海上贸易借款人身份来介入经济活动（马尔森 1998：70）。

^① 关于早期帝国和城市王国中工匠和艺术家以及劳动分工起源的作用，见欣克拉麦特和莫拉 2001：178。

因此，他们的理想不是财富积累本身。他们通过让奴隶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工作，共同出资推动社区服务来获取自己在政治事件中的自由，比如在紧急情况下，以及在宗教的组织和文化事件中，哪些事情是必需要做的。这样他们就能够展示作为市民的光荣和荣耀。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批评那些以损害他所说的“共同利益”来无限制地积累金钱时所关心的问题。

古代城邦的发展显示，产权不仅给农民市民的自由提供了基础，还产生了社会分裂。这从公元前 594 年梭伦进行的改革中也能体现出来。在那个时候，即城邦出现一百多年后，许多农民不仅因为不能偿还借款而失去土地，而且还成为了债务奴隶。相比之下，其他人已经上升到大土地所有者的位置上。失去土地的人号召重新分配土地，以证明古希腊平均主义的方法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并主张摆脱债务束缚。在此要求之下的权力基础在革命现实中展示的相对较少，而在需要可信赖的自由人进行装备步兵方阵的作战技术的引进上（公元前 700 年）展示的则更多（见布洛伊尔 1987：138）。梭伦废除了农民和债务束缚的影响，却明确地反对土地改革。

这样一来，在享有政治权力的城邦市民中就出现了

许多阶级：正式市民通过奴隶在其所有物上的劳动而获取参与集会自由和休闲，拥有土地的中等农民不得不自己劳动，而没有土地的人不得不出租自己做计日工，但仍保留他们作为市民的权力。“为解决政治问题而出现的政治方法：市民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市民？”（马尔森 1998：81）。这种与产权阶层相关的政治体制被称为金权政治。在大约公元前 400 年，大约有 1/4 的雅典市民没有土地（同上：67）。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最初形式是与（不平等分布的）产权有明显联系的。

昆兹利已经汇编了一套自赫西奥德（约公元前 750 年）以来的希腊资料。他用神话、哲学和喜剧的形式批评产权、货币和贪欲，指出它们是社会的破坏者（昆兹利 1986：63）。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要求废除私有产权而引进公共产权——在柏拉图看来，这是为了上层阶级，即卫士和战士。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形式的产权，包括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应该并列存在。但是即使是私人产权也应该适度慷慨地使用，即如果拥有土地的市民能够在社会补偿、宗教和军事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希腊国这个城邦，他们没有采取经济行动，而是采取了政治行动，从富人那里取得用于外部防御和社会宗教融合的东西”

(昆兹利：79)。这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而是道德上的义务。富人的“利益”是一种社会威信和声望。所以，经济学、政治学和道德学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是密不可分的。

对乌托邦的批评和发展显示了贫穷与富有之间丰富的联系，也提出了在“古代阶级社会”（见基彭贝格 1979 和 1978）里造成这种分化的经济学和心理学，或者人类学上的机制。随着易于管理的城邦架构的崩溃以及亚历山大大帝——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建立起具有古希腊风格的帝国（在公元前 333 年以后，首先在马其顿的统治下，然后归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塞琉古王朝领导），全新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了。没有了政治和道德的约束，对占有权和财产的争夺空前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被征服人民对他们各自帝国和当权者进贡义务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希腊帝国于是就联合了两种不同的剥削形式：君主政体或者帝国的形式，和建立在产权、利息、债务、失去土地以及奴隶制度基础上的剥削形式。

从朱迪亚（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译者注）和对耶和華（旧约圣经中对上帝的称呼——译者注）的忠诚的

角度看，古希腊时期（直到公元前 64 年）的社会分裂原因主要是四个方面（见阿尔贝茨 1992：594）：

1. 根据“利未记”25 章（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卷——译者注），对犹太人禁止的土地产权商业化从希腊扩展到了整个王国；导致了土地，或者说土地的失去，更加集中。

2. 而且产权、利息和抵押机制增加了债务奴隶。

3. 古希腊文化的国际化需要更多的奴隶交易。“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奴隶出口国来满足希腊 - 罗马世界大量需求的奴隶”（同上：595）。

4. 进贡制度的加强使得当地大土地所有者能够出租他们的课税、征兵和收关税的权力。他们知道在扣除必须进贡的东西以后，他们就可以保留从人民那里所榨取的剩余东西。这对于一个来自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来自被免除了进贡义务的农民的人来说，无疑又是火坑。“约伯记”反映出在古希腊犹太人口穷困的过程（见威坎普 1993：115）。

罗 马

在希腊和希腊帝国开始的势头在罗马帝国达到了顶

点，在那里有了具有重要意义合法的形式。^① 罗马帝国使用了占有权（possession）和产权（dominium 或者 proprietor）的基本区别。占有权是对一件事物的实际占有。^② 它可以指定一件事物所有可能的使用权，即使这些权力只是一部分或者只是临时的。相比较而言，产权强调对一件事物的综合权力，不受时间限制的“全部权力”。它还包括作为抵押品进行租借、出租以及转让。它允许为保证借贷而使用的抵押权。产权有以下不同的特征：

- 作为完全权力，它涵盖了物品的本质。一件物品作为一个整体单独归一个人所有，这个人拥有使用它的完全自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干涉。这种权力在五种关系上给予了保护，不能撤销，不能损坏，不受其他影响，拥有者享有使用的完全自由，包括出卖和毁坏，他可以把他的产权让子嗣继承。简言之，“*Dominium est jus utendiet abutendi re sua, quantenus juris ratio patitur*”（所有权就是随心所欲地使用和滥用、消费、毁坏你的

① 下面我们将逐渐引用狄特·康拉德博士去世以前在 2000 年冬季学期在海德尔堡大学举行的联合研讨会写的一篇论文。

② 见《德国民法典》854 页：对一件事物的占有是通过对这件事物实际权力的获得而得到的。在英国法律中，占有权的意思是，以时间来计算的土地的拥有权（终生不动产）或者几年的租借期。

物品的权力)。^①

• 支配权不仅具备象征意义，也有文字意义，而且处在事物的中心位置。起源可能是家长（Greek despotes）对家庭里成员和物品的支配。男性家长对家庭的权力（*patria potestas*）（拉丁语的一个集体词汇 *familia pecuniaque*，比如女人、孩子、奴隶和牲畜）包含了对他们生死（*jus vitae necisve*）的权力，就像对待物体一样。逐渐地，男性的这种家庭权力分为对妻子和孩子的家法（*manus*）以及对奴隶和动物的所有权。准确地说，在这个阶段，所有权和土地的产权有关。

• 所有权根本不包含相关因素，比如社会上有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以及所有者可能和其他非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等。它是对事物的绝对拥有，这是独占的，和任何人都相抵触的，最重要的是，是排他的。^② 需要说明的

① 这段文字来源不明，可能是中世纪的一种说教。关键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在那时的中产基层已经是很普及。又见宾斯万格 1998：128。

② 见宾斯万格 1978：21：“产权（也是“拥有权”）在法律上不能被理解为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没有拥有），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人和一个法律实体的关系。因此，在法律上，产权并不是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没有拥有的并列关系，应该只是拥有的本身。”又见卢曼 1974：66（德文版）：“‘拥有’和‘不拥有’的联合在语言和法律上都没有体现。它只是所有者权力的排他性的一种解释……社会学上最相关的问题，即任何所有权的增加会自动意味着别人非所有权不成比例的增加，在法律上不具备相关性。”

是对人的所有权 (jus in personam)。这是各种所有者之间的义务和契约。

- 对事物的部分权力在所有权中是受到限制的，特别是抵押权（抵押品归属于债权人所占有或者作为抵押没有真正被完全占有）和抵押保证物的转移。像古希腊那样，保证物的产权和占有权的区别使得租借交易在信用担保的基础上成为可能。

- 最后，罗马法律对家传所有权 (patrimonium) 和所有权 (dominium) 做了区分。^① 家传所有权指的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且必须传给孩子的产权。这实际上排除了对“物品”用坏或者破坏的可能性。

通过从家长专制到君主统治（和罗马共和时期形成了对比）的延展，所有权的概念也有了帝王的成分。古希腊帝国的制度是通过无节制的领土扩张和由君主举行的无限制的以货币为媒介的所有者之间市场关系而形成的。罗马帝国的制度像一个产权支配的金字塔，奴隶和动物（自然界）在最底层，但这是合乎当时的法律规定。这种通过法律渠道建立起来的支配权有双重绝对性：它对不服从于它的人有绝对的排斥性（见《圣经》

^① 见宾斯万格 1998: 131, 他指向了这个概念的生态意义（见下）。

启示录修订本 13: 16); 它明确包含了滥用和破坏的可能性。后来在资本主义和整个现代时期, 这种方法再一次被利用。尽管有一些特点做了修改, 但它仍然代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经济。

古代以色列, 耶稣运动和作为反文化 试验的早期基督教组织

公元前 8 世纪末期到 7 世纪, 起源于古希腊的产权经济和信用经济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 在以色列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内容 (见杜赫罗 1995: 121)。公元前 1250 年发生了希伯来人从埃及帝国的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和迦南 (《圣经》故事中称其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 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古称——译者注) 城市王国的农民从进贡的义务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在巴勒斯坦的山区定居下来, 并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家庭和部落。他们用平均主义的方式通过全体会议组织他们的公共事务, 他们感谢赋予他们自由的上帝耶和华, 并从上帝那里获得直接的指点。比如当受到外来袭击而必须组织防御的时候, 他们就乞求耶和华赐予他们一个军队的首领 (士师记)。

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这些人不顾农民和先知们的抵抗，选择了君主政体。结果，王室、官吏和军队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增加了。所罗门像是东方的皇帝。当他的儿子们想要在人民早已沉重的负担上再增加负担时，北方的部落从南方的犹太和本杰明部落分离出去，并建立了北方王国。这沿用相同的发展路线，甚至到了王室任意征用农民土地地步 (I Kgs. 21)。尽管有杰休 (Jehu) 革命，但这作为一种主导潮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8 世纪。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统治地位的产权 - 利息 - 货币机制对 (小) 农业生产者的生计产生了额外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向国王和寺庙纳税，并维持贵族上层阶级奢侈的生活，这超出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他们中间出现了新的竞争。用现代的观点来说，他们不能借款来建立一种有利的，信用融资的生产线，而遇到了很大困难，比如种子问题，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会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纯粹为了生存而把种子吃掉。其结果是，他们的土地被大土地所有者得到。而且，更加严重的是，他们不得不成为债务奴隶。在此，我们可以假想，新的产权经济形式及其信用机制渗透到了封建君主政体制度中，起点就是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在以色列社会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事情是，农民们除了要受到王室和帝国主义进贡体

制的盘剥以外，还暴露于 8 世纪末期的另一种剥削体制之下。这种体制起源于他们自己内部，并破坏了他们的团结。以色列对这种恶化的情况是如何反应的呢？

科斯勒（1992；见科斯勒 2000）精确地研究了产权经济进入犹太王国社会的时期。这是由于从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来的外部影响，还是犹太社会本身的原因已经无从知晓。但至少有一点是惊人的，这种发展和希腊城邦产权经济的出现恰恰是在同一时间。也许是经常航海的腓尼基人在希腊和巴勒斯坦之间架起了交流的纽带的缘故（见胡布纳 1997）。

科斯勒认为，犹太社会产权经济的基本矛盾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矛盾。它导致土地集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手中，把小农拖入了债务。前者生活奢侈，大多住在城镇。债务让后者失去土地。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被剥夺了自由和自我依靠的权利，不得当计日工或债务奴隶。在君主制的最后几年里，他们极度贫困。重要的是，新近产生的富人可以通过债权人 - 债务人契约非常合法地获得集中产权。但是，他们和社会文职人员、军队和王室一道，形成了一个上层阶级。这些团体手里不仅有经济权力，还有政治权力。因此，他们能够操纵那部在以色列人看来是用来保护易受攻击者和穷人的法律。

先知的抗议

恰恰是这次由新产权经济在公共和社会生活中引发的不合时宜的发展，它引起了在公元前 8 世纪和 7 世纪大先知们的抗议。阿摩司和何西阿（公元前 722 年北方王国灭亡之前一直在北方王国），以赛亚、弥迦、西番雅、耶利米、哈巴谷和以西结提倡在新的产权经济中丢失的法律（mispat）和公平（sedaqa）。但首先，对公平和穷人的权利进行批判则意味着反对以色列的上帝。了解上帝和为穷人创造公平是一样的（见耶利米书 22：16）。北方王国在公元前 722 年灭亡以及南方王国在公元前 568 年灭亡以后——先知们都已经预言到了——这些先知的书包含了与我们要谈的主题相关的暗示。根据凯斯勒的著作，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看清楚了一些内容。

阿摩司先知出现在公元前 8 世纪中期的北方王国。他的中心观点是关于对小农的威胁。小农们被掠取了土地，由于过多的债务而被卖身为奴，女人们被虐待而成为债务奴隶（阿摩司书 2：6-8），小农在交易中被欺骗（8：4-7），被逼迫缴税和罚款（5：11）。这违反了保护穷人的法律（5：10；6：12）。另一方面，先知批评

那些富人，因为他们损害了穷人的利益而变得富有，依靠别人的工作而过上奢侈的生活（5：11；6：4-6 书中到处可见）。他们会受到厄运和垮台的威胁（9：9）。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阿摩司下面的语言记录中，保证了受害者将享受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他们应该重新建立损坏的城市来居住；他们应该种植葡萄园并饮用他们自己的葡萄酒，而且他们种植自己的园子来享受果实”（9：14）。这样就明确了“以剥削和奢侈生活为基础的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农民的所有权在未来是会有保障的。自由所赋予的产权不是抽象的，而且，游手好闲的产权肯定会灭亡，而只有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产权才能受到上帝的祝福”（凯斯勒 2000：70）。

在同一世纪的末期，弥迦先知出现在南方的犹太王国。在这一段时间里，阿摩司先知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北方王国在公元前 722 年被亚述王国所灭亡。他很看轻这种类似的产权 - 利息 - 掠取 - 债务奴隶的机制：

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
造作奸恶的。
天一发亮，

因为手中有权，
他们觊觎土地，夺取土地，
觊觎房屋，夺取房屋，
他们压迫户主和房屋，
压榨人民和他们的遗产。(弥迦书 2：1)

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
从安乐家中赶出，
又将我的荣耀，
把她们的孩子夺去。
起来吧，离开这里，
因为这并非安居所在。(2：9)

这些文字表明了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房屋和自由，就连他们的孩子也成为了债务奴隶——并非只是一时，而是“永远”。执行一项信用合同这种很明显的纯粹经济事件，在这里第一次被称为偷窃。那些应受责备的为富不仁者注定要有恶报（2：3）。而实际上，犹太王国的高贵在公元前 586 年就被巴比伦人带走。在这段时间以及荣誉回归的时间内，先知的著作仍在继续——希望从为富不仁者和背叛了团结的普通人那里得到有罪

声明。只有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人们才有希望开始在再次被放逐之后，通过自己的亲手劳动过上应得的生活（凯斯勒 2000：77）。

在公元前 7 世纪，以赛亚先知也曾批评过征用农业家庭的行为：

祸哉，那些以房接房，
以地连地，
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人。
在土地中间，
只有你孤独在那里。

他也把这些贪婪的土地拥有者叫做“贼”（1：23），把夺取负债农民的土地称做“对穷人的破坏”（3：14）。他也预言过他们的掠夺物会最终失去（5：9）。以赛亚书也在不同的阶段进行描述。当“暴君”和“自夸的人”被消除以后，“谦逊的人”和“需要的人”会被许以硕果（29：17-21）。像阿摩司和弥迦一样，特里托·以赛亚（以赛亚书 65：21）明确写道：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法律变革

在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7 世纪主要的预言内容并非彻底失败。这一点可以从那段时间以及后来所进行的法律变革中很明显地看出来。根据圣经传统，在质疑并战胜破坏生命的（不公平）社会秩序的时候，先知的预言和法律是考虑这些问题的两个主要的出发点。^① 他们一方面代表这批判和先见之明，另一方面代表这制度上的变更。第一次变革发生在南方王国，可能在北方王国覆灭之后（公元前 722 年）。书面的记载是立约书卷上（《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21 - 3）。^② 像阿摩司和何西阿这样的先知已经预见到了北方王国的社会和经济不公平所

① 关于律法作为理论上的经济道德基础，见泽格伯斯 1999: 99。

② 见克鲁斯曼 1992: 132.（特别是 179, 217 以及 229: “对覆灭之后的反应”）。

导致的覆灭，并要求其悔改。现在，这些先知的追随者们随着难民从北方王国来到南方王国，增强了在南方王国的像以赛亚和弥迦这样的先知们的说话分量，并给他们带来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不从对财富和权力的崇拜上转移到崇拜耶和华和社会公平上来，你就会遭到和北方王国一样的下场。

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立约书卷介绍了几条“七律法”和其他一些把社会和生态标准以及神学标准结合起来的经济法则：

- 23: 12: 在一周的第七天（当时还没有被叫做安息日），农民要休息，同时也让他的牲畜、奴隶和“常驻的外来民”放假一天以便让他们“能够恢复精力”。

- 21: 2 - 11: 在第七个年头，（债务）奴隶应该被释放，不用交付赎金。

- 23: 10: 在第七个年头，土地应该得到休耕，以便让穷人和动物吃一些地里的东西。

- 22: 20 - 23: 不应该像在埃及人对待其希伯来奴隶那样粗暴对待外来者、寡妇和孤儿，因为上帝会听见他们的哭喊（《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3: 7），并会像对待埃及人那样毁灭压迫者。

- 22: 24 - 26: 借出钱者不应该索取抵押物或者征收利息；因为上帝能够听见那些在威胁中度过日的人的哭

喊，就像上帝曾经听见希伯来奴隶的哭喊一样。

——上帝是富有同情心的。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可预防的和可矫正的法律。一方面，为了防止因为负债过多而失去土地或者被奴役，不许征收抵押物或者利息。^① 另一方面，如果（债务）奴隶还是出现了，他们也应该定期地获得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所有者不允许过度使用土地，而应该让土地定期修整。他也应该被告知人和动物应该如何共同使用土地。

总的来说，根据立约书卷中的描述，在上帝和他所创造物的眼里，生命的需要，包括压迫下的自由，是经济法则的根本。

这些方法在约西亚王于公元前 622 年实行的第二次法律变革中得到了巩固和扩展。这场变革也形成了“申命记”的核心。^② 这一次同样是关于禁止利息和高利贷

① 那时候的利息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息的增长不能超过本金，而且利息必须在一定的原则下支付。这里的利息应该是我们所说的高利贷。在增长的经济中，这种利息符合那种利率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的情况——实际上，大体情况是这样。最近关于按照圣经精神禁止利息的评述见 Leutzsch 2000。

② 见克鲁斯曼 2000: 5，我们可以忽略这些问题，比如哪些内容起源于哪个时期，哪些是来自南方王国覆灭后出现的。

的措施（申命记 23：20）以及关于抵押品或者典当品的法律（24：6 和 10）：“你不应该因借贷而向另一个以色列人收利息，无论是货币利息、必需品利息还是任何借出去东西的利息”（23：19）。

“债台高筑对人们来说是非常困苦的，而且还会让他们失去土地和自由。没有人会愿意因此受益……大多数的古代社会……被分裂成有钱人的小集团和大量穷人和委身为奴的人们。这些律法就是要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在以色列出现的情况也已经证明，只要这些律法的主要方面有可能为社会所利用，这些律法就能够为社会所利用”（克鲁斯曼 2000：53）。

土地所有者在收获季节也有义务。他们不会把地里的东西搜刮殆尽，而要留下一些东西让那些没有任何土地的人维持最基本的生计（申命记 24：19）。另外，土地所有者还要献出他们收获的 1/10 来尽一种社会责任（14：22）。这些捐献可以用来举行每年一次的每个人都允许参加的大节日活动。这些捐献的东西每三年就要送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比如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寡妇、孤儿、外来者和利未人（利未部落中非亚伦后裔，被选中去帮助祭司管理圣堂——译者注）。“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赋税雏形，是利用总体

税收为最脆弱的群体负起的法律和国家责任”。如果拿它和古希腊城邦作比较会很有意思。在这里，富人会慷慨地支持穷人，并负起他们的社会责任——作为他们自己的荣誉和光荣。在以色列，穷人有上帝赋予获得帮助的权利。

债务奴隶的情况也不一样。大约相同的时代，希腊的梭伦已经在雅典市民中完全废止了债务奴隶制度，但仅限于市民。在以色列，由于他们从埃及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所以奴隶制度根本不会出现。而且他们的法律也能够预防这一点，即使事实出现了奴隶，那么七年之后也会被释放。“如果你们社会上的一个成员被卖给了你并为你工作了6年，那么在第7年上你应该给那个人自由”（申命记 15：12；耶利米书 34：8）。

“申命记”还规定（15：12）奴隶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获得自由以后可以得到启动资金作为小农而重新开始自由生活。“因为债务奴隶是作为保证债务的抵押品出现的，这条律法打破了债务的内在逻辑”（克鲁斯曼 2000：54）。

这条律法和“债务免除”一样变得更加清楚了，“债务免除”也是每7年出现一次（申命记 15：1）。这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语里是 *schmittah*，即放弃（见威

坎普 1993: 65)。就像休耕的土地每 7 年要放弃一次生产一样，债权人不仅要放弃应该回收的债务偿还，也应该放弃了债务人抵押的产权，通常是土地（和房子），也就是小农的生产资料。因此，7 年之后免除的不仅仅是债务的偿还以及债务奴隶及其家庭的责任，而且还有债务产生原因本身以及债务和他们被占有的相关生产资料，也要物归原主。这也促成了新的自由的开始。^①

这两件事情不会在古代近东和古代希腊 - 罗马同时并存。在以色列，产权的绝对性被抵制，同样被抵制的还有把成为奴隶的人（自己的同胞）变成自己绝对拥有的物品。此外，“申命记”的观点是，如果上帝的人民坚持公正和仁慈的好律法，那么他们中间就不存在贫困潦倒的人（15: 4）。相反，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将更加兴旺，因为上帝的祝福会光临他们。所有的这些律法都有祝福的话语相伴（14: 29; 15: 10; 15: 18; 23: 21; 24: 13; 24: 19）（克鲁斯曼 2000: 51）。其核心范畴就是尊重生命。如果这些人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就能生存（申命记 6: 24）。如果他们追随其他国家的神，比如从事他们不保护穷人的做法——

① 在关于七年律法的基础上的实际范例，见“尼希米记”5 和 10: 32。

他们就会灭亡（6：14）。

这恰恰是在约西亚王即位以后，倒退到以前旧的做法时所发生的事情，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城遭到破坏，大批犹太贵族们流亡到巴比伦。只有无土地者和穷人留在了朱迪亚，而且在巴比伦人的同意之下，这些人占有那些以前被富人所独享的土地。然后，所有的群体都开始反省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并思考在新起点到来的时候，该如何组织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他们不想重复这样的错误。对此作了记录的是“利未记”，它总结了为遭流放以后的朱迪亚新开始而编纂社会经济律法的经过（见威坎普 1993：86；克鲁斯曼 2000：330）。

第 25 章特别重要。它重点讲了一条神学圣言，如果没有这条圣言，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无法领悟。它道出了为什么以色列不得不采取与周围的人们根本不同的经济秩序。以色列以外的那些人手里握有自己的国王和土地所有者所制定的律法。在以色列，他们的律法是在外部制定的——在西奈山（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译者注）（利未记 25：1），也就是上帝制定的。为了人类的平等和保护穷人和脆弱群体的利益，权力被从国王和土地所有者那里收了回来。上帝说：“土地不应该被无期限地出售，因为土地是我的；

对于我来说，你们只是外来客人和房客”（25：23）。

“利未记”第25章的律法很明显是建立在对产权的绝对性的抵制上。任何想追随基督上帝的人都必须承认上帝是土地的主人。上帝只能允许土地的使用权和出租权（在农业社会里的生产资料）以便让所有人都享有这种生产资料。其他的都是从哪里衍生出来的。

- 25：2-7：在第七个年头，土地应该被允许享受“安息日”（安息日的概念已经被引用到了七年韵律里）。

- 25：8-13：在七七四十九年的时候，人们应该吹响号角，所有的家庭应该得到属于他们的小块土地，以便让所有人能够自给自足（50年节）就像君主国以前的部落社会。

- 25：14-17：土地的买入价格不应该让市场决定，因为那样容易导致投机：50年节应该用来计算每块土地能够有多少收获（然后再作定价）。

- 25：25-28：如果一个弟兄和他的家庭穷困潦倒，比方说不得不卖掉了他的土地和房子，最近的亲属应该买下来（the Ge'ulah order）。

- 25：35-38：如果他们不得不借债，他们的同胞不应该收他们的利息，也不应该接受出于感激而支付的额外货币。

- 25：39-46：同一民族的成员根本不应该被当做

奴隶——原因是上帝才是他们的主人，是上帝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牧师所写的文字削弱了“申命记”里社会律法的一些细节。释放奴隶和退还被占土地从每7年一次推迟到每50年一次。而且，希伯来圣经里惟一出现的一次50年归还土地的事实，还因为50年前流亡巴比伦的犹太贵族们的归来而使问题更加尖锐。现在这个国家里那些没有土地的穷人已经占有了流亡贵族的地产，耕种了他们的土地，那么，现在土地该怎么分配呢？大土地所有者是否应该重新得到他们（过去通过武力或者债务机制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土地呢？抑或他们根本不应该得到土地？^① 这个问题最终从50年节的安排上得到了答案，它折中了前君主制和部落社会的平均主义：每个家庭都应该回到他们的土地上赖以生存。

后来，在波斯时代，在“以赛亚书”61章里的“第三以赛亚”把50年节作为一种未来希望的象征（主喜好之年）。就像“尼希米记”（第5章）明确记载的那样，这表明了先知的批评和犹太国法制变更并不能延续

^① 持有这个观点的人在“弥迦书”里作了详细的描述（见弥迦书2：4以及凯斯勒2000：75）。

下来。这里的普通男女向尼希米抱怨说他们一方面因为向波斯人缴纳贡品而正在失去自由和生计；另一方面，他们的同胞正在利用利息机制占有他们的土地，而且把他们变成债务奴隶。尼希米就设法正式帮助非土地所有者免除了债务。但是，这种趋势仍然没有改变，后来的发展更加趋向于古希腊风格。

如果威坎普（Veerkamp）（1993：115）是正确的，“约伯记”恰恰反映了这个问题。约伯（希伯来的族长——译者注），或者以色列，会不会改变自身来适应残暴独断的希腊神来统治他们的命运？他们会不会通过神学解释而使得希腊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阶级社会在这里合法化？约伯没有改变对希伯来圣经来说是可靠上帝的立场，也得到了上帝的信任。

对帝国绝对性的抵抗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在公元前168年达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时候希腊统治者塞琉古士四世（Antiochus IV）在耶路撒冷的寺庙里树立了宙斯的塑像，并通过禁止耶和华的宗教来表达帝国的权威性。犹太人口被分裂开来。一些人转向希腊帝国，特别是耶

路撒冷寺庙里的上层神职人员和贵族集团。苦修教派教徒作为一个群体，退回到荒野并建立了带有公共产权性质的封闭社会。然而，另外一个群体，包括农民和农村牧师，则选择了在马加比家族带领下进行武装抵抗。他们开始的时候取得了胜利，而后来他们选择了希腊式极权的领导结构。还有一些忠实的群体（虔敬派信徒）最终采取了消极，非暴力抵抗运动，并在预示性的秘密文字中表达了他们的看法。^①

在这种背景下，最重要的文件就是“但以理书”。本书第三章讲述了3个人在熊熊烈焰的火炉里进行抵抗的故事。（见威坎普 1993：243）。国王建造了一座黄金雕像，象征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力。附属国的人必须对它鞠躬。他们都这么做了，只有3个犹太男子拒绝这样做。因此，他们被投进了火炉，但是被上帝拯救了出来。这些预言性的文字就是通过类似的故事加强人们的抵抗行为，并给他们希望。

这说明了前约（The First Testament），希伯来圣经，有好几种方式表达上帝在人民政治 - 经济 - 宗教权

① Apokalypsis 的意思是革命。对信徒们来说，这些预示性的文字展示了这个显然无尽头的帝国权力即将衰落，这个崇尚上帝的王国的正义即将胜利。

力上的选择，视历史条件和机会而定：

- 按照部落社会的团结程度资助成立的方案；
- 在君主、贵族和后来的产权经济入侵以后的预言性的批评和局势的合法转变，这是建立在照顾到包含了地球和其他生物的社区里人的生命的基础上的；
- 在部分自治的情况下的部分方案，比如说流亡之后；
- 极权主义压迫下的抵抗运动。

这是耶稣运动和早期基督教留下来的财富。

耶稣运动和早期的基督教 耶稣和拿撒勒是和预言传统、法律传统和天启传统相联系的。他最典型的一面就是，他们认为在以色列周期性出现的反省计划应该被运用于每天的生活中。耶稣教给他的门徒的主祷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路迦福音”里（新约第三卷——译者注）（4：1），耶稣开始预言在以赛亚书 61 章里描写的即将到来的 50 年节。他写道：随着我的到来，这个希望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天都是 50 年节。

有一个浪漫的我们称之为“白马王子”的故事发生在先知的口传和律法里。他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他向耶稣请教如何才能获得永生（“他有很多财产”——马

可福音 10: 17 - 22)。耶稣回答，可以通过在“申命记”里传下来的十诫作为获得永生途径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外，十诫正是从我们做研究的文字中发展出来的。耶和華把人们从埃及的奴隶制度下拯救了出来，在他的名义下，十诫告诫获得自由的农民们，如果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方法把土地所有权和自由从他们的弟兄及其家庭的手里夺走，那就在拿他们自己的自由冒险（克鲁斯曼 1983）。“不可偷盗”和“不可贪恋他人的东西”本身说得就很清楚。在另一方面，耶稣在回答的时候又把“不可偷盗”加重为“不可欺诈”。这段文字的细节经常被忽视。很明显，耶稣这里指的是一些先知们，他们把产权 - 利息 - 攫取 - 债务奴隶这套机制称为偷盗或者抢劫（见梅尔斯 1998: 272）。耶稣于是就告诉富有的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但是后者并没有理解，并宣称从小就遵从这些律法。于是耶稣对他说他缺少一件东西——让他卖掉他（偷来）的东西并把收益送给穷人。在正常情况下，这会被理解为提供慈善救济的一种呼吁。任何事情都不能离事实太远。这是归还被盗窃物品的问题，这种盗窃不仅是由于个别人的不道德，还包括通过社会上的经济机制。

为了能更清楚地表达意思，这里还有一个正面的故

事，是关于一个富有的税吏长撒该（路迦福音 19：1 - 10）转变的故事。在他和耶稣见了面之后，他不仅把他财产的一部分分给了穷人，还向那些被税制讹诈过的人做了四倍的返还。

制度性偷盗在耶稣和教众聚会的预见性交锋中是很重要的话题（马可福音 11：15 - 19；梅尔斯 1988：297）。这里有一个中心问题：应该由哪一个上帝来统治？是认可通过剥削制度让人们贫困的上帝？还是圣经里保护穷人，给穷人自由，并要求公平而不要求牺牲的上帝？这场在阿摩司和何西阿的预言里经常出现的交锋因为耶稣而变得更加尖锐了。他把目标指向贼窝里所有的参与者。他首先向那些利用货币系统来伤害穷人的人发难。然后他指向了通过市场交换制度获益的人（他们用于交换的鸽子是穷人的祭品）。最后，他驳斥了整个牺牲制度。这种制度允许那些勾结罗马帝国抢占权力的宗教贵族们积聚圣殿里的财富。更坏的是，由于有了牺牲制度的存在，这些神职人员把人们心目中上帝的形象变成了只会索要牺牲祭品，并把贫穷的寡妇口袋里最后一分钱给榨干的形象。

约翰，这位福音传道者（约翰福音 2：14 - 16）比马可王走得更远（见欣克拉麦特 2001：37）。据他说，

耶稣不仅仅把圣殿称做“贼窝”，还称之为市场，一种商业区。上帝的殿堂要受墨守成规的市场价值所支配。这里也适用于高高在上的通过手里的产权、交易以及放出含利息的借贷而产生货币收益的人的统治，他们同样不考虑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生命。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下的奸商通过耶稣的预言性和象征性的行动而自取灭亡。但恰恰是他情愿为天国的公平冒生命危险的这种做法，也证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不想服务于那种只为了其“仆人”的腰包而索取牺牲贡品的上帝。他的上帝信使应该为人类的生命和自由奋斗不止而又奉献一生。

总而言之，耶稣这样表达了他的中心意思：“想要保命的最终将失去生命，那些为我以及为真理失去生命的人将重生。因为为了整个世界而失去生命的人将获得什么利益呢？”（马可福音 8：35）。这又让我们想到了亚里士多德：通过产权经济无限制地夺取财富，是一种能让人产生永生念头的幻觉。而最终无意识的、真实的结局却是：死亡。相反，不为利益做考虑的人将会因为天国而获得生存。在把上帝崇拜因素引进到利用货币机制进行产权积累的过程中，耶稣要胜过了亚里士多德：人们往往会被一种不相关联的、为了个体生命的幻想所俘

获，并由此崇拜能够满足他们命运的偶像。

马太，这位福音传道者（马太福音 6：19 - 34）从“聚拢财富”的角度阐明了同样的道理。你不能同时信奉上帝和财神，相反，所有生命需要的都会被赐予那些第一个追随天国及其正义感的人——即生命的相互关系。

早期基督教在这条道路上追随耶稣。其经典文字是“使徒行传”（4：32 - 35）。全体教徒自愿共享他们的产权。而且，那些拥有土地和房子的人变卖了他们的土地和房产，并把收益放到信徒的脚边。这些措辞并非意外。毕竟，在“弥迦书”和“以赛亚书”都把土地和房产的积累作为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攻击。并且，耶稣也用同样的预言把他们称为抢劫，并要求那个富有的年轻土地所有者应该卖掉他所积累的物品，把所得利益还给穷人（他们的土地被别人通过产权 - 利息 - 负债 - 债务机制所盗窃）。这种产权的相抵作为“申命记”律法的履行被明确地表述了出来，“申命记”律法还说：“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其间没有穷困潦倒之人）”（申命记 15：4）。同时，这里还记述了耶稣的复活。这样一来，耶稣在他们之间复活并非是因为他们使用产权为自己扩大个人财富并积累产权，而是因为他们共同生活在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社会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耶稣的复活意味着无欲的社会生活。下面是在“前约”（The First Testament）中对律法和先知预言的履行。

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圣经对处理经济和产权的总体观点。从以色列和后来的朱迪亚的历史来看，我们能看到先知们的批评和潜在的视野宽广程度、制度守法的规定（只要可以改变）以及对极权帝国的抵抗。在这场抵抗运动中，耶稣展示了一个更远的观点：既然真实的人能够在他们中间以小团体的形式推动改变进程，那么，生命的重新开始也是可能的。

耶稣和早期的基督教组织不仅针对希腊 - 罗马产权经济入侵独立的犹太社会，也针对这个帝国及其经济结构，让他们知道人们有权利选择抵抗，包括以抵制的方式进行抵抗。比如在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故事中，罗马皇帝的形象出现在了罗马硬币上，耶稣就号召人们抵制罗马货币（马可福音 12: 13；见梅尔斯 1988: 310）。在另一个例子中，根据“约翰的启示”中的记述，由于基督徒不愿意在他们的前额上佩戴这个来自深渊（在“神圣”的皇帝绝对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约翰的启示 13: 17）的“兽标”，他们不允许到市场进行买卖。并不是所有的教众都能承受得住这样的重压以及经受得住帝国

的诱惑。特别是有钱人，他们部分或者完全屈服了（约翰的启示 2-3）。但是那些一直被折磨到死还是很忠诚的人一直确信，帝国及其经济总会崩溃（18）来为人的生命让路。也就是说，上帝总会在公平和平的人类中间居住。

这都是在小范围内开始的。比如当耶稣周围的 5000 人又饥又饿，信徒们想去集市购买食物的时候（马可福音 6: 30-44）。耶稣问：你们有多少饼？当这件事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故事具有象征意义就达到目的了。当在一个社区的人们为了他们基本的需要利用各种机会共同工作的时候，这就在改变。这种改变渗透到由产权、货币和市场形成的制度里，更不要说是还有政治压迫。同时，人民不再是牺牲品，而是参与者。“福音”里到处是这样的故事，耶稣让人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的信仰让你们能够完全投入，”他告诉信徒们。

由于这种令人鼓舞的组织形式，早期的基督教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那些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为这些团结在一起的新的生活所吸引。^① 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吸引，以区别于后来的帝国主义者以不正当的方式传播基督

① 关于在古代经济中的这种团结方式结构，见斯特格曼 2000。

教。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组织网络的迹象，就像信徒保罗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耶路撒冷的教众们，在富有的教众里收集捐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这些简略的描述表明了，在圣经传统和希腊和罗马帝国施行的绝对性和破坏性的产权、货币和市场机制的对抗中出现了的富有成果的起点。在我们下结论以前，还有必要更加透彻地分析我们当今时代的新自由制度的历史根源。

第二章 人对人是狼^①

——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所有制 市场的出现

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出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层面上来加以阐述。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市场的建立及其变迁上，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研究更远的相关方面和因素。波拉尼的著作（1945）也选定了这一起始点。他驳斥了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这两种理论认为，市场是一种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现象，能随时在任何人身上以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比如用互惠或者重新分配的形式，来组织和调整他们的经济和

^① 柏拉图：Homo homini lupus.

经济结构。此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在现代，几种不同形式的市场也会同时并存。比如当地市场和远方的集贸市场。即使当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些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融合成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同样，在 12 和 13 世纪早期，远距离交易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都由资本主义市场来决定，比如后来的重商主义国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对经济、政治、人类学和心理学暗示做出分析的人。

乔凡尼·阿里吉（1994）在他的书里选择了另一个起点。^① 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出现以及它和高级金融、政治权力联合的重要历史阶段。他从意大利北部一个银行业和商业城邦威尼斯写起，着墨于通过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和东方被征服国之间的交易往来。接下来写的是在佛罗伦萨发展起来的热那亚金融和西班牙政治权力相结合的阶段。在此，有一个中心问题，即金融控制资本主义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在“几个世纪”的大周期内取代生产资本主义。

究竟是什么让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形式区别于

^① 见杜赫罗 1995: 23 的摘要。

古老的产权－货币经济，并能够在社会上广为接受？这种新的形式是如何让所有事物服从于它的利益计算，并通过货币和市场机制成就积累财富和权力的个人？很显然，这是几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罗马天主教教廷和意大利商业上层的合作，以及十字军东征已经解除了对（高利贷）利息的禁令，这从古代和早期基督教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见勒·高夫 1986）。通过教义的发展和“特赦”行为的出现，一条神学解决之道也随之产生，即现金付款可以替代因为罪过而在炼狱赎罪的行为。对于基督教组织来说，这是双赢的游戏：那些有资本的人可以得到最高可能的回报，而基督教组织也因此受益。这样，高利贷利息仍然被视为有罪，但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牢固的印象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财富购买到他们心灵永久的安宁。在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来的佛罗伦萨城邦，他们走得更远，并引进了复利制度。

同样在佛罗伦萨，在 14 世纪中期的卡米耶圣母堂的小基督教组织里，成员首次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画家马萨乔的这幅名画描绘了贡赋金钱的故事。这恰恰是现代时期出现的年代。

齐恩（1989）把注意力集中到更远的两个因素，大瘟疫的发生和枪炮的出现。这两个因素恰恰在这段时间形成了欧洲人现代时期特定的现代个性。这场在 1347~1352 年的爆发的瘟疫夺去了一半人口的生命，导致了人际关系创伤性的改变。由于和受感染的人接触会导致自己感染并死亡，和自己的邻居相处是变得很危险，而和别人保持距离就意味着自己生存的机会增加。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避免从公共盘子里吃饭，而各自使用自己的餐具。枪炮的出现则可以远距离地杀死敌人，而不用和他们面对面。这就降低了杀人禁令的门槛。

瘟疫和枪炮一起使大规模死亡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让死亡的神秘性在 14 世纪荡然无存，而且大量杀死别人的意愿也在增长——这是已经被神学合法化并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以最为粗暴的方式使用过的欧洲人的特征，十字军东征不仅针对穆斯林，还包括犹太教徒和东正教会基督徒。然而，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却导致了空前规模的有计划灭种和屠杀。对枪炮的兴趣也有直接的经济结果。通过武器生产，城市的经济和农业生产相比变得更占优势。

产权及其结果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的兴趣将集中到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法制架构以及产权制度，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也和货币机制一样是计算个人主义的物质基础。麦克弗森（1962）于是用“所有制市场社会”（possessive market society）来描述发达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市场只有在产权和合同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因此，产权在生产、货币、资本、工作和土地关系的发展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由封建庄园制度向资产阶级产权制度的转变发生在英格兰，时间是14世纪，也是其他早期现代因素的雏形出现的时间。转变的根本动力来自天气的变化——北方出现了极为寒冷的天气，使得农民难以为继，也打破了先前平衡的进贡制度。另外，农民的数量也因为这场灾难减少了。1381年，罗拉德教派起义爆发，海恩索恩和斯泰格尔把这场起义看作现代产权社会的开始。因为起义以后，农奴在现代社会首次被解放出来。而农奴主，由于失去了农奴，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海恩索恩和斯泰格尔 1996：108）。

此时出现的土地所有制向中产阶级产权的转变意味着在所有生命关系中出现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能被过高估计，但它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基础。通过圈地运动，中世纪农民们一起耕种的村子里的公用土地变成了私有土地。波拉尼深刻地描述了这场变革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相互关系的。农民们之间互相帮助和共同工作关系被以金钱为中心的合同和竞争关系所代替。由于并不是所有农民都能适应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他们不得不在别人的土地上或城镇里成为付酬劳动力；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私有化已经造成了失业。同时，封建主转变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种身份让他们在新的竞争下得到更多的优势。在财大气粗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帮助下，大土地所有者们买下了全部的公用土地，圈养用于纺织业中生产羊毛的绵羊。在整个欧洲，所有的生命关系都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利弗肯写道：

圈地运动给欧洲文明带来了人际关系的一种全新概念，改变了经济安全的基础和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土地不再是人们所归属的东西，而是人人都想占有的商品。土地被量化，并由交换价值来衡量，人也是这样。各种关系被重新组织。邻居变成了雇

员或者定约人。互惠变成了计时工资。人们在他们以前曾经共同工作的地方出卖时间和劳动。人们开始用经济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和所有事物。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可以转让，并可以用适当的价格买下来（利弗肯 1998：40）。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发展带有以下几个特点的商品农业的问题：^①

1. 当封建主摇身一变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一些获得自由的农民也通过公用土地私有化成为中等独立的农场主；不可否认，大部分农奴变成了付酬劳动力和小手艺人（所以这次新的开始绝不是平等的）。人际关系被雇佣合同关系和由金钱主导的出租关系所垄断。付酬劳动力的出现与现代和古代经济都截然不同，古代经济是以奴隶的劳动，或者至多是以计日劳动者为基础的。

2. 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还为供应城镇市场进行生产。初级产品是纺织业生产的羊

^① 以下观点，请参阅里特施蒂克的基础著作（1975：21），他仔细研究了历史上的产权，从中世纪到今天。

毛，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他们还进行出口，因为这样比农业生产能赚更多的钱。

3. 土地不再由高层贵族们所控制，而是控制在上层阶级，包括以前的爵士和从社会底层升上来的人。

4. 同时，贸易和工业有了发展，特别是和纺织产品有关的产业。这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工厂，有付酬劳动者和劳动力分工，以及家庭服务工作。在这些工厂里，原材料和产品的产权都属于企业主，而工人只是拿到计件工资。在煤炭和钢铁生产中，具有合作性质的组织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 17 世纪，接近一半的英格兰居民是靠工资吃饭的；如果算上家庭服务工作的人，这个数字将增加到 2/3（麦克弗森 1962：61，根据前人的研究得出）。英格兰的特点就是这种从阶级和从贵族、上层阶级以及自由民演变而来的普通拥有产权的阶级有很明显的区别。拥有产权的阶级扩大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并保护其利益。这一点和欧洲大陆不同，在欧洲大陆，贵族和资产阶级是没有联系的。

在此情况下，市场社会的关键制度——产权和合同——得到了发展，因为法院也更加保护所有权的绝对“决定权”（里特施蒂克 1975：25）。这些描述也反映了英格兰的法律是公众的法律这样一个事实，是建立在习

惯和先例的基础上，并随着司法判断而演变的。罗马法律在英格兰没有被采用，因为它们是由 1494 年德意志帝国的法律改革而来。司法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做出了反应，特别是对公共土地通过圈地运动变成私人产权这一变化。他们可以任意处置他们所圈的这些土地，而不用考虑整个社区。在发展过程中，产权的绝对权利被延伸到非物质领域，比如汇票、专利和版权，以及私人金融合同的执行，而不考虑合同内容（里特施蒂克：29）。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却和罗马的法律规定的一样，产权成了一种绝对权利。

勒努 - 扎加梅（Renoux - Zagame）（1987）在一篇关于现代产权概念在神学上的起源的文章中说，^① 现代产权的绝对性并非源自罗马法律，而是上帝对其造物绝对拥有权在凡间的一种体现。在 16 和 17 世纪，新学院派在唯意志论和后来的经院哲学的基础上对这种理论进行了发展。于是，阿玛查努斯（Armacchanus）写道：“Divinum dominium est jus plenum possidendi mundum ert...plene AC libere utendi”（神的律法就是占有以及……完全自由地使用世界的全部权利。）（同上：56）。新学

① 感谢迈克尔·波丹提供这种说法。

院派认为，对产权的绝对拥有是上帝授予人类的。这种神授的产权的神学面罩在 17 世纪被自然理论学家揭去，比如雨果·格罗特斯，而变成了人类天生的权利（里特施蒂克 1975：311）。这些论点都是源自一种认为历史是根据人类的想法展开这样的假想。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现代产权的发展肯定要比那些新学院派和自然理论哲学家们早，他们的理论最多是为资产阶级产权合法化服务的。

第一个所有制市场社会全面理论： 托马斯·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是第一个全面、创新、深远地使新经济、心理、社会以及政治条件概念化的哲学家。麦克弗森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理论作了更加详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就能够简要地、系统地进行描述。霍布斯从几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

1. 他从市场行为得出了人性机械论，并由此着手分析。
2. 为了让他的理论能够被接受，他站在 17 世纪英格兰人们的市场社会的经验上给人们讲解。
3. 他从市场社会的实际情况得出了市场道德。

4. 从市场上人们的互相争斗，他推断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

个人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第一点涉及到个人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里特施蒂克：17）。为了理解霍布斯观点，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两点。他的关于人性的理论经常被理解为在描述天性的最初状态；而事实上，霍布斯描述的是在假想没有守法义务前提下，他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行为。第二，他的目标是要证明，如果市场社会没有倒退到公开、暴力的相互斗争的情况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的必要性。霍布斯对天性的描述是逻辑上的假想，并非历史上的假想。

在略述霍布斯的分析的主要著作《利维坦》一书的介绍中，他说：“无论是谁，当他审视自己，考虑自己所作所为，出于某种目的而进行思考、发表意见、推理、期望或者害怕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其他人的所思所想和感情。”读者“如果发现自己不是这样，就要好好考虑”（霍布斯 1651：82）。读者在自省的过程能发现什么？

在《利维坦》的第一章里，霍布斯把人类生理描写成了能够自己指挥的自动机器。感官接受收到别人的压力，并向大脑和心脏发出信号，大脑和心脏再产生反压

力。想像和记忆把感官的印象转变成复杂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用来寻找原因以及提前计算出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带来的后果。语言和理智能够帮助他们定位。

这种机器（以及身体重力规律）一直在坚持工作。按照它自己的计算，它向它认为有利于进步的（好的）事情（期望得到的事情）靠拢，并远离那些对它有妨碍的事情（讨厌的人或事）。所有人的思想状态都被转向期望得到的事情。这种动作的计算源自，同时也指向，对期望得到的事情的满足感。经过思想上的激烈斗争，再慎重考虑它最想得到的是哪个动作。人类就是这样被定义为能够计算的个体，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被定义为一台以是否能够满足其期望为标准来研究所有事物，并以此为据在行动中指挥自己的行为的机器。

这种和其他人，或称和其他同类机器的关系，造成了两个结果（霍布斯：第8章）。第一，这些机器通过比较其他机器所拥有的事物来评估每一件事物：“因为如果每个人的东西相等，那么就没有值得珍视的东西了。”第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获得成功的标准，因为他们对权力、财富、知识和荣誉的愿望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愿望比另一些人要高。对于霍布斯来说，这些就是人们相互争斗的生理前提条件。

所有制市场社会

这些让霍布斯经常用来理解发达市场社会的前提条件是如何在社会上展开的呢？（第 10 章）在此，他从权力的一般定义前进了好几步，得出了这样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争取对别人的更多权力。于是，权力首先是“他现有的手段来获得未来某些明显的好处”。然后霍布斯把先天权利，比如特别的体力和智力上的能力和后天权力，比如可以用来获得权力的像财富、声望和好朋友这样的工具区分开来。由此，他总结道：“每个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总是受到其他人的这种能力的抵抗”。^① 在这种斗争的结果中，权力最终意味着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服务的能力。

这样，就出现了权力市场，在那里人类的权利成为商品：“一个人的价值，或者他值多少钱，像所有其他的東西一样被标上了价格；也就是说，要使用他的

^① 麦克弗森 1962：36。见霍布斯《元素》，第一部分，第 8 章，第 4 部分：“由于一个人的权力和其他人的权力造成的结果相互抵触相互干扰：权力只不过是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的权力过剩。因为权力相等，权力就会抵消；他们的这种相互抵消就叫做竞争。”

权力需要付出多少钱：所以价格也不是绝对的，要依赖于其他人按照其需要进行判断”（霍布斯：151）。由于一个人的权力和其他人能够相互抵消，即使那些无意争取更多权力的人也不能置身于斗争之外：因为时刻有争夺权力的人存在。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来保住自己拥有的权力。由此，麦克弗森认为，“每个人的权力都和社会上其他每个人的权力相抵触，这就要求一种假想的社会模式，它允许并要求每个人对社会上其他的每个人进行持续的侵袭”（麦克弗森 1962：42）。所以“人们必须设想一种社会模式，它能够提供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让每个人能够经常寻求对别人的权力而不破坏整个社会”（同上：46）。麦克弗森称之为所有制市场社会。

它有四种和简单市场社会相同的属性和四种特殊的基本属性：

1. 没有强制性的工作分工；
2. 没有强制性的工作报酬规定；
3. 没有强制性的合同签署和执行；
4. 每个个体都合理地追求其有用物品的最大化；
5. 每个个体的劳动能力都是他自己的产权和可转让东西；

6. 土地和资源由个人拥有，并可以转让；
7. 有些个体希望得到更多有用的东西和权力；
8. 有些个体比别人有更多的能量、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物品（麦克弗森 1962：53）。

这样就产生了非常现实的社会结果，有更多产权的人能够获得其他人的产权，包括别人的劳动，以便增加他们自己的产权和权力：

那些想要增加他们有用物品和权力的等级，有更多的可以用作资本的占有物（以及用来赢利的技术），或者有更高级的可以用来积累资本的能量和技术的人将会用一定的价格雇佣其他人的劳动，期望能从他们雇用的劳动中获得比成本高的价值。那些不能够通过他们的土地、资源或者技术来维持生计的个体将会接受能够维持他们生计的工资（同上：54）。

通过竞争和由竞争带来的价格建立的这个整个市场出现了由占有土地和资本产权的人和那些只能给别人提供劳动产权的人组成的阶级。当然，这些在以前的社会模式里也以进贡、奴隶和计日工的形式出现过。然而，

这里的新特点是相互对抗的非个人竞争机制。这就要求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来至少保证人的生命和财产以及保证合同的遵守。

17世纪霍布斯所生活的英格兰社会和这里描述的所有制市场社会的模式非常接近（麦克弗森：61；里特施蒂克 1975：6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拒绝了前资本主义的公平理念（霍布斯 1651：第 15 章）。除了市场价格之外，没有别的衡量价值的方法。“在那里，所有的价值都降低到了市场价值，公平本身也被降低成了市场理念”（麦克弗森 1962：64）。

从实际中来的道德规范

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有尽量持续自己运动过程的生理特征以及市场社会的社会结构，如果人们不能认可一种至高无上的能够阻止斗争转化为暴力的权力，那么每个人都不能避免相互斗争（同上：70）。所有理智的人们必须认可一种地位更高的权力。这样，霍布斯在他的政治理论里第一个从事实中推出道德义务。他另外仅需要一个原始人类平等的基本条件。在他的分析中，这包含了能够杀死别人的平等能力和由此产生的平等的不可

安全感。麦克弗森恰当地指出霍布斯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不同阶级的存在使得人类的不安全感实际上是不平等（麦克弗森：85）。但是霍布斯的观察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阶级都应该服从市场的命令。在这里他们是平等的，至少只要他们接受所有制市场社会这种模式（同上：87）。

政治和法律

当然，霍布斯认为并不需要永恒的主权。^① 他所观察的真实历史显示，无孔不入的市场并不是简单地把所有成员放到相同的不安全环境中，而是必要地发展不平等的阶级，占有阶级能够从公共利益中脱离出来，形成特权：所有者的议会。“那些拥有牢固产权的人需要一个主权国家来支持占有权。他们于是应该建立一个主权体来作为维持占有权必须做的所有事情。而且，这个主权体必须有决定哪些事是必须做的。但是拥有产权的人不能放弃他们选择特权体组成成员的权力”（麦克

^① 里特施蒂克 1975：108。然而，霍布斯也提到了君主统治可以使“议会，或者专制”（霍布斯 1651：297）。

弗森 1962: 94)。霍布斯的观点是，没有主权，就没有产权（1651：第 24 章）。

这里要补充的是，这种主权应该“以一种被认为是合法的方式被指定，让所有主体之间的合同（比如购买、出卖、交换、借入、借出、出租以及雇佣）能够被制定，并用一种被认为是合法的语言和签署方式确定下来”（同上：299）。也就是说，保护产权和合同的主权必要性的结论和霍布斯在市场社会里所提出的精明个体的人类学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只要没有产权的人发现没有办法改变所有制市场社会，他们就没有办法改变对主权的认可。毕竟，主权也在保护他们的生命。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论述在 17 世纪英格兰的产权权利和政治权力。“即使到了 20 世纪，英格兰的议会也不是民主的制度，而是有占有的阶级的工具，不管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里特施蒂克 1975：33）。即使在 19 世纪那些没有产权的人也通过斗争正式获得了投票权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在有关第一次人民公约的争论中（1647），克伦威尔本人和他爱尔兰的女婿爱尔兰顿以扩大投票权会破坏产权权利以及会再次导致政治混乱为由反对投票权的扩大（里特施蒂克 1975：35）。

1688 年发生的光荣革命完全把大产权所有者推上了权力的舞台。把议会和公司大会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因为议会的席位代表——至少部分代表——受出价最高人影响的资产（里特施蒂克：36）。

于是，霍布斯所理解的需要绝对主权来防止市场上的相互争斗变成暴力战争与大产权拥有者控制的议会民主的历史发展是有差异的。霍布斯认为，在所有制市场社会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统治者来强制人们遵守那些保证市场争斗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规则，人类可能会相互残杀。所以国家的功能，首先是执行产权制度和合同的约束力。

曼德维尔（1729）和亚当·斯密（1795）在后来的论述是不一样的（见古铁雷斯 1998：26 和 2001：187；霍恩 1982）。自从 17 世纪末期，中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已经开始批评商业的崛起给人类道德和社会共同利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曼德维尔在 18 世纪初期对此作出了反应，指出商业创造的繁荣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在他的有关蜜蜂的著名寓言里，他称当所有个体都只专注于追求自己本身的利益，结果就是恰恰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他创造出这样的说法：个人自私，公众受益（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这恰恰是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末期把市场比做“看不见的手”时所说的。^① 他从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天性中得出这个结论。当然，他们是通过非常精明的方式进行的，谨慎而又自控——如果他们的确足够精明的话。即他们应该考虑市场规律，遵循市场规律就是公平。对这种公平的需求是功能性道德。有法律制度来保护这些规则，由国家来实施这些规则。在市场盛行的地方，除了参与者毫无意识的自私自利的个人行为以外，市场还带来了公共利益和国家的财富——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斯密把这些表述和牛顿通过万有引力定律得出的和谐宇宙作了明确的对比。

这与霍布斯有明显的区别。霍布斯需要的是绝对主权这样一只看得见的手来让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争斗保持在市场规定和法律的范围内，使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经济争斗在非暴力形式下进行。而曼德维尔和亚当·史密斯在他们的理论中对这种非暴力做了双重改变。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显著发展给人留下了一种不断进步能够给所有人带来繁荣的印象。另一方面，非暴力可以从法律和政治秩序中得来，在这种秩序下，中产阶

① 关于亚当·斯密，见古铁雷斯 1998：25；关于市场 89。

级，特别是大产权所有者执行政治规定，而且已经建立了保护产权和遵守合同的法律。这样，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看似会导致繁荣，而执行产权和合同法律权力的看得见的手则更加柔和，因为它已经成功地为其合法性提供了政治—法律秩序。

法西斯主义的结果

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历史后期的某个特点。每一次资产阶级秩序因为市场的间接作用导致无法忍受的产权及其结果的错误分配，并导致饥饿、痛苦和死亡而受到挑战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从产权控制下民主的秩序转变成独裁的统治形式。也就是说，如果看不见的手这个神话和现实的矛盾尖锐起来，霍布斯所说的看得见的手就会变得强硬起来。在历史上，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西斯主义。约翰·盖尔藤说过，“纳粹主义是极端的西方文明”（又见杜赫罗 1987：117）。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当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出现。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权力”向全世界介绍专政制度，意在帮助跨国资本突破社会和国别阻力——比如在 1964 年的巴西和 1965~1966 年的印度尼西亚

亚。自从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兰德被暗杀以及皮诺切特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领导军事政变之后，这种情况在更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特别是阿根廷、乌拉圭和中美洲。这种专政允许跨国公司兼并民族工业。他们签订合同债务，导致无休止的利息支付以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他们为全球化做好了准备。直到这些制度都被成功地引进来以及苏联的挑战消失以后，“低强度民主”才再次出现。

现在，帝国再次强硬起来，虽然这次使用的是直接武装干预，不仅仅使用独裁者做傀儡。这从美国“预防性战争”的军事原则，美国发动的对阿富汗、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大量经济战争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历史证明，每当危机出现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使用暴力和战争（更多这方面信息请参阅下一章）。

但回到 17 世纪，光荣革命两年后，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卷）问世。他不仅使得英格兰大产权规定合法化，更为西方国家的宪法打下了基础，从 1878 年美国宪法开始。

第三章 约翰·洛克

——在资本主义产权名义下的人权倒置

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北约对科索沃发动的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人权”矛盾的一面。在人权的名义下，整个国家被摧毁。人权被变成了人道主义侵犯：侵犯那些人权侵犯者的人权。在这种说法背后，还有一种说法，即那些人权侵犯者不能主张自己的人权。

当人权在以人权本身的名义被侵犯的时候，人权也就被颠倒了。这样的历史很长。现代人权的历史，实际上是人权倒置的历史，对人权的侵犯变成了政治行动的绝对命令。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给出的理由是当地的文化涉及到了人的牺牲。后来对北美洲的征服同样也用当地居民侵犯人权为理由。征服北非被描绘成对人吃人习

惯发动的一场战争，而征服印度则是因为要阻止妻子殉夫（妻子在其丈夫葬礼上以柴堆自焚）的风俗。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也是打着中国侵犯人权的幌子。西方国家已经征服、殖民、奴役、羞辱了整个世界，抹杀了整个文化和文明。这种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总是在人权的名义下进行。

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世界杀人的血污被抹干殆尽。相反，这些血污反而把西方世界洗得干干净净，也给它穿上了人权卫士的外衣。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美国强迫黑人劳动仍然在玷污着黑人的后裔，而强迫别人劳动的人的后裔却有着像雪一样洁白的心灵。消除北美本地居民的民族大清洗仍然让当地剩余的土著后裔感到羞耻，直到今天他们还饱受西方人的诽谤和欺辱，在电影中，他们经常被指责为自我毁灭。有些这样的电影纯粹是鼓吹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向那些在几个世纪以来发起过殖民主义浪潮以及践踏过人权的国家说明他们的人权情况。这种倒置人权的争论是掩盖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有计划种族灭绝和屠杀的烟幕弹。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支配着我们全球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解释权。相反，西方国家并不接受为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反而征收他们自己炮制出来的巨额外债的利

息。所以受害者有了罪过，成为了债务国；他们不得不向他们的主人认罪，如果必要，还要用他们自己的鲜血来偿还债务。感谢人权倒置，这些主人们成了人权的主人。

这种人权倒置有一种可见的方法，其结果是把受害方变成有罪方，而刽子手成了世界上清白的裁判者。古典文学的作者们也对此作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约翰·洛克，他在全球殖民化最关键的时候抛出了人权的倒置理论。他于是给出了今天在帝国政治中随处可见的形式，也是科索沃战争的基础。他发现了人权在资本主义私人产权的名义下倒置的方式。

约翰·洛克的世界

约翰·洛克的书《政府论》（下卷）出版于 1690 年的英格兰，他在书中表达了他对于产权、民主和人权的想法。这本书是英语世界的基础文本，也说明了当今的帝国主义政治，比如过去的英格兰和在现在的美国。同时，它也是所有西方宪法中关于产权条款的基础。

这本书出现在历史上的紧要关头。英格兰刚刚进行了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以 1688 年光荣革命为顶点。这

实际上是在 1648~1649 年把国王推上断头台以后的第二次革命。光荣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热月党人。^① 在一开始就把人民革命转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传播人身保护权（1679）和权利法案（1689）。这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把议会当作人民的代表和私人产权的保障。约翰·洛克利用这些事件作为他的政治理论。

这种理论是必需的，因为对平等的要求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几个问题，而约翰·洛克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英格兰正处于帝国建立阶段，它正在扩张其帝国主义的权利，于是和当时其他的帝国主义大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特别是与西班牙和荷兰。最直接的冲突是由克伦威尔的《航海法案》（1651）引发的对荷兰的冲突。然而，扩张本身一开始就瞄准了欧洲以外的国家。北美洲是最重要的目标，而且英格兰的移民正在对其进行着征服。同时，对远东的扩张也已经在进行中，目标在印度。这样就导致了和法国的冲突，法国也认为印度是可口的猎物。另一方面，英格兰也在争取独家垄断在 17 和 18 世纪最为暴利的贸易——奴隶贸易，当时贸易还主要集中在西班牙的手里。约翰·洛克本人就把他的个人财富投资到奴隶贸易之中，

① 在法国革命中，执政内阁废除罗伯斯庇尔。

在他之后这么做的就是伏尔泰。^①

在约翰·洛克时代，这些扩张的路线已经非常明显。实际上，他们已经给 18 世纪定了基调。在 18 世纪，根据 1713 年的《乌得勒支协约》，英格兰已经垄断了从非洲到西班牙美洲领地的奴隶贸易。另外，它最终征服了北美洲，并在印度击败了法国，使印度在 18 世纪中期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帝国主义的这种情形亟须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例，在上述的时间里，欧洲已经通过国王的神权以及通过罗马教廷对被征服过的国家的让步建立了殖民扩张。光荣革命废除了国王的神权，并把国王降低至立宪君主。所以这种帝国主义扩张的合法化也失去了其合法性。

这种矛盾在 16 世纪西班牙征服了美洲以后已经出现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Gines de Sepulveda）。通过教皇的神权使得这次征服合法化，根据这种神权理论，基督教当权者赋予了统治的最高权力。相反，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提出了第一个自由政治理论，把征服美

^① 根据毛利斯·克里斯顿，1957，麦克弗森 1962：253 n.4 引用，伏尔泰见波里亚可夫，1983：110。

洲合法化。这件事情被约翰·洛克用在了他后来的理论里，约翰·洛克非常同意维多利亚的观点，尽管他的理论走得更远。这个时候，在英格兰国王的神权是以罗伯特·福尔莫为代表，也正是为了反驳他的观点，约翰·洛克写了他的《政府论》（上卷）。

那个时候在合法化上出现的问题是清楚无误的。人身保护权和权利法案已经提到了资产阶级不能，或者不愿意放弃的人权。这是他们对国王的神权的回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反应。这些权利保证了个人身体的完整性和面对政治当局的产权完整性，并把后者转变成保护这些权利的根据。从字面上来分析这些权利可以发现，它们都不包括奴隶制度下的强制劳动和在北美洲通过暴力抢占当地居民的领土。因此，这些资产阶级不可或缺的权利恰恰和资产阶级本身重要的中心目标——殖民扩张产生了矛盾。这种直接的表述和 1648~1649 年第一次英国革命相符，直到 1655 年圣议会解散，这在当时最重要的革命团体——独立派及其最激进的部分平等派的地位上也体现了出来。^①

^① 这种地位和前几个世纪在欧洲的激进改革有关。见威廉斯 1983。关于独立派，见柯夫勒 1974 以及麦克弗森 1962。

于是在资产阶级宣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日益扩大的资产阶级的特权之间就存在着矛盾。还是约翰·洛克指出了摆脱这种局面的方法。虽然他运用高超的理论技艺，但并没有寻求这种解决的路线，因为那样可能会在这历史性局面下出现例外的情况，而是完全颠倒了在第一次英国革命所确立的人权。这也让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快就被英国资产阶级采用，后来被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所狂热地接受。他在《政府论》（下卷）（洛克 1690a）得出的结论，可以用如实表现约翰·洛克观点的自相矛盾的话来总结。他说“人是生而平等的”，这包括“每一个人对其天然的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约翰·洛克的理论技艺包含了他下面得出的结论：所以，奴隶制度是合法的。接着他又补充道：所以，北美洲当地人民的财产可以被无条件地据为己有。而且印度可以运用武力进行殖民。

约翰·洛克把所有这种暴力行为看作是合法的，称这恰恰是人生而平等的结果。使用武力并没有破坏人权，却是忠实应用人权的結果。在约翰·洛克看来，宣称人人平等和宣称奴隶制度下的强制劳动是完全一样的。保障产权和宣称北美洲当地居民的财产可以被无条

件无限制地占有完全一样。正因为这种智力杂技，资产阶级狂热地赞成约翰·洛克的政治理论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我们也可以看出，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的人物“老大哥”的口号“自由就是奴役”并非作者原创：原创者应该是约翰·洛克。

这是相当高超的技艺。它所造成的事物颠倒贯穿了整个自由人权的阐述。

约翰·洛克的中心论点：消灭侵犯产权的人

约翰·洛克在他对自然状态分析中提出了他论述的原形。他把这种状态看作是所有社会生命的背景。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他称之为公民社会，只不过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政治权力存在的证明，其本质是裁判者。于是，自然状态和公民社会并不矛盾；他们都有同一种自然法则统治。在这一点上，约翰·洛克和霍布斯的观点非常不一致。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最终将会被能够拨乱反正的公民社会所代替。然而，约翰·洛克把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已经在自然状态下存在的完美例子。

自然状态于是就变成了公民的社会的基础，但在不

是公民的社会的地方也很盛行。因此，约翰·洛克就可以在仍然不是公民社会的美洲（北美洲），直接生活在自然状态下，而在亚洲，公民社会已经存在。约翰·洛克用公民社会的概念表示带有制度化权力的政体。

洛克的观点是，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自由的状态。“虽然这是自由的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自然状态的道德规范也接着出笼：“正因为每一个人必须保存自己，不能擅自改变自己的地位，所以基于同样理由，当他保护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以及一切有助于保存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的事物。”

这段话的基点是把人定义为所有者，约翰·洛克下面将会论述。^① 人作为一种物种有三重所有权：（1）拥有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劳动）；（2）拥有他们的物品；（3）拥有他的自由。这种属性应该受到保护。这就是“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的自然法。

这种自然法暗示着对人体完整性的尊重和对他们产权的尊重。洛克把这些看成是很明显的东西而并没有加

① 上卷，第九章；下卷，第五章。

以更详细的阐述。然而他的确详细阐述了他从这种自然法中得到的一条权利：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自然法的裁判者。他坚持道：“自然法便在那种状态下交给每一个人去执行，使每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度。自然法和世界上有关人类的一切其他法律一样，如果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人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以保护无辜和约束罪犯，那么自然法就毫无用处了。而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在那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中，根据自然，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地位或对于别人享有管辖权，所以任何人在执行自然法的时候所能做的事情，人人都必须有权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享有惩罚罪犯和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的权利”。因此，并不是只有违反此法的受害者才有权利对罪犯绳之以法，而是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权利这么做——很自然是每个英国人——不管这个罪犯是在哪里被发现的。这就引出自然法罪犯的特点这一焦点问题，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洛克给我们展示的罪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妖魔：“罪犯在触犯自然法时，已是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规则生

活，而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正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的尺度，所以谁玩忽和破坏了保障人类不受损害和暴力的约束，谁就对于人类是危险的。”

这意味着“……这既是对全人类的侵犯，对自然法所规定的全人类和平和安全的侵犯……”。这是“构成犯罪的，是违法和不符合正当理性规则的行为，一个人因此堕落，并宣布自己抛弃人性的原则而成为有害的人……”。

更进一步说，这个罪犯“既已绝灭理性——上帝赐给人类的共同准则——以他对另一个人所施加的不义暴力和残杀而向全人类宣战，因而可以当作狮子或老虎加以毁灭，当作人类不能与之共处和不能有安全保障的一种野兽加以毁灭。”

这是一种心理的灭绝。罪犯作为堕落的人像野兽一样被杀死。他已经犯下了“对全人类的侵犯”，并且“对全人类宣战”。洛克不仅说那些罪犯本身“堕落”，他还说这些人宣布“自己抛弃人性的原则而成为有害的人”。更有甚者，“罪犯在触犯自然法时，已是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规则生活……”。洛克解释说侵犯者没有人权，通过他的侵犯宣布人权不适用于他。在他看来，这种人必须被消灭，但是，他是通过这样的方

法说出来，即这个人通过犯罪宣布他是待宰的野兽。如果他被消灭，那也是他自己的愿望，而且洛克只是号召贯彻下去。对于罪犯来说，消灭是他自己的愿望，而洛克只不过是帮他实现了这一愿望而已。

洛克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产权的侵害者。人们有权利消灭它，但这并不是窃用他们产权的权利，因而不能肆意抢夺。国王授权胜利者去抢夺被征服者的财产。洛克不能允许这种权利，他也想让胜利者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盗用被征服者的财产。于是他主张“受到任何损害的人，除与别人共同享有的处罚权之外，还享有要犯罪人赔偿损失的特殊权利。认为这样做是公道的其他任何人，也可以会同受害人，协助他向犯罪人取得相应的损害赔偿。”他补充说，“受害人基于自卫的权利，拥有将罪犯的物品或劳役取为己用的权力。”他会继续陈述说这种向罪犯主张“劳役”的做法证明奴隶制度下的强制劳动是正确的。

这样一来，尽管胜利者仍然占有了被征服者的财产，被征服的罪犯却没有被抢劫任何东西。但他得到的是由罪犯及其所受惩罚造成的麻烦所带来的赔偿。在这里，洛克开始正视奴隶制度合法化的问题，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人权实用性的结果。

洛克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自然状态并不是和平状态，而是潜在的罪犯经常带来的威胁之一——野兽和妖魔。洛克以和平的名义对其宣战。这场战争的起源是因为敌人总在寻求伤害人体的完整性，并觊觎他们的东西和奴隶。

但当洛克谈到自然状态的时候，他指的是现在，而绝不是过去。他谈到了文中经常提到的美洲，用以说明在那里这种自然状态非常盛行，而绝不是政治的或公民社会。但他也提及公民社会，像在英国本身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他在说锡兰（斯里兰卡）时提到的印度。洛克认为公民社会的政治当权者应该守卫自然法。公民社会也应该服从自然法，把它作为基本秩序，并在其范围内组织整个社会。这样，洛克就可以把那些在世界上抵抗资产阶级扩张的人视为敌人，并在分析自然状态的时候把他们定义为罪犯。那些起来反对人性的被认为是野兽和害群之马，并且因此而失去人权；他们是应该被消灭的敌人。在自然状态理论的基础上，洛克把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看作十字军的一部分来对抗那些起来企图通过抵抗资产阶级扩张的形式反对人性的人们。

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下一章里分析了由自然状态产生的战争状态。

战争状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洛克所看到的社会其实是在战争状态下的社会。无论哪里，只要其直接状态是自然状态，它必须要被文明化以便转变成为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北美洲）。无论哪里，只要是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它就必须服从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印度）。

洛克关于自然状态和违法者的论述在这里被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冲突中，而洛克和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认为都卷入这种冲突中。在这个论述中，自然状态占据了关键的位置。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洛克可以给所有抵抗资产阶级扩张的运动打上这样的烙印，他们是在和平和合法保卫人性的名义下发动侵犯战争（洛克一直把人类看作一个物种，而永远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资产阶级为争取和平和侵略做着斗争，而这种侵略在资产阶级看来无处不在。由此推广开来，世界上各种冲突的其中一方都会被视作堕落、害群之马、和野兽在同一水平上，他们起来反人类、反情理以及最终反上帝。

所有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战争现在都是圣战、

宗教战争。而他们的对手通过他们的抵抗运动向外界宣称他们没有人权。因此，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人权。资产阶级的每一场战争于是都被推算做正义的战争，保卫人类的战争，而所有资产阶级的敌人被推算做非正义战争。所以，他们完全可以被合法地消灭掉。

人类法作为所有人类的法律可以消灭违法者。如果一个人被打败，他很自然地就要承担另一个人发起对他正义战争所消耗的费用。这就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他们自己估算战争费用，并极其公平地征收——并不是通过抢夺——而是通过赔偿。

洛克在第三章论战争状态里论述了这方面。为了阐述他的战争状态的概念，他做了一个计划，让他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虚构世界。他从一个和任何事物都意见相左的“我”和“我们”入手。他们都很平静，这时，别人宣布对我们的生命有所企图。

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的和毁灭的状态。因此凡用语言或行动表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有沉着的、确定的企图，而不是出自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就使自己与他对其宣告这种意图的人处于战争状态……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怀有敌意的

人。他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就像他可以杀死一只豺狼或狮子一样。因为这种人不受共同的理性法则的约束，除强力和暴力的法则之外，没有其他法则，因此他们可以被当作猛兽看待，被当作危险和有害的动物看待，人只要落在它们的爪牙之内，就一定会遭到毁灭。

其他人已经宣布他们对我们的生命有所企图，所以我，或者我们，就能够像杀死野生动物一样杀死他们。洛克道出了毁灭的真正秘密。但他们已经做了什么？这种对我们生命的“企图”是什么呢？

因为，我有理由断定，凡是不经我同意将我置于其权力之下的人，在他已经得到了我以后，可以任意处置我，甚至也可以随意毁灭我。因为谁也不能希望把我置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除非是为了通过强力迫使我接受不利于我的自由权利的处境，也就是使我成为奴隶……因此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凡在自然状态中想夺去处在那个状态中的任何人的自由的人，必然被假设为具有夺去其他一切东西的企图，这是因为自

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并被看作处于战争状态。

所以任何和我们处于战争状态的人都能够“任意地处置我”，或者说，让我，这个我本人和自由的主人，成为他的财产。但谁是想这么做的人呢？一方面，他们是洛克时代具有绝对性的君主国。他指的是在同时代的英国想恢复国王神权的某种趋势，但他也指欧洲大陆的具有绝对性的君主和他明确提出的锡兰，这表示他已经把印度考虑在内了。他们都通过剥夺我们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使“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他们是在不了解“我们”，或者根本不愿意了解“我们”的情况下对“我们”宣战。在另一方面，洛克指的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而又反对向公民社会转变的人。他说的是北美洲当地的居民，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和“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但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们定居的地方。在洛克看来，欧洲的征服者是带着和平的目的来到北美洲。但是居住在那里的人却非法地横加阻挠。他们使自己和这些热爱和平的征服者处于战争状态。在此，洛克甚至总结说他们想为征服者产生奴隶。因此，他得出结论，这些和平的征服者会把这里所有的人视作野生动物一样，并在自然法的基础

上把他们消灭。结果是，只有洛克和资产阶级想产生奴隶。不论是具有绝对性的君主国还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对此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

谁是这里的“我”和“我们”呢？洛克并没有简单地说是英国征服者或者英国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是那些所有保卫人类和保卫上帝赋予人心里的人性规律的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些主张自然法的人。这也包括约翰·洛克和英国资产阶级，他们是人类的先锋派。他们可以代表自然法，实际上，他们是这种天性的化身——他们是人类的传教士。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自己保卫人类的那些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人类。

由于两条阵线之间没有裁判者，这是真正的战争状态。但是洛克说，在没有裁判者的地方，每个人都是裁判者。这个论断通过战争获得了验证，洛克也把后者看作最后的审判的预示：

因此在这种纠纷中，如果提出谁是裁判者的问题，这不能意味着，谁应对这一纠纷进行裁决。谁都知道，耶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审判人的耶和華”应当裁判。如果人世间没有裁判者，那么只能诉诸天上的上帝。因此那个问题不能意味着谁

应当判断究竟别人有没有使自己与我处于战争状态，以及究竟我可否像耶弗他那样诉诸上天。关于这个问题，只有我自己的良心能够判断，因为在最后的审判日，我要对一切人的最高裁判者负责。

这里说的由战争预示的最后的审判只是一种权利，它的决定超越了批评，而且不需要证明他们自己的正确性。只要这种权利投合洛克自然法的兴趣，就是首要的标准。如果这样做了，那他就是正确的。

然而，这种战争状态意味着所有打着人类权利旗号发起的战争被定义为正义的战争。即使他没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他也有理所当然的权利这样做，而且永远是，也必须是，保卫人类的一场正义战争。洛克也提到了在公民的社会里的革命的权利，但这只是干涉权的另一个侧面。毕竟，在没有裁判者的地方，每个人都是裁判者。即使在公民的社会状态下有裁判者，但如果裁判者做出服务于反人类的决定，宣布战争的权利将依然存在。如果裁判者不坚持洛克心目中的自然法，那么他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非法的。此时无论别的法律还是宪法都不适用，因为只有自然法是真正的基本的法律：“而正因为无处可以申诉，就使人有权利向一个侵犯者宣

战，尽管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和同是一国的臣民……不存在具有权力的共同裁判者的情况使人们都处于自然状态；滥用武力，以强力加诸别人，不论有无共同裁判者，都造成一种战争状态。”

公民社会的政治结构也被洛克的自然法所定义。但这意味着只有“公民的”才是合法的。如果一个公民社会没有用这种自然法来定义自己，那么它就和“我们”，人类的代表，处于战争状态。于是就可以不要裁判者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裁判者，像耶弗他那样可以诉诸最后的审判。于是就有了干涉权，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人现在都有这个权利。所有的人都是裁判者，而不只是一个社会一分子。这样，英格兰的资产阶级和英格兰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保护人类为由于干涉别人。他们可以通过征收战争赔偿而得到战争的成本，因为对手输掉了非正义的战争，不得不进行赔偿。然而，这并不会招来批评，因为是最最后的审判所允许的。

洛克把资产阶级发动的征服世界并掠夺财富的战争合法化。但施暴者也想让这场战争被认为是正义战争，他们肆意掠夺世界财富的行为不被认为是偷窃。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控诉整个世界进入了战争状态，以便能够发起针对所有人的一场

正义战争。他控诉整个世界想占有资产阶级的财富，以便资产阶级能够名正言顺地挪用整个世界的财富。整个世界只不过是野生动物，那些挡在他们前面的都可以被消灭。这就是洛克所提出的人权所产生的结果。通过以最后的裁判者向上帝申诉，洛克使得资产阶级成为最后裁判者，他们也预示着最后的审判的来临，并以自然法、人类和情理法的名义谴责和惩罚整个世界。洛克反对国王的神权，取而代之的是无可比拟的更加暴虐的法律。资产阶级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的正确性可能永远不会以任何国王神权的名义来加以证明。

洛克于是阐明了他著名的颠倒人权的理论，这也提供了世界最基本的范畴，即使帝国也要运用它的权利向整个世界强加帝国的统治。直到今天，所有帝国发动的战争都被认为是正义的战争——所以，他们对手就不能主张任何人权。对那些对手来说，他们没有人权；对其他站起来要求人权的人来说，也失去了这些权利，因为他们也起来反对人类。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在远离美国万里之外的国家里作战。越南人正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对抗这些军队。用洛克的观点来看，越南人正在打一场侵略在越南的美国军队的战争，而美国军队正在打一场反对越南人

的保卫战争。

美国政府也用类似的方法让它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战争合法化。它以洛克的自然法的名义宣布它有权力和责任进行武装干涉。毕竟，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起来反对人类的。美国政府不承认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权——尽管他们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就像以前智利的阿兰德。对反政府人员的战争是发生在拉丁美洲最残酷的战争，只能和现在哥伦比亚的准军队成员的行为相比。里根自己也说尼加拉瓜正在忍受一个毒瘤的煎熬，必须切除。这种说法代表对人民的毁灭和对人权的否定，因为毒瘤很明显没有任何权利。尼加拉瓜政府向海牙国际法庭申诉，海牙国际法庭也谴责了美国的入侵，然而后者拒绝承认这个判决，并退出了他成员资格。用洛克的语言说，美国政府不向世俗法庭低头，它只服从最后的审判和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古巴的封锁以及对被俘获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人员人权的否定也用同样适用这一理由？

十多年来，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寻找人权行动者的行动。他们被威胁、强迫去了精神病院，而且时常发生自杀事件。这种行动在哥伦比亚特别突出。它的正确性用我们在读洛克大作的时候发现的相同计划得以证明，而

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①原因就是谁起来为那些被剥夺了人权的人争取人权，他自己也会失去人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没有批准 20 世纪重要的人权文书。这不仅包括联合国大会，也包括美国人权大会（1969）。美国政府没有把他们作为法律义务。它也反对建立国际罪犯法庭。

在颠倒人权、以人权的名义践踏人权、甚至取消那些反对“公民”社会及其权利方面，约翰·洛克绝对是著名的思想家。对我们的媒体来说，这种颠倒是做出反应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洛克仍然是思想家，他为奉行自由主义的帝国解释人权规定了范畴。^②

他们受到洛克论调示意性特点的支持。他做起了文字游戏。在冲突中谁是入侵者这个问题并没有通过现实

① 在和美国军事会议同等的在阿根廷举行的美国军队情报会议的文件里所提到的几乎所有自治人权组织作为团结组织都被认为是颠覆分子或亲共产主义分子。即使其中一些组织相信被迫害的共产主义分子也应该有人权，他们自己反而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分子。这些文件是 1990 年由杜赫罗等人出版。

② 并不仅仅是奉行自由的帝国。当我（弗朗兹·亨格兰玛特）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主义清洗时期苏联主要检察官的一些发言。见帕克 1963。维辛斯基用的就是洛克的语言，只不过是放到了苏联的背景下。维辛斯基也认为被诉者起来反对人类，并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像“疯狗”一样被杀掉。这种说法有很强的生命力。当美国政府针对卡扎菲发动对利比亚空袭的时候，“疯狗”这个词语又一次出现了。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什宣布卡扎菲应该像“疯狗”一样被杀死。

来回答，而是通过推论来判断。说谁对，谁就对。这就是文字游戏。它也是预示性的计划。那些在正义的基础上发动正义战争的人预示着最后的审判。“当今的启示录”起源于约翰·洛克。同时，这也是一种思路，恰恰打着人权的名义来废除人权。人权变成了公民社会的权利和受益者的权利。

最初的计划是非常概括的。关于在他那个时代的两个基本情况洛克做了精心的描述。一个是奴隶制度下强制劳动的合法性，另一个是欧洲的征服者对北美洲当地居民实施消灭和征用的合法性。洛克用他特殊的认识人权的方法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两个例子没有侵犯人权，而是他们在实施中产生的结果。这两种合法性是基于洛克对战争状态的分析。

奴隶制度下强制劳动的合法性

洛克对战争状态的分析很简单地引导到强制劳动的合法性上来了。洛克声称，每一个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人都会丧失所有的人权，因为他做出了起来反对人类的决定。人权并不是从他身上剥夺的，而是在他起来斗争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不再拥有人权了。不坚持人权是他自己

的意志。

洛克颠倒了人权来反对人权，并通过宣布所有人的权利开始摆脱绝对、独断的权利：这种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约束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保卫是如此必要和有密切联系，以致他不能丧失它，除非连他的自卫手段和生命都一起丧失。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凭夺去生命。谁都不能把属于自己所有的权力给予他人；凡是不能剥夺自己生命的人，就不能把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给予别人。

人类不仅是自由的，他们也有自由的责任。他们永远不能抛弃自由而变成别人的奴隶。然而，洛克的观点是，这种自由正是让奴隶的强制劳动变得合法。尽管人类不能放弃自由，却可以失去自由。每当他们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比如说反对人类的战争。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反对自由的敌人，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了自由：“诚然，当一个人由于过错，做了理应

处死的行为而丧失了生命权的时候，他把生命丧失给谁，谁就可以（当谁已掌握他时）从缓夺去他的生命；利用他来为自己服役；这样做，对他并不造成损害。因为当他权衡奴役的痛苦超过了生命的价值时，他便有权以情愿一死来反抗他的主人的意志。”

这种结论看起来合乎逻辑。如果一个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失败者失去了它所有的作为人的权利，那么胜利者就会获得对失败者完全独断的权利。胜利者可以非常合法地杀死失败者，也可以“从缓夺取他的生命”，利用他来为自己服役，来强制他为自己劳动，这样做，“对他并不造成损害”。如果被征服者不想屈从，他有自杀的自由。洛克非常愤世嫉俗，只给了持不同意见的人一种选择——强迫他们的主人谋杀他们。他把这个叫做“专制权力”：“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可以随意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因为自然在人们彼此之间并未作出这种差别。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因为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既没有这种专断的权力，也不能给予另一个人以这样的权力来支配他的生命。”

洛克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专制权力，对他来说，这也是遵循人权：

……它只是侵犯者使自己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时放弃自己生命权的结果。他既然抛弃了上帝给予人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准则的理性，脱离了使人类联结成为一个团体和社会的共同约束，放弃了理性所启示的和平之路，蛮横地妄图用战争的强力来达到他对另一个人的不义的目的，背离人类而沦为野兽，用野兽的强力作为自己的权利准则，这样他就使自己不免为受害人和会同受害人执行法律的其余人类所毁灭，如同其他任何野兽或毒虫一样，因为人类不能和它们共同生活，而且在一起时也不能得到安全。所以只有在正义和合法战争中捕获的俘虏才受制于专制权力，这种权力既非起源于契约，也不能订立任何契约，它只是战争状态的继续。因为同一个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人怎能订立什么契约呢？

他接着说：“征服者在正义战争中对被他打败的人所取得的支配权是完全专制的，后者由于使自己处于战争状态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因此征服者对他们的生命享有一种绝对的权力。”

尽管他们仍然作为战争囚犯活着，他们已经不能掌

握自己的生命了。他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胜利者：“人权的丧失给予主人们以第三种权力，即专制权力，来为他们自己谋利益而役使那些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由于人类只是物主，没有产权他们就会被赢得胜利物主所掠食。如果胜利者愿意，他们将会合法地称为奴隶，直到他们死亡。“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仆人，我们以一个特殊的名称叫他们为奴隶，他们是在一次正义战争中被获的俘虏，基于自然权利要受他们主人的绝对统辖权和专断权力的支配。像我所说过的，这些人既已放弃了他们的生命权，因而也放弃了他们的自由，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处在奴隶状态中不能有任何财产——他们就不能在那种状态中被认为是政治社会的任何部分，因为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

但是洛克很自然地与被征服者的物品担忧：“如果征服者的征服是合乎正义的，他就对一切实际参加和赞同向他作战的人们享有专制的权利，而且有权用他们的劳动和财产赔偿他的损失和费用，这样他并不侵害其他任何人的权利。”胜利者的损失可以从被征服者和被奴役者的财产中获得补偿。这是完全合法的，根本不存在偷窃或者抢劫。被奴役者必须向他们的主人为奴役他们而发起的战争付出代价。

通过这种方法，洛克可以跨越任何国界获得奴隶。奴隶制度下的强制劳动，就像已经介绍过的北美洲的情况，能够理直气壮地实施。征服者也可以接受“人是生而平等的”这样的原则了，也能证明他们使用的强制劳动的正确性了。

在奴隶制度的合法化方面，洛克比历史上所有在他以前的作者都要卖力。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式的奴隶合法化，看起来只是直白的家长作风。同样，洛克比霍布斯走得更远，霍布斯只是把奴隶制度作为一种事实，并没有提及合法化的问题。霍布斯没有承认社会契约，包括奴隶和奴隶制度的正确性。因此，他认为奴隶制度是非法的而且认为奴隶有权利起义。所有的这些都被洛克改变了。他也不承认包括奴隶的社会契约，但认为自然法会合法地谴责他们的社会地位。

洛克已经声名狼藉了。在法律的名义下，他反对国王的神权和专制主义。然而，他又论证了比国王的神权更进一步的专制权力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洛克在专制主义的合法化上走向了极端，以至于最后征服世界的现实看起来也不坏，而且有其正确性。征服者们都不受约束，这和他们能够合法地做的事情相比，看起来他们做的并不多。

对北美洲当地居民征服的合法性

洛克的论述又一次从自然状态开始，没有奴隶，也没有专制权力的合法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推论出了奴隶制度下强制劳动的可能性和专制权力的合法性。现在，他开始论述了在自然状态下世界是所有人的地球，然后总结说有些人可以毫无限制地垄断世界：

上帝既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兽类，既是自然自发地生产的，就都归人类所共有，而没有人对于这种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但是，这些既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有好处或者有好处。

因为是人类所“共有”，因此，洛克寻找一种私自

占有的正当理由。

通过劳动获得的产权 洛克详细分析了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自然状态下世界被私自利用。他一直重申这种分析指的是在北美洲以及那里的人们所拥有的土地。在他看来，任何人都可以过来占有那些尚未有主人的土地。但是人们并不能想占多少土地就占多少土地，只能根据他们能有效工作的能力来决定。这种情况比公民社会和货币的使用还要早。人们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容易腐烂的，因此生产超过需要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剩余的会腐烂。这种情况随着货币的使用发生了变化，货币能够让人们积累超过他们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为工作者提供所需物品的土地的真实劳动给在自然状态下拥有土地提供了一种方法，并且每个人只能占有一小块土地，其余的土地仍然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类。

洛克非常重视通过在自然状态下的劳动来证明土地划拨私有的正确性，因为这是攻占北美洲合法化的基础：“因此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成为我的财产，无需任何人的让予或同意。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

产权。”

任何人只要在土地上劳动，就会成为它的主人。洛克不关心这种劳动来自土地的真正主人还是来自他的仆人。但洛克坚持认为这种占有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所应得，就归他人所有。上帝创造的东西不是供人们糟蹋或败坏的。”

到现在为止，结论很简单。既然北美洲在自然状态下，欧洲人就可以来占有他们工作的土地。他们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也拥有同样的权利：“所以，在最初，只要有人愿意对于原来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劳动就给予财产权”。他又接着说：“因此，全世界初期都像美洲，而且是像以前的美洲”。

按照洛克的计划，这种论述有它独特的意义。至于北美洲，洛克认为当地人民根本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他们实际工作那部分的所有者。其余的东西属于所有人“共有”，所以，也属于来此占有土地的欧洲人。当地人如果敢于反抗，他们就把自己置于战争的状态，发动了非正义的战争，于是可以被合法地像野生动物一样被统统杀死，或用专制权力加以征服。另外，征服者还

可以合法地要求因为战争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这样，当地人民甚至会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转给征服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洛克不遗余力地分析在公民社会出现之前，在自然状态下产权的拥有所流行的原因。在他看来，当时北美洲还没有出现公民社会，以便让他描述当地人口和欧洲征服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现实中，洛克非常想比这个走得更远。

从洛克的这些论述来看，他只是论证了北美洲的征服者和当地居民对土地的权利完全一样。他们进入自然状态，每人只能占有满足个人所需的土地，而且不能超过这个限制。所有其他的土地继续属于所有人类。但是对于征服者来说，那是不够的。洛克需要论证征服者怎样才能毫无限制地占有和积累土地。

通过货币的使用积累产权

洛克没有能够预测到作为公民社会基础的社会契约。而且他还预测说不会有这种社会契约。如果他在现在做论述，他肯定会把当地人民包括在这种社会契约之内，以便它会是一组对手之间，即征服者和当地人民之间的契约。由于很明显的理由，他避开了这种可能性，

而寻找一种和任何社会契约都不相关的条约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于是，他宣布：“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所共有；但是，既然上帝将它给予人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从它获得生活的最大便利，就不能假设上帝的意图是要使世界永远归公共所有而不加以耕植。他是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的（而劳动使人取得对它的权利），不是给予好事吵闹和纷争的人们来从事巧取豪夺的。”

洛克寻找原因来解释为什么那些为自己利益而争取“最大便利”的人以及“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应该拥有这些产权。他们就是积累财富并在使用资源中承诺效率的人。在人人都享有世界的自然状态下，这种情况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积累超过了“真正有用的东西”：

对人类生活实在有用的东西的最大部分，以及诸如世界的最初处于公有状态的人们所追求的生存必需品，如现在的美洲人所追求的那样，一般说来都是不能耐久的东西，如果不因有人利用而被消费掉，就会自行腐烂毁坏。

关于这一点，没有比美洲几个部落的情况更能作为明显的例证。这些部落土地富足，而生活上的

一切享受却是贫困的。

这里年产二十蒲式耳小麦的一英亩土地和在美洲的另一英亩土地，倘用同样的耕作方法，可以获得相同的收成，它们无疑地具有相同的自然的固有价值。然而人类从这块土地上一年的所得的好处为五英镑，而从那块土地上，假如一个印第安人所得的一切利益在这里估价出售的话，可能是一文不值。

所以他现在炮制出一份人类协议，比任何的社会契约都要早，并暗含着使用货币的成分：“……这就很明显，人们已经同意对于土地可以有不平均和不平等的占有。他们通过默许和自愿的同意找到一种方法，使一个人完全可以占有其产量超过他个人消费量的更多的土地，这个方法就是把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可以窖藏而不致损害任何人的金银；这些金属在占有者手中不会损毁或败坏。”

货币的使用结束了自然状态，它论证了同一个人可以积累尽可能多的土地，因为土地所带来的产品可以不会损毁或腐烂。由于货币的使用，勤劳和有理性的代理商们就有权利毫无限制地积累产权，并宣布自然状态下的自然限制无效。同时，他还强调，仍然有大片大片的人们公共用地可以来被无限制地瓜分。自然，他指的是

北美洲：“虽然如此，还有大块的土地（那里的居民尚未同意和其余的人类一起使用他们的共同的货币）荒芜不治，比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所能开垦或利用的还要多，所以土地还是公有的。不过这种情形，在已同意使用货币的那一部分人类中间，是极少会发生的。”

所以当那些还没有和其余的人类一起使用货币的居民还在受限制于天然的土地边界时，那些移民者却不受此限制，因为他们已经同意使用共同货币。这种由洛克创立的协议适用于“能够超出社会的范围，不必通过社会契约……。”这样做的基础是“默许和自愿的同意”。所以协议的有效性并不来自一种构成公民社会的社会契约，而是开始于自然状态，并从那以后开始适用。

在这里货币的使用本身就等同于财富积累和产权增加的权利，货币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是整体生产条件，本身就包含一种道德。货币的使用和不接受这些生产条件和这种道德看起来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然而，公民社会一建立就规定了产权：“而政府则以法律规定财产权，土地的占有是由成文宪法加以确定的”。但毫无疑问，这种“财产权”是受由使用货币的协定转化而来的自然状态所支配。洛克把公民社会的基础——社会契约——的地位看作低于货币使用协定。

超越法律和政治的全球市场

这种为产权积累而出现的货币使用协定非常普遍，而且超越了国家的法律对整个世界提出了要求。它凌驾于任何法律和宪法之上。无论货币的使用渗透到哪里，它都会在生产条件和自然法道德上决定资产阶级社会。正是为产权积累而出现的货币使用催生了超越所有“积极的宪法”的真实的根本法律。

事实上，这里还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形成了一种全球系统的基础，即全球市场系统。在洛克的书中，一种总的，全球市场的雏形也依稀可辨。从这一点上说，洛克不再是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恰恰是普遍主义的领军人物。然而洛克毫不怀疑，如果普遍主义被应用到全球，那么作为全球的一部分的英国就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也正是打着普遍主义的旗号，美国后来也变成了超级大国。

这种以在洛克的语言中为产权积累而使用货币的所谓共识为基础的普遍主义，仍然是当今社会的金融全球化的基础。它标志着对跨国投资协议的争论。争论公开称要把这种协议转变成为真正的宪法，让各国

的宪法进行效仿。但是，这种为自身积累而出现的跨国资本的权利转移同时也意味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稳定性。

这种货币机制详细阐述了财产权，也就是洛克所称的自然状态。由于货币使用协定的使用，它不再是毫无限制的对财产的所有权，而变成了纯粹是资本家们的财产权。于是洛克把产权分为为生命所需的产权（自然状态下的产权）和为积累而出现的产权（根据货币使用协议而出现的产权）。后者就是资本家产权。洛克对它表现出绝对的偏爱。

洛克是第一个详细阐述这种贯穿整个世界市场的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物。然而对洛克来说，这是他为攻占北美洲的一个重要论述。因此他能够把他关于世界最初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理论和无限制积累的权利联系起来，而这种权利超越了所有政治体和国家性组织。征服者现在可以利用自然状态来占领那里的土地，而不用遵守洛克为当地人制定的土地使用限制。他们没有反抗的权利。如果他们接受货币，他们就被迫“默许和自愿的同意”这种制度，并失去他们对土地的拥有权。如果他们不接受货币，他们同样要失去他们的权利。他们有权利选择是被击毙还是被绞死。如果他们胆敢反抗，他们就

是起来反对人类，就会像野兽一样被看待。他们已经进入了圈套，只能坐以待毙。

所以，北美洲几乎所有的当地人们在被征服过程中被消灭也就不奇怪了。这符合洛克的战略。

洛克从产权中得到人权的方法

洛克并没有详细列出人权，只是原则性地概括出可以得到人权框架。他明确提出了四项这种原则：(1)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2) “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3) “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既没有这种专断的权力，也不能给予另一个人以这样的权力来支配他的生命”；(4) “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

产权是人权的基础

事实上，洛克所有的论述的起点都是来自这四项原则的导向。然而，毫无疑问，这并非他的原创。这些原则在 1648～1649 年的英国革命的时候被首先提出来。它们是由独立派及其最激进的部分平等派提出来的。它

们是在这次革命的名义下得到提升，这次革命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平等。它受到了国王和贵族专制的反对。它反对奴隶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涉及非洲黑人，还会影响到任何肤色的任何人。对黑人进行集中奴役直到 18 世纪前半叶才出现。但是这种对奴隶制度的反对也包含了对奴役的反对。独立派和平等派也相同地提出了世界应该属于所有人，因此他们号召农民拥有土地，把手工业者从束缚他们自主行动的行会中解放出来。他们理想中的完美境界就是一个小生产者的社会，所有人都拥有独立的私人产权。所以，财产权就变得非常关键。但是他们所主张的产权并不是资本主义产权，而是为所有人的独立生活服务的产权。这并不是主张平等的完全激进的号召，而是一种由政治和经济自由之外的集团设计出来的平均主义趋势。

即使洛克从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开始，他也必须从第一次英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开始研究。光荣革命是第一次革命后的热月革命，因此也称是第一次英国革命的合法接任者。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对以前的大众革命的最后胜利。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帝国主张的胜利。洛克也提供了相应的政治理论。这种资产阶级的小胜利不可能是定论，因为它必须把这场胜利合法地表述为整

个英国革命的胜利。约翰·洛克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书不是关于政治的书，而是将要制定政策，以及有意这样做的书。它给了资产阶级革命合法性的气氛，并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

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洛克颠倒了作为大众革命基础的人权框架。他改变了他本来采用的人权的拥有者。人权的拥有者不再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而是一个集体抽象的东西，是整个人类。现在，包括权利和个体的人类成了这些权利的拥有者。但是人类也包含财产。作为拥有者，个体也是人类的一分子。只有作为拥有者，人类才能拥有尊严。作为真实的有需要的人，完全服从于产权。这种产权现在是资产阶级产权，受竞争和效率所制约。经常出现在洛克脑海中的敌人也在保护他们的产权。北美洲的当地人也在保卫作为他们产权的土地。英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在保护他们的产权，并争取产权。但是在洛克看来，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产权，是真实的人的生活中的机会构成的产权。洛克把这种关系颠倒为由产权积累的逻辑组成的个人关系。从洛克的观点来看，作为个体的人类组成的产权是非法的，而且阻碍了社会进步。麦克弗森在这里谈到了占有性个人主义。

在洛克认为合法的第一次英国革命和光荣革命之

间，出现了带有相反产权观以及人权观的冲突。实际上，洛克用一种社会制度逻辑的权利来代替人权，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人只是作为辅助因素存在。作为人类和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只能主张由这种社会制度逻辑产生出来的权利，这种社会制度现在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具有绝对性，而且是上帝的意志。

洛克把这种观点发展到了极端。当洛克开始论述在货币使用协议以前的自然状态时，他很清楚人类的另外两种基本权利，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和拥有财产的权利。但当他论述到货币使用协议以后，这些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他就只知道一种人权，即财产拥有的权利。现在洛克只是把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看作是财产拥有权的一种简单推论，也就没有留下人类尊严超越财产拥有权以及超越社会制度及其逻辑的任何记录。所以洛克可以宣称“公民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于是他得出结论，“人权的丧失给予主人们以第三种权力，即专制权力，来为他们自己谋利益而役使那些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这种权力是专制的，因为那些丧失了所有产权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对他们生命的所有权。他们没有任何作为人的尊严而具有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

利。丧失了产权，他们完全听从于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主人有权利杀死、折磨、伤害、奴役他们。这就是洛克产权观给人类观所带来的结果，人权的主体不是人本身，而是产权。

产权的敌人没有产权

洛克的人权颠倒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进行概括，虽然洛克没有直接引用，但这也反映了他的立场：和产权作对的人没有产权。重要的是，产权的丧失包括失去对自己身体所有权和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这种公式涵盖了洛克实行的所有颠倒形式。正是这种准则使得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恐怖主义得以合法化。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按照圣茹斯特方式进行的法国革命中：和自由作对的人没有自由。波珀在冷战时期也套用了相同的公式：和宽容作对的人没有宽容。这样，波珀成了拉丁美洲各国国家安全极权专政政府信奉的哲学家也就毫不奇怪了，特别是乌拉圭和智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清洗时期，这种公式再一次出现，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制度而稍作修改。在 1935~1940 年之间苏联总检察官维辛斯基的呼吁中再

一次出现。正是利用了这种公式，各种制度下的以重视人权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打着人权的旗号纵容侵害人权的事件。

也恰恰是这个公式让洛克竭力论证的“专制权力”合法化，也经常被用来证明此类暴力的正确性。如果一个人的人权超越了产权，它就剥夺了这个人的权利，尽量压缩人的尊严，并用制度的权利来代替，然后称之为人权。在现代时期，这个公式是通用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历史上的不同局势进行不同的调整。很明显，现在的全球化战略和这种公式也有关系，并且再一次把人权颠倒成为压制人类尊严的权利，把它们变成全球化制度的权利高于人权的工具。这种制度也以人权的名义这样做。这样一来，这个大规模的公司和个人官僚机构看起来就变成了洛克的“理性法律”的宣传者，也成了人权的真正拥有者。于是他们就拥有了洛克所说的“专制权力”。

从人权的角度，洛克追溯了奴隶制度下强制劳动、灭绝土著居民以及殖民统治全世界的正确性。他从这种颠倒中推论出来的理性法律就是在私人产权制度之内的无限制资本积累。在 19 世纪末期，马克斯·韦伯之后，私人产权就不再被叫做自然法，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市场

规律进行的效率和竞争的争论。但后来，这种争辩也可能像洛克一样否定人权，甚至连形式都不用改变。这种制度逻辑以人权的名义取代了人权，而人们也被剥夺了人类的尊严。然而，这种机制早在洛克之前就在父权制中有所体现。男人，在其男性自尊的驱动下，把自己描绘成人类的化身和上帝赋予全人类行动的理性法律，以便使女人转变成潜在的可以驯养和毁坏的动物。在洛克以后，种族歧视在 18 世纪盛行起来。于是，白人采用了理性法律，在和“有色人种”打交道的过程中宣布他们自己是人类的代表。

在另一方面，在洛克的思维中，这种人权的倒置已经和乌托邦式的理想联系了起来。洛克表达出一种乌托邦式的技术进步。需要人性化的人际关系和现实中的人的关系被一种用来改善世界的技术的空洞的期望所代替。这种技术进步的许诺非常之大，以至于有了它，所有的人权侵害都不值一提。^① 对无限进步的期望重重地

① 在论述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时候，洛克说：“我非常同意这些著作所带来的思考给了我们向作者表达羡慕、尊敬和钦佩的机会：如果导向正确，对人类的有益程度可能比那些通过建立医院和养老院而树立功德丰碑的人还要高。从传播知识，提供以及增加有用商品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发明印刷术、使用指南针的人所做的贡献以及从坟墓中拯救出来的东西要比那些建造大学、贫民习艺所以及医院的人要多”（洛克 1690b，第 2 卷：352）。

压在代表真实人权的可能性上，因为这种权利一直，也是必然地，以保证无限进步能力积累的歪曲形式出现。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和斯大林主义，并出现了类似的结果。这并不是乌托邦的问题，而是一种乌托邦被颠倒，进而宣扬侵犯人权的过程。这种技术上的乌托邦理想甚至能够以为实用作考虑的形式出现，就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自由社会需要一种被缩减为维持生命的道德规范——不是维持所有人的生命，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体生命来拯救大多数人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道德规范的规则仅仅是能够导致‘考虑生命’这一原则上：产权和契约”（哈耶克 1981）。

这种考虑具有伪善性和欺骗性，因为它以未来的知识为前提。但是除了哈耶克之外，没有人能够了解未来。不过，这种争论是侵害所有人权的有效方法。人权禁止“牺牲个人生命”，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违反了人权。而哈耶克提出的“考虑生命”却指责保护人权是“拯救大多数人的生命”道路上的障碍。这样，哈耶克就很容易地指责保卫人权阻碍了进步。“人类”再一次压制了人权，也在他们要求人类尊严的时候压制

了人类。^①对整个国家的毁灭和对全体人员的灭绝于是就变成了对人类和人权可能的贡献——后者不再被看作是真实存在的人的尊严，而变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②

在后现代主义的内容中重新获得人权

一个人对人权颠倒的反应只能是为真实的人重新获得人权，就像他们在人类尊严上所表达的那样。我们首先引用阿尔伯特·加缪在《叛逆者》中的一段话：“结果验证手段吗？可能是。但是什么验证手段呢？这个问题打开了历史思想，叛逆者做出的反应是：手段。”

事实上，人权并不是寻求权宜之计的最终目标。然

① 保罗·提班上校在 27 岁的时候是 1945 年 8 月 6 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飞机的飞行员，他接受了采访：

问：你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很显然是作为 509 集团中的一员接受使用投弹训练。我可以说那件事情拯救了数百万的生命……我只想补充的是，今天为了能够拯救同样数目人的生命，我会做同样的决定。

这场采访是由安德烈斯·希门尼斯为一本哥伦比亚杂志所做的，并于 1999 年 8 月 22 日发表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很明显，提班把对广岛的轰炸看作是对人权的贡献。他像哈耶克一样做了“考虑生命”。如果这种考虑也被认为是合理的话，那么几乎任何人类善行都能够被描绘成对人权的贡献。

② 哈耶克把自由主义分为两类，一种好的，一种坏的。好的自由主义从洛克开始，而坏的自由主义从卢梭开始。见哈耶克 1952：12。

而，当有人这样对待人权的时候，人权被颠倒的问题也就必然出现。把它们作为最终目标来争取只能让争取的手段侵害人权。然后人权的所有者，必然地变成了制度。如果人权被视为一种最终结果，那么它们必须成为理性行动的目标。这种最终目标形成了制度，以这种方式对待人权是以强迫接受制度作保证。制度可以通过理性的手段来争取，而人权则不能。因此，人类就吞噬了人，人不再保证人权，而保证制度。在今天，制度就是民主、产权、市场、竞争和效率，这些本身就被认为是制度化了人权。因此，按照当今流行观点，制度的地位要优于人权地位。

通过把这些制度作为最终目标，人们可以寻找手段来强制实行。然而，为了实施这些制度，人们不得不破坏人权，而他们正是以人权的名义在行动。接下来就是人权的颠倒把破坏人权变成无条件的命令。

作为对比，加缪提到了手段。如果人权被看作是最终结果，那么它们在实现的过程中肯定会被实现的手段所侵犯。但是恰恰是通过这种方法，这种手段产生了真正的结果，而且这种真正的结果不会是人权。把人权作为最终目标成了纯粹的花言巧语，在其背后，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清晰可见，就是强制推行某种制度体系和某

种统治。对手段的批评，而不是对某种人权的雄辩，能够产生结果。对手段的批评展现了一种手段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事实的语言。它展示了这种公开宣称的结果存在的范围。

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家灭绝史，是一部民族和文化灭绝史。这是赤裸裸的手段，而宣布结果的语言却是截然相反。他们只说到了白人的负担，他们带来了文明的世界，给世界带来了文化和人权。西方的历史是西方人制造人间地狱的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运用语言上的花言巧语，他们粉饰自己给世界各地带来了天堂。这种天堂包含着西方带来的地狱。这就像在地狱，魔鬼日夜不停地折磨着被诅咒的人，然而没有人折磨魔鬼。他们甚至以为他们在天堂。

这种手段和最终结果在语言上的不同形成了对比。人权只有通过手段语言来获得人权不是最终结果，但是对手段的挑战被独断专行的结果所考虑和利用。对人权的讨论于是肯定成为对人权手段兼容性问题的讨论。所以，人权可以用作判断手段，并不是结果。即使这种最终结果的正确性是由人权相关信息来证明的，人权仍然是判断手段的标准。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加缪所提出的对人权的主张是

一种反叛，是活生生的人拒绝变成制度的产物的一种反叛。但这种个体的反叛也意味着反对人权变成最终结果，而最终反对整个人类对个体的统治。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洛克身上找到一种人权颠倒的模式，它已经让历史从未间断地发展到了今天。从现代观点来看，这就是法国哲学家让·佛朗索瓦·利奥塔(1979)所说的合法化叙述。这种模式稳固地支撑着现代主义结构，并经常随着历史新的发展而改变。它是现代主义者形成的神话。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利奥塔说起现代主义合法化叙述，他并没有提到洛克的计划，这一点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他提到了另外两种合法化叙述，源自卢梭和马克思的思想。他还刻意隐瞒了洛克的合法化叙述，这种合法化叙述比另外两种还要早，而且对卢梭和马克思对此也做出了反应。如果没有洛克的这种观点作为参考点，对卢梭和马克思的思想根本无法理解。卢梭和马克思对这种基础的计划持批评态度。卢梭从公民的概念作批评，而马克思从人作为有需要的自然生物这一角度作批评。但他们都反对洛克的计划。

相反，利奥塔把卢梭和马克思誉为现代主义的创立者。于是他的结论是当他们的观点开始失去以前的合法

性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也就开始了。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当利奥塔提到这些思想家的时候，并没有提到卢梭和马克思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代表 19 和 20 世纪反对被洛克格式化了的现代放纵势力的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包括 19 世纪导致资产阶级国家废除强制劳动的解放奴隶运动、自从 18 世纪末期以来解放犹太人的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殖民世界解放文化运动以及殖民地独立运动。

从这些伟大的解放运动中，我们能惊奇地发现一个事实，大多数的运动是由洛克计划中所说的“对整个人类”有危险的、“堕落的”、“有害的”人群发起的。按照洛克的说法，他们发起对“人类的战争”，应该像对待野兽一样对待他们。那些在 19 和 20 世纪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人是约翰·洛克提出的现代主义基本合法化叙述里的野兽。

他们却是声称通过现代主义被人权所背叛的人。洛克并不承认他们中间任何人拥有人权，并以人权的名义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出来。洛克不给非资产阶级文化和反对殖民和攻占的人任何权利。他们只不过是野兽，资产阶级征服者可以，也应该消灭他们。然而，恰恰是这些解放运动首先把人权带到了现代阶段。因为有了这些运

动，人类第一次以权利拥有者的身份出现，这种身份并非来自，或推论自，任何形式的产权，而仅仅是来自作为人类的尊严。这些权利接着出现在 20 世纪各种各样的人权宣言中。相反，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有时又称美国的人权宣言）的导言却并不是有关人权的。《权利法案》则更进一步，把当时宪法中包含的基本权利又重新阐述了一下。上面所说的导言是建立在自然法论证的基础上的，大部分是从洛克的著作中选出来的（人的自由和平等，被统治者的政府制度）。所以在导言和《权利法案》中要求的权利反映了洛克创立的政治哲学。这说明了为什么在此之后，灭绝北美洲当地人民的事件也能发生，而且和《独立宣言》以及美国的宪法毫不抵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独立宣言》发表后 100 多年的时间内仍然拥有大量的奴隶制度下的强迫劳动。如果你研究一下 1776 年以约翰·洛克的方式宣布的人权，你会发现它们根本不矛盾。以这种宣言的精神，自由就是奴隶制度，自由就是灭绝制度。

这些大解放运动把人权带到了现代时期，一路通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美国政府签署了宣言，但是只是批准了其中很少一部分人权条文。签署具有宣告的特点，但没有任何义务，而批

准——在这里应该是美国参议院来批准——就意味着有法律约束力。有两个关键文书没有被批准：(1) 1966 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7 年签署）；(2) 美洲人权和自由公约（1969），也是在 1977 年签署，但没有批准。即使在已经批准的人权文书里，参议院也设定了一些限制性的条件，使得它们的效率大打折扣。这说明了这些冲突并没有解决。

利奥塔通过这些解放运动和卢梭和马克思的思想来鉴别现代主义，而这些思想导致了《世界人权宣言》。根据他的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这些文件作为合法化叙述已经失去了效力。但是他所称“后现代”实际上是带有极端色彩的现代主义：它否定了人类解放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废除了 19~20 世纪解放运动所带来的人权。一种赤裸裸的现代主义正在形成，它宣布所有人类解放的支持者和所有抵抗者都是野兽，可以被消灭。

于是我们知道约翰·洛克的思想绝不是现实的理论。它是非常不同的事物。它创建了一种绝对性的框架，并自己建立了现实。正因为是他自己建立了现实，我们就不能通过现实来反驳他。这是一种循环的思想。如果一个人认可这种绝对性的框架，那么现实就是洛克所宣布的那样。另一种现实不可能出现，除非是作为一种绝对

性框架来批评这种思想。但是，对于通过这种绝对性框架了解现实的人来说，这种批评不可能让他们看见另外一种现实。

在一种绝对性框架下解释现实的这种计划不仅是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也是所有现代主义的基础。每当提到社会变得极端的时候，这种计划就会以其最纯粹的方式出现。洛克把这种框架阐述成为一种绝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而且任何一种这样的社会只有在洛克第一次展示的计划里才能变得极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仅是洛克的一项古老的、理论上的发明，更是一种发现。洛克发现绝对性框架首先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是变成极权的基本的东西。于是，这不仅仅是洛克的想法，而是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客观的一部分的范畴。洛克发现了一个事实。

斯大林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在变成极权社会过程中也发展了类似的模式，其基础是社会主义产权。它改变了洛克的计划，但保留了它的结构。在这里，洛克计划再一次实现了绝对性框架的作用，创造了现实，而避免了被驳倒。但是在法西斯主义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如果你把洛克计划中他用来颠倒人权时所提到的“人类”和“情理法”，并用“权力的意志”来代替，洛克的计

划就是法西斯的形式。你于是会发现当所有现代主义在绝对化过程中要消除个人权利意义上的人权的时候，它总是按照洛克的方式创建它自己的现实。这种计划就以所有现代主义的绝对性框架的形式发布出来，尽管也有洛克当然不能预见的变化范围。

如果要有一种超越现代主义的社会，那肯定是一种把这种现代主义计划抛到身后的社会。许多人今天已经知道，如果想让生命有可能继续下去，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绝对主义，正在重复着洛克的计划发展。洛克把绝对化的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是一种工程，但我们的社会最终把用洛克计划的手段实现了这一切，并带来了苦果。

第四章 全球市场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取消 维持生命的承诺

约翰·洛克关于产权的理论总结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尽管有一些连续性的因素，结果还是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概念，这个社会与古代的产权拥有社会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在那个时候，产权意味着对土地和奴隶的根本占有（比如说他们的劳动）。不过，建立在产权和货币使用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已经成为了增加财富的一个主要手段。作为对比，在现代社会，资本产权的积累已经成为所有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原则，这一点洛克已经在他的定义中说得很明白了。土地的拥有以及所有自然资源都被看成货币价值，并因此服务于（无限制的）财富积累这一目标。相反，那些只占有劳

动能力的人为了积累资本成为了雇佣劳动力。于是，土地和劳动都变成了资本拥有者增加他们资本产权的手段。资本产权于是就成了对人和土地行使间接权力的基础。至于资本积累，它不仅仅出现在通过土地生产的农业上，还存在于工业生产中，机器的使用，以及买卖成品，固定资产现在也可以和土地和劳动力一起被列为传统的生产资料。以资本积累为中心对所有这些元素的分类都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进行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传统的以需要为基础来交换的市场不同，因为所有的交易只为一个目的服务：资本的积累。于是由洛克首先提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定义就建立在产权的联系上。这种联系带有货币为中介的特点，比如资本积累。这种概念并不是在单个孤立的经济现象中反映出来的，而是在所有的生产关系中均有反映。就像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它已经有了自然法的地位，超越了所有政治与法律约束，应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支撑着为资本积累而建立的大全球市场。

任何批评性的分析和寻求变化都必须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进行组织的。由于这一制度产生很少的胜利者，而会有很多的失败者这样一个事实，胜利者就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那

些被认为在（不平等）资本积累这一问题上人们的“默许同意”是持续的。为了要贯彻他们资本积累的制度，他们需要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工具，也需要经济权力的工具。作为像雇佣劳动者这样的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也必须和政治与法律活动发生联系，来限制资本拥有者的权力。

洛克的产权理论，从 1787 年的美国开始也变成了西方法律制度和宪法的基础（里特施蒂克 1975：92）。它开头的措辞就是“生命、自由、产权”。但“从自由和产权中产生了产权自由”至少延续到了 1937 年（同上：134）。根据洛克的说法，人类是拥有产权的物种。所有的人权都来自产权。于是，国家惟一的目标就是保护这种具体化了的产权。由于产权的目标和货币系统一起，甚至在国家产生以前就开始自己扩散，所以在一开始政治-法律制度就产生大规模的所有权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发现法国革命时期在其宪法中就有相同的情况。1789 年的《人权宣言》把产权说成是神圣的权力（17 条）。借鉴了罗马的法律，《拿破仑法典》（民法典）中的第 544 条里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规定了产权的绝对性，这也成了后来所有民法典的基础：“La propriété est le droit de jouir et disposer des choses de la manière la plus

absolue, pourvu qu' on ne fasse un usage prohibe par les lois ou par les reglements”（产权是对物品使用和占有的绝对权力，只要使用方法不违反法律和法令；引自宾斯万格 1998: 130）。

自从 19 世纪以后，特别是在 1929 年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典型的自由经济破灭以后，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爆发了战争，使得（大）所有者在法律上至少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但是，在 19 世纪，这种社会责任被严格限制在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习惯法的范围内（里特施蒂克 1975: 142）。关于产权使用的问题，就没有限制，法律只是规定产权的使用不能无故伤害，以及垄断不应该妨碍市场的功能。第一次真实的改变发生在美国的新政以及随后在 1937 年出现的“宪法革命”（同上: 148）。那个时候，最高法院的大部分从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转向认可政府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下有权力限制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就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的最低工资制，工会的权利被承认，而且关于土地使用，价格和租赁的规定也被引了进来。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国家的征收赋税的权利，在 1937 年以前，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在认为某种经济活动不必要或者具有破坏性的时候取消

这种经济活动，比如说赌博代办点（里特施蒂克 1975：168）。在征收的时候，它只是要证明这些是用于公共目的，而且国家也被期待有相同的补偿。即使在工业化制度下，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实行高度中央集权也会被看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特别是自从这种国家被看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来赢取经济利益以后（同上：174）。同时，它还认为，像雇主的贡献或者通过公共服务获得收入的新权利也应该受到像产权一样的保护（同上：191）。

我们在德国也看到了类似的发展，虽然这里不限制资产阶级产权的发展和法国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比起来要慢得多（同上：191）。在产权方面向社会责任前进的过程中，《魏玛宪法》作了第一次尝试。第 153 条规定：

1. 财产权由宪法进行保障，其内容和限制由法律来规定。为了公共福利，可以依法对公民的财产进行征收。除了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征收必须给予适当的补偿……

2. 财产权也应该负有义务。它的使用必须服务于公共福利（同上：252）。

这种新的宪法手段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加强而成为可能。在第一段里，产权的保证受到

限制性条款的制约，这限制性条款规定，产权的内容和限制必须由立法机关决定。第二段甚至允许不用补偿的征用，只要最高法律允许。第三段为立法机关干涉私人使用案件提供了可能。更进一步的条款加强了这种新的手段：第 154 条允许国家保留个人遗产的一部分；第 155 条让土地所有者服从于公共利益；第 156 条明确强调了国有化的权力。

由于有了这种立法制度和实践，魏玛共和国本应该在 1929 年之前采取决定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是，德国最高法院却加以阻挠。德国最高法院的人员组成自从德国皇帝时期就很少改变，它极力保证保持现状。在各类最终上诉案例中，最高法院扩展到这种财产保证的特权，并对国家社会责任的执行的权力而加以限制（里特施蒂克 1975：255）。这一切都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住房控制的反对，扩展到对统治阶级封建土地收入的承认，以及对大商业从通货膨胀中牟利的认同。即使是关于土地的使用，最高法院宣布“在利益最大化中产权所有者的愿望是合乎宪法的……这种榜样是毫无限制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权所有者，不是那些按照其社会责任感行事的人”（同上：267）。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独立代表破坏

了社会的联合。

二战以后德国的发展不仅展示了当时总体经济制度可供选择的范围，特别是产权制度，而且还显示了当时所做的真实选择。随着它灾难性的崩溃，这种典型的自由模式被所有的政治党派和所有人破坏殆尽（里特施蒂克：275）。在后来出现的西德中的两个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联盟党分别在 1946 和 1947 年他们各自的声明中论证过建立“社会经济”制度，联盟党甚至明确谴责资本主义制度。联邦国家在同年起草的宪法中允许把整个工业部分转换成公共所有制，黑森州的宪法甚至把它作为一种强制性规定。美国的军事管理部门的反应是进行公投。结果显示，有 72% 的人表示赞成，绝大多数人赞成国有化，军事政府就禁止了黑森州宪法的实施，直到德国宪法生效。另外，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增加了“金色西方”的吸引力来和在苏维埃统治下的东德相比较，通过社会结构调整来依照原样支配它。所以，由于美国的强迫和诱惑，德国政治体不再实行国有化，那里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在私有企业的基础上进行重组。

另外，在康拉德·阿登纳统领下的联盟党由原来的“社会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由于两大政党必须在新宪法的实施上达成一致，这种经济实质上是建立在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制定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上，卡洛·施密德（社会民主党）提出一项限制保护“服务于保护个人生命或者个人工作的产权”的保证，但未获通过（里特施蒂克 1975：283）。

关于产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我们如何解读德国基本法呢？重要的内容出现在第 14 条：

1. 财产权及继承权应予保障，其内容与限制由法律规定之。

2. 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

3. 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赔偿范围如有争执，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条款来解读这部基本法：

第二条：1. 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或不违犯宪政秩序或道德规范者为限。

2. 人人有生命与身体之不可侵犯权。个人之自由不可侵犯。此等权利惟根据法律始得干预之。

第三条：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九条：3. 保护并促进劳动与经济条件之结社权利，应保障任何人及任何职业均得享有。

第十二条：1. 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训练地点之权利，职业之执行得依法律管理之。

第十五条：土地与地产、天然资源与生产工具，为达成社会化之目的，应由法律规定转移为公有财产或其他形式之公营经济，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

第十九条：3. 基本权利亦适用于国内法人，但其范围受权利性质为限。

第二十条：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

第二十八条：1. 各邦之宪法秩序应符合本基本法所定之共和、民主及社会法治国原则。

于是对这些条款三种冲突性的解读也出现了（见克洛斯 1998：36 和 348）。

1. 保守自由主义的解读认为，基本法应该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来理解，特别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为一种保护来反对国家对新兴中产阶级社会的干涉（同上）。这就意味着建立在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基础上

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政治团体来组织的，为的是保护自由和私人所有制。

2. 左翼宪法学派试图把关于产权产生的社会责任和福利国家想法的阐述用下面的途径进行解读，它意味着基本法直接提供了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原则，并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来代替的可能性。

3. 克洛斯和其他人通过仔细研究这些条款的细节，对这些原则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克洛斯得出结论说，国家本身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制定了市场经济制度，其目标是获得财富的抽象产生，所以国家必须保证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样，国家就不仅证明了它赖以维持其征收赋税的权力，也证明了福利国家制度因素的正确性，这种因素可以允许国家以避免破坏所有制市场经济的方式排列经济和社会福利。

第三种论证比较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很连贯，而且它都是在按照基本法起草时的经济理论氛围下进行分析的。在这一时期，人们一致同意不能回到1929年以前的自由主义，而且也不应该再有这种自由主义。在另一方面，反对卡洛·施密德的情绪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任何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在德国，

当时有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威廉·欧肯^①的传统奥尔多自由主义和凯恩斯理论。他们都认为市场只能在政治约束下才能起作用，而且没有国家干预，市场不会起作用。他们以此为前提各自发展自己的理论。奥尔多自由主义参与维持竞争并强加反信任措施。凯恩斯和他的学派把重点集中到四个主要领域：防止经济波动的国家措施，以达到充分就业；能够让利率保持尽可能低水平的货币政策；避免投机的资本流动控制；以及进步的税收政策来扩大社会财富的分配，以便扩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所有这些凯恩斯理论的措施都意味着让经济正常和产权扩大的便利化。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把自己看作自由主义理论家，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论证获得很多的支持，恰恰是因为他引进了为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而设计的措施，这在 1929 年已经得到了验证。

基本法的精髓在其第 2 条和第 14 条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建立促进在基本法范围内人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权利，宪法的拟定者规定了个人自主决定的权力，并把

^① 特别是穆勒·阿曼克和他的学生路德维希·艾哈德，他的学生是后来的贸易和商业部长。奥尔多自由主义者反对放任自由主义，而偏爱有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市场经济。

它作为他们生存的社会框架下的一个宪法标准”（克洛斯 1998：73）。同时，国家保护个人不受那些不尊重别人自主决定权力的人的侵犯。“国家保护公民追求他们的自由不受别人侵犯，必须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其特点是社会上的各成员的利益是根本抵触的”（同上：75）。所以，那是保护抽象意义上的自由，不依赖于任何自由的物质条件，也就不依赖于任何生产资料的使用。在这种程度上来说，即使是第 2 条第 2 款只是保证现实存在意义上的生命。

如果个人发现他/她和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基本法第 2 条就保证他/她的抽象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保证随后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正确性。对于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来说，“自由发展其人格”于是就意味着要和其他的拥有者按照产权的法律进行竞争来增加财富。对于生产资料的非拥有者来说，为了生存，他们的“自由”被缩减成为“把他们的劳动能力置于以财富积累为前提的物质拥有者的处置之下，”而且要“为产权拥有者创造更多的财富”（同上 1998：82）。

第 3 条第 1 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减弱这种解读，事实上更加证明了这种说法。它只是保证法律之前抽象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保证这种社会经济

上的平等。

其暗含的意思就是，由法律所赋予的在抽象的个人自由和自主使用人和产权上的相同身份是和契约是一致的。契约在一个自由国家制度里是被当作一种制度被保证的。

契约的形成是国家在自由的原则下，保证相互交流的存在成为各方在满意基础上一种关系……在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中被泛泛提及的契约的自由在具体经济基本权利上具有真实的担保形式，并在他们依法交易中有内在的处置自由。因此：

- 关于劳动契约的契约自由在基本法第 12 条上有所规定。
- 涉及重大资产的商业在基本法第 14 条中有所规定。
- 在社会上的结社的自由在基本法第 9 条中有所规定。
- 涉及集体合同的结社自由在基本法第 9 条第 3 款中有所规定。

作为一种自由制度的“联合机构”，契约传达了竞争者之间所有经济关系（克洛斯：96）。

参照以上所述，第 14 条第 1 款的财产权的保障是中心条款。我们如何来理解呢？（同上：109）。在好几

起裁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已经给出了这样的印象，这里的“产权”意味着能够赋予个人自由的物质。由于后工业情况的事实，这种所谓的延续了黑格尔理想主义哲学的人权争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首先，绝大多数的人口现在已经被迫成为了雇员，已经被排除在以产权拥有为生存的物质条件之外。其次，资本积累的动态已经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提升了商业事业，因此大大缩减了私有企业家这种理想的模式，使之成为了几种例外。

结果，另一种争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证明却开始普及，这和亚当·史密斯有关。它宣称正是因为竞争，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使得个人在一场自私自利的混战中相互冲突，而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对这种模式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代价却只字不提。

联邦宪法法院还是用了“诡计”来掩盖其在人的产权合法化中不善辩的弱点，它同时把公共法中的权利——比如养老金以及公司决策中工人的参与——合并到了产权的定义中了。于是它就创造出了这样的假象，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和雇员的身份是相同的。里特施蒂克（1975：363）这样辩论道：

如果有人声称这种宪法条文是用来保护经理人

和大股东对工业的控制，那么我们也会放弃谈论人权以及人权和自由发展人格之间的关系。这种基本权利的功能就会和国王在 1251 年在英国男爵的胁迫下颁布的《大宪章》中封建律法的保护相等同。在《大宪章》中农奴是他们所工作的土地的附属物（虽然按照法律可以离开，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少），同样，雇佣劳动者也是资本的附属物。

按照第 14 条的规定，究竟是什么受到“财产权”的保障？它排除了处置权，而不管其使用形式如何……由于毫无争议的、普遍接受的财产的合法性，在谋求生计中产生的所有物质结果都独占地被私人使用：于是，对社会上所有成员来说，财产权的吞并成为了生活的基本方式”（克洛斯 1998：116）。然而，这就意味着多数人口被排除在建立他们自己的生计之外，而不得被迫依靠产权所有者。换句话说，通过其财产权抽象的保障，国家建立起一套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大多数人没有别的选择，为了糊口，只能接受雇佣，并且为产权所有者制造财富。“在第 14 条保障下的生产制度的客观目的就是（通过无限制的定义）来积累抽象的、私人产权。从一般意义上来考虑，这种财产有

一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完美、和它的使用相分离，以及缩减为单纯以国家授权的货币形式出现的定量维数（基本法第 73 条第 4 款）”（克洛斯：120）。

在宪法中，用来表示这种抽象产权的词语是资产。换句话说，财产权是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的。这再一次证明了财产权并不体现在以需要为基础的使用上，而在抽象的财富及其增长上。

个人产权是由这种抽象财富派生出来的。市民们在产权的抽象概念上被放到了相同的基础上，这也给了他们一种平等的假象。这样，基本法在经济秩序上看起来也显得很中立，然而，实际上它很明显选择了所有制市场经济。而且，继承法也保障社会上由财产阶级的延续。

国家定义了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制。这个定义指的是什么呢？（同上：125）。国家通过其货币主权把抽象的财产建立成为社会的“经济总体目的”。国家也制定出一般程序和具体的法律来处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基本法第 74 条）。国家通过空间计划和对农业的支持来插手土地所有制（基本法第 74 和第 75 条）。它有权力执行保护环境的政策，因为，如果不顾环境，纯粹的所有制市场经济就会破坏生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最

后，国家有权力征收赋税（基本法第 104 条），它可以从社会财富生产中抽取一部分。所有的这些国家功能都以顺利执行所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

对于基本法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的“财产权负有义务”以及“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的说法有三种解读。

1. 德国联邦法院代表着激进的自由主义，把产权拥有者的意志变成宪法原则，做出限制和例外更胜于做出规定——就像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最高法院（见里特施蒂克 1975：29 以及 393）。

2. 联邦宪法法院要求立法机关执行一种表面的、非完整的补偿性政策“来尊重按照基本法第 14 条第 1 段第 2 款的裁决，其目的是给基本法第 14 条第 1 段中私人产权的宪法承认和基本法第 14 条第 2 段中的社会需要以同等的重视。”相似的语言也出现在早期对产权的定义上：“公共利益要和个人利益同等对待。公共利益应该是参照点，也应该是对产权所有者进行限制的考虑因素”（联邦宪法法院：25，112，118；见里特施蒂克 1975：393）。

3. 在另一方面，克洛斯更加令人信服地论证说，这其实是一种国家保障，保证在产权保障基础上的利益角

逐不会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当然，这本身就威胁着所有制市场经济。所以，这是一个维持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执行能力问题。

基本法的运作方式再一次变得清晰。这方面，它和根据奥尔多自由主义和凯恩斯经济理论而来的福利国家方式保持一致。在这种理论下，基本法推进自由主义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追求个人利益在理论上以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式服务于公共利益。然而，在附文中还有国家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为这种功能性关系提供一个规范性框架，并会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干预。

由国家执行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承诺作为私人所有制的一部分成为了可能。我们认为这是劳工运动斗争的功劳，也是 1929 年灾难性事件。然而，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这里没有任何暗示资本主义抽象的财富积累应该被放弃：相反，它的运作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我们再看看基本法和财产权主体相关的其他条款，这就会变得很明显。由于向财产征收——按照市场价值——提供补偿（第 14 条第 3 款）的这种义务。这种义务在上述两个联邦法院的判例法中又得到了加强，私人财产权的社会承诺方面的因素越来越倒退，以致向私人资产保护上倾斜（里特施蒂克 1975：396 以及 411；

克洛斯 1988: 130)。

基本法第 74 条 (16) 赋予了国家在竞争方面进行立法的权力来“防止经济权力的滥用”。这暗含着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比如让市场自行决定处理竞争的方法，已经弃之不用了。经济上的权力集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在合法购建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上出现，这已经作为一个原则被接受了。很显然，这本身并没有遭到批评，只要这种抽象的社会财富——个人获得并有国家抽取一部分——持续增长。惟一需要防止的就是在保持传统中的滥用和反信任法的使用。这样，就像其他的国家干预的例子一样，人们更倾向于所有制市场经济的运作应该受到补偿机制的保障。

基本法第 15 条提出了一个关于平民的具体问题。关键的条款规定：“土地与地产、天然资源与生产工具，为达成社会化 [国有化] 之目的，得由法律规定转移为公有财产或其他形式之国营经济，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

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团体在议会中使得这个条款获得通过，很明显有其特殊的想法。然而，社会民主党以微弱的弱势在第一次联邦议会选举中落败，而私人企业集团获得多数选票以后，感谢联盟党（一个长期

存在的联合政党，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个条款失去了其重要性（里特施蒂克 1975：401；克洛斯 1988：169 以及 235）。它只是当作自由条款被写了进来，在对私人产权普遍保护面前就缺乏约束意义。这个规定于是就变成了众多补偿性权利中的一个，能够让国家发挥其经济领导者的作用，为保卫所有制市场经济而把财产权变为国有。这很少关系到国家把有利的投资机遇从私人工业中转移；为了减少损失，国家可以干预宏观经济领域的活动。

这同样也适用于对土地所有制的限制。这里的焦点集中在空间计划，环境保护（在原来的基本法中并没有包括）以及市政对土地的所有。对于后者，克洛斯竟然说地租应该由社会来征收，而不应该由土地所有者征收这样一种现实和资本利益毫无关系（克洛斯 1988：179）。到了最后，即使在这个例子中，国家只是培育（私人产权基础上的）所有制市场经济的总体生产能力。

因为国家保障生产能力，它就有权利来征收赋税（基本法第 105 条和 106 条），并执行第 14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这一点在判断任何情况下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涉及。在奥尔多自由主义或者凯恩斯理论阶段的

联邦共和国期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基本法开始生效，国家就会尊重这种宪法要求。通过行使对经济的总体控制以及引进先进的税收制度，国家提供了社会平衡来保持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平稳发展（同上：37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定义为“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基本法第 20 条第 1 款）以及“民主及社会法治国原则”（基本法第 28 条第 1 款）。这个定义概括了为国家提供所有制市场社会保证人角色的不同因素。这个福利国家的要求并没有用反资本主义的语言来措辞，却指向国家的意欲延续这种经济制度的补偿权利——这是最重要的。

在最初的凯恩斯理论和奥尔多自由主义模式中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环境效应的“增长限制”问题。只有在后来的基本法修正中，这个基础才为国家立法而建立。在社会义务这个观点扩大到包含自然界的进程中，于是我们现在能够说有延续生命的义务。然而，当国家对工业实施环境限制的时候，采取和市场相协调的战略也是非常小心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德国废除原子能电站的争论。国家必须允许一个 30 年的时间段用以关闭原子能电站来避免那些不可

能发生的补偿要求。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问题上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布什总统那里达到了极限，他认为美国甚至不应该签署本来就半心半意的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因为这会破坏美国的经济。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私人产权所带来的 自然界和社会凝聚力的破坏

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中，越来越让人感觉明显的是，产权负有义务的说法是来自各种历史因素：

- 劳工运动的斗争，这已经加强了强度；
- 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竞争态势；
- 1929年自由主义悲惨的失败所带来的经验；
- 福特主义经济在创造大量购买力时的利益；
- 单一民族国家相对有影响的作用；
- 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破坏自然界而不受处罚。

全球化资本用以提升利益的方法

是什么让资本和政治撤销了这一“历史性妥协”？（罗斯 1999；达尔克森 1998 以及 2001）。资本主义经济

学的试金石是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资本（产权）的积累，这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要达到这个基础的目标，需要在竞争中在货物的生产和营销上战胜其他的资本拥有者。由于市场上的消费品日渐饱和，竞争就要求生产商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给市场上带来新的产品。然而，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前一次投资还没有得到回报之前就要进行一次又一次新的昂贵的投资。这也意味着更高的营销成本。同时，也有人试图通过更高的生产力提高增长率，从而降低成本，但这也会导致就业的降低。其结果是，简单商品生产中的购买力和投资没有任何回报（见第 6 章）。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单一民族国家在社会上需要考虑的事情占支配作用的时候，干预经济政策的权利越来越少。相反，资本运用任何可能想到的方法来提升他们的利益，从来不考虑人民和环境，从而也逃避了延续生命的宪法规定的义务。下面是几个例子：

1. 一种方法是“即时产品”，这和生产单位向次承包商的外包有关，也是“节约产品”的一种形式。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中小公司为了能够显示有满足仓储和按时交货的能力，而被置于相互竞争的压力之下。同时，这些公司里的员工很少有机会在工厂委员会的帮助

之下自己组织起来。杰里米·利弗肯在他的被称为“超资本主义”的领域里研究了这种转包合同的一种高级形式（利弗肯 2000；又见高兹 2001）。他认为，好多公司，比如说耐克，甚至已经不再有生产车间，现在只是提供设计和品牌。耐克在南半球很穷的国家里制造鞋子，支付最低的工资，提供很不人道的工作条件，而用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售鞋子。其他的例子包括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同样，它也只是出售它的品牌，而通过剥削次承包商的劳动强迫他们奴隶般地完成任务。

2. 同时，大规模资本所有者试图尽可能多地用技术代替人类劳动。结果是结构性失业就会被用在更低的工资和更差的工作条件里。在此，与其本质一致，独占的私人产权被进一步加强。这是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第一阶段中为保证人力而被使用的：毕竟，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仍然具有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可以提供到资本市场。然而，结构性失业在减少资本支出的同时，也把越来越多的人从如此受限的经济过程中排挤了出去。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把大部分人口排挤出了延续生命所需的物质条件，也让他们失去了用工作为富人增加利益从而赖以糊口的机会。通过这种方法，排除和剥削已经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支配性特点。更

进一步的结果是，国家，或者更精确地说，那些（仍然）支付赋税的人，不得不负担起资本积累的社会成本。

3. 另外一种增加利益的方法就是根本不在实体经济 (reale conomy) 中再投资，而是通过把利益投资兼并而创造淘汰性竞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其他的投机金融的交易来积累资本。兼并和投机金融交易根本不会推进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只会不断增长资本所有的集中程度，和不断扩大金融泡沫赌场资本主义。在这个领域的高产轮流向实体经济施加额外的压力来降低成本，以便保证相似的净产值（见上面的第 2 点）。更重要的是，这还存在金融碰撞的风险，甚至能够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灾难，就像 1929 年所发生的那样。

4.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向国家政府施加压力以各种方法增加他们的利益。首先它威胁要撤出资本并到其他条件更好的国家去投资，其次它运用明目张胆的谎言声称通过降低赋税以及增加资本补贴的方式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谎言在 1996 年被戳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了一个名为无就业增长的人类发展报告。尽管这样，政府仍然追求以通过补贴和降低赋税的方法在政策上支持大商业。从税收而来的补贴进一步流向结构

性不稳定的生产领域，比如煤炭、造船以及农业，也流向了其他领域，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在德国，利润税在总体税收中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32.6% 变成了 1998 年的 12.3%。财产税在科尔政府统治下被废除。在红 - 绿联盟的领导下，随着财政改革，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政府降低了收入税的主要的税率并废除了公司股份出售税。后者只会带来兼并狂潮，并很自然也会得到股票交易所和大银行的认可。在 2000 年，德国最大的工业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的董事长约尔根·施伦普，夸口说他的公司不用缴纳一分钱的税。相反，靠出卖劳动力挣钱的人的税在 1980~1995 年之间却增长了 76%，使得增值税不断增加，特别影响了穷人的生活。在养老金改革中，红 - 绿联合政府用两种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团结体系。首先，它把部分为老年人供应放到了私人资本投资上。其次，它有效地利用税收来代替雇主的合法要求来贡献 50% 的养老金保险（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制度）。

5. 产权所有者运用经济，特别是用金融全球化来规避税务，他们逃避所有权所带来的社会义务，比通过影响立法要直接得多。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跨国公司操纵价格转移，在他们集团内部安排账户，以便让大交易在税率小的国家进行，而小交易则在正常税率

国家进行。然而，最坏的例子是金融资本的税务逃避，以及最重要的逃避利息支付税。德国的国内税收雇员工会估计每年都有 13 亿德国马克的税收损失，这个数字看起来要比真实数字低。这不仅使赫尔穆特·科尔在 1982~1998 年之间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对此毫无办法——接下来的政府也降低了赋税，而不是雇佣更多调查员来打击税务欺骗。在 1996 年，德国国内税收雇员工会的领导写道：“把震慑因素考虑在内，每增加 7000 名新的巡查员就会带来超过 3 亿德国马克的收入。”^①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对付的是国家和资本拥有者的共犯。很显然，这个问题，特别是关于税务避难所的问题必须马上得到解决——最理想的是在全球层面上解决，但至少也应该在欧盟范围内解决。然而，除了在嘴上说说，西欧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真实的政治意愿。毕竟，税务避难所之一卢森堡也是欧盟的一个组成部分。非但没有打击逃避税务的行为，这些国家甚至通过减少社会服务来弥补税收上的损失。

6. 国债本身是通过商业运用各种上述机制产生的，

^① 德尔·沃驰，1996 年 3 月 22 日。

而且是用最不正当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产权违背了它的社会义务。在德国，1997~1998年度公共预算负债达2.3万亿德国马克之多，而且这种负债每年都在增长（见罗斯1999：175）。总共算下来，至少有25%的税收收入被用来还本付息。在比利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0%，将近1/3。“这就是国家如何向私营企业支付到目前为止最大部分的债务利息”（拉方廷和穆勒1998：264）。大商业仍然支付的屈指可数的几项税务也被他们向国家提供的贷款所抵消了。换句话说，逃税产生了双重回报。同时，靠工资吃饭的人支付越来越多的税——他们不能够逃避——包括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增值税。这也等同于向私人商业支付了补贴。

7. 国有企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私有化是减少财产权社会义务的另一种方法。这是因为根据游戏规则，只有“优等投资选择”才可以私有化，而不会产生利润的必需的社会服务将仍然在国家的手里。这样，国家就不能够再用一个领域的利益来弥补另一个领域的损失。另外，联邦政府接管了债务和养老金基金——就像邮局和铁路的私有化一样——而这也只会增加国家的债务。再加上私有化以后的就业机会减少，这对公共财力产生负面影响——更不用说在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腐败——而

且我们已经把私有化了利益而国有化了损失。

8. 这种发展也在环境和生命的基本要素的私有化上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让我们给出几个例子。人们的水供应越来越私有化——这也导致了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的全面内战，因为穷人支付不起高昂的水价（见尤哈斯 2001；也见第 7 章）。空气污染也被《京都议定书》转化成了商品。跨国公司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开始偷盗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土著的种子，改变单个基因，申请专利，然后每年再高价卖给那些农民，类似的还有花费杀虫剂。在整个活动中最不公正的例子就是在种子里加上终结基因，使得农民们不可能从他们自己的收获中得到种子。^① 遗传工程让未来的前景很可怕。人类基因的私有化让他们可以无限制地操纵——带来了不可预测的结果（利弗肯 2000：66）。

从产权的观点来看，这些论述说明了什么呢？

- 在一个极端，对各种形式的资本的过度集中——实际上，一直紧紧地控制在产权所有者的手里。^②
- 通过让劳动市场更加“灵活”而使得工人劳动能

① 利弗肯 2000：66：“目标就是在知识产权的形式下控制整个星球上的种子储备。”又见沃纳 2000：89。

② 罗斯 1999：387 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最强的私人利益”。

力的丧失（他们对自己工作能力所有权的失去）。

- 对不能通过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生存的人的排除。
- 通过把这个地球上所有形式生命的自然基础转变成私人资本主义利益的方式进行破坏。
- 在另一个极端，国家从公共利益的仆人向私人资本利益的爪牙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执行

这种在财富积累基础上资本所有权模式却没有任何社会或环境责任或任何支持生命基础的义务。这种模式是如何出现的？哪一种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对它的实施负责？对这个问题任何回答的尝试都要建立在自己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一名词的个人理解上。从现有的广泛文学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把自己限定在其主要特点的范围内。^①

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而且只有在发现地球是圆形以后才能够成为普遍的力量。查理五世是这样描述新时代——16 世纪的西班牙——第

^① 见阿尔特法特和曼考夫 1996；杜赫罗 1995；克林格贝尔和兰德利尔 1998；德·圣安娜 1998；欣克拉麦特 1999a；科尔 2001；考什 2002；莫菲德 2002。

一个帝国的：“太阳从来不会在我的帝国里沉落。”后来殖民帝国接着出现了，首先是荷兰，然后是英国，直到美国在 20 世纪扮演的霸权主义的角色。

1944 年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大会上，美国开始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向发展（见杜赫罗 1995: 95）。凯恩斯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战后经济调整，这和西方国家由社会规范的市场经济相一致。在他的提议中，包括：一种独立的国际货币；以中央银行为模式的货币基金；一种用来稳定发展的结构性基金，和现在的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相似；以及一种世界性贸易制度通过向贸易顺差的国家征收赋税的形式平衡各国利益。这一套提议遭到了美国及其主要谈判代表亨利·戴斯特·怀特的反对。相反，美国把美元强加为世界货币，虽然和黄金标准相联系，而且其汇率和欧洲的主要货币以及日本的货币相联系。中央银行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基金的发展变成了世界银行。而国际贸易制度的计划在第二年就变成了关贸总协定，其任务是大量减少贸易限制。

这给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公司和大商业银行向世界上每个国家胜利挺进的机会，除了那些社会主义政府的国家。他们变成了跨国公司，他们的生产中心和市场扩散到所有的大洲，并在坚挺的美元的帮助下进行融资。苏

联解体之后，以及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发展起生产网络子公司（全球性资源）以及全球市场营销。通过这些，他们就能够利用他们在世界各地每个角落的子公司得到最小的价格优势，来用最低的成本把产品投放到市场，用以击败他们的竞争者（见利弗肯 2000；16）。一旦他们通过合并和接管达到了垄断的地位，或者和剩余的垄断者达成价格上的一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操纵价格。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让工会、供应商和政府相互斗争来达到节省工资、仓储、赋税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目的。这些公司真实的目标就是通过他们投资的资本来谋取最大化利益。社会和环境义务不在考虑之中。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金融领域，强大的欧洲银行自从1960年开始就试图废止他们自己的货币并直接用美元市场进行国际交易。这也导致了“欧洲市场”（Euro - Markets）的出现（见杜赫罗 1995：69）。越南战争还造成了除通货膨胀之外的多余的现金流向了美元市场，使得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撤回黄金平价——第一次是在1971年，而最后一次是1973年。这也导致了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同时，由于无规范的金融市场，海外中心也形成了。在这种气候下，汇率被交由市场决定，这导

致了更加极端的投机和货币市场上的不确定因素。引进用来抵消这些因素的保险衍生物本身也变成了投机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赌场资本主义这个词语被设计出来，用以描述被投机金融资本支配的世界经济。

向全球化赌场经济方向迈出的有重要意义的另一步是在 1979 年，当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一种货币主义政策（见杜赫罗 1995 第 3 章第 2 节），另一个中央银行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把他们的利息政策减少到能够保证货币稳定来保障资本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另外，贷款利息被放到了市场上去。这和里根的信用军国主义一起导致了利率的急剧上涨，一直达到历史上惟一的一段高利率的时期。尽管实际利率在 2001 年开始的时候跌到 1%，但在摆脱管制的跨国货币市场上，利率继续超出实体经济的增长率这样一个事实仍然存在，特别是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重新计划。其结果是从债务人到债权人的永久性再分配——不仅从直接债务人，而且从人口的大多数，比如在德国的那个时候，利息的比例占有所有价格、租赁和税务平均水平的 30%~40%。只有大约 10% 的人口所收入的利息要比他们直接付出的利息要高（见费舍贝克 1996：668）。而且，这种制度也把货币赶进了有吸引力的金融投资领域，而不是生产投资

领域。

另一个得到证明的是由这种高利息政策引起的非直接结果是，每个在 1979 年以前使用低息贷款而负债的国家都陷进了逃脱不掉的债务陷阱。不管他们用了多少钱来还债——即使以比他们人口多的代价——债务还是大幅度地增长。在 1982 年，墨西哥是第一个破产的国家。这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得到它应有的声誉。由世界上最富有的 7 个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组织援助一揽子计划，用公共收入来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这种危机是由资本拥有者肆无忌惮的利息获取策略造成的。但是这种援助一揽子只是帮助那些债权人，而不是受债务困扰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与此同时，商业支付的税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那些依靠为资本拥有者劳动的人又一次被要求拿出钱来）。在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其著名的结构调整计划强加于那些为债务所累而不得不依靠别国的国家。这些计划强迫这些国家首先调整他们的经济向进出口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向世界市场方向发展——然后废除对资本转移的控制。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制定严格的措施，私有化服务行业以及通过这些方法把大部分人口转入贫困和痛苦来强迫这些国家减少他们公共服务。

即使是世界银行也只对那些坚持这种贫困政策的国家发放短期资本所有制利息的贷款。早在 1988 年，一位非洲代表在一次一般性听证会上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如果一位医生配的药恰恰是造成这种病的毒药，他将怎么看这位医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试图通过宣称他们的新政策是以对抗贫穷这样的说法来抵消这种批评，而实际上，贫穷正是这种结构性调整计划产生的。

然而，正如这个德国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被各种各样的资本机制逼近了大量公共债务里，这样能让他们顺从私人利益的念头。货币政策只是对支持流通稳定感兴趣，它和联合的节约方法一起，推动事业和社会的瓦解。更坏的是，跨国资本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它所联合的逃税避难所被用来大量逃避纳税。换句话说，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资本所有者和经理人正在利用全球化的经济，来以公共利益为代价使得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这些由富国支配的国际性协会——七国组织或八国组织世界经济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最终还是当成政治工具在被使用。后两个组织曾被用来推进多国

投资协定，这个协定禁止政府对投资资本附加任何社会和环境义务。这种义务是应该要受到惩罚的。以前，社会力量在对付这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还是有效的，而且最终成功说服法国政府对这项计划投了反对票。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新的多国投资协定的起草正在准备中。

· 富国的政府使用了相同的组织来发动对公共利益的另一次进攻：服务贸易总协定。^① 这包括把所有公共，特别是市政服务，比如说水、电和（当地）交通转移给私人所有。我们已经看到，这不仅会导致价格的上涨——这意味着特别是穷人支付不起这种服务——还会导致质量的下降。

使用这些不民主的协会，以美国为首的富国成功地一步一步把联合国挤到了边缘。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只是自身的影子。而美国在联合国的国际会议上趾高气扬，举止傲慢，当有不合他们心意的事情时，它的代表就会踱出会场，就像在 2001 年的针对德班种族歧视

① 见《团体欧洲观察家》，9，2001：11，和国际性运动：停止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攻击，<http://www.citizen.org/petrade/GATS/GATSsignon.htm> 以及 <http://www.xs4all.nl/~ceo/gatswatch>.

的意义一样。2001年10月16日，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准备阶段，美国代表特里·米勒坦率地宣称：“我们从三个承诺开始：和平的承诺，自由和法律的承诺以及资本的承诺。作出这些承诺的政府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这些承诺的政府根本不会有发展。”这是他早些时候如何解释对资本的承诺的：“我们需要彻底明白在我们谈论为发展融资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论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有效的模式。”

此外，联合国的组织越来越被跨国公司所渗透。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有实力的资本游说团坐在控制中心里。^① 所有制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于是不仅具有破坏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后果，还破坏民主本身。人民影响关乎他们生命的政治决策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的“政治疲劳”也由此而生。在大多数国家，参与选举的人数呈下降趋势。既然所有的大党派既不献身于新自由主义，也不放弃它，那么投票的意义何在呢？

^① 见《团体欧洲观察家》阿姆斯特丹的宣传品和网站 [Http://www.xs4all.nl/~ceo/](http://www.xs4all.nl/~ceo/).

知识产权和文化产权的超资本主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主义发现人类大脑本身，包括身体，精神和文化，有积累利用的潜在价值，于是他们就把这些放进了他们的战略之内。这也是杰里米·利弗肯最后一本书的主题（利弗肯 2000；又见高兹 2001：33）。

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所用的术语。利弗肯宣称正统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产权本质的类别已经被新资本主义术语“准入”所代替。然而，他所用的例子展示了他是按照工业化机器和生活消费品来理解产权的。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参与者来说，这些已经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在新资本主义经济形势下，目标依然是对更多资本资产的持续不断追逐。产权甚至被合法地定义为资产。于是通过对生命最后的领地的商业剥削，导致的这些资产增加是新超资本主义永恒的目标。

通过互联网联在一起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为新的超资本主义提供了技术基础（利弗肯 2000：16；高兹 2001：33）。这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节约产品”是如何变为可能的。支配市场的大跨国公司保持着对它的控制，并

通过使用金融和发行渠道保留着多数的利益。同时，电力网络也因为竞争而刺激着不断的革新，于是产品的使用寿命就会缩短。然后这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产品出售的频率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售后服务，直到替代产品出来并随后产生新的合同。同时，使用电子系统让货币变得不可见的过程以及联合“金融服务”误导人们使用信用购买或租用物品，而不是用他们的积蓄，因为这样做会在交易过程中产生利息，这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的双重收益以及消费者对他们的越来越多的依赖性。

这种转换的中心就是资本在积累更多财富的要求下的知识、生命和文化殖民。“知识经济”让知识私有化了，知识曾经由公共基金支持，公共基金是由教育和研究协会的税收提供的。从其本质上来说，它是建立在以前和现在工作和经验的基础上，由于知识具有公共产权，它也在自由交流中才能繁荣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角大楼为交换情报而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却能够提供促进公开交流的媒介，而公开交流正是知识的精粹所在（实际上，互联网的这个功能是在各种选择中行使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以及私人产权，必须为资产积累服务，所以这些方面都必须不能让别人随便进入。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就是私人公司的货物出租或服务中，他们的生产编号是保密的（特许）。一个间接的例子是知识产权的申请专利及其提供的有利的市场机会。

专利具有资产阶级所有权的两个主要特征：排他和资产积累。当我们考虑生命科学产业的时候，专利也进入了自己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直接对准了植物、动物和人类本身（利弗肯 1998：37 以及 2000：46；拉佩和柏莱 1998；沃纳 2000）。杰里米·利弗肯把生命私有化，生命的专利及其戏剧性的长期结果的重要性与圈地运动等同起来。我们已经论述过，圈地运动标志着在早期现代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始。

一开始，人类遵守着自然只能被发现，而不是被发明这样的格言。而且这也就是在 1971 年当印度微生物学家阿纳达·查科拉巴迪，当时在通用电子工作，打算为一项能够根除大海表面油污的转基因微生物体申请专利时美国专利技术局所作的决定。查科拉巴迪提出申请以后，在 1980 年，美国最高法院以一个人的优势裁决生命是可以取得专利的。直接结果：生命科学产业迅速发展。这个分水岭的直接后果是不可预知的。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个国家的高级法院，只有一个人的优势，永久地改变了世界。从中可以得到的第

一个结论就是产权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换句话说，产权，尽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概念，因此不能被看成所谓自主经济法律的一部分。相反，它是在市场经济的帮助下自称为自主的经济的一个要素。这一点对于我们后来关于变革方式的论述很重要。第二，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公共法允许单个法庭决定——这个决定只是一个人的优势作出来的——来不仅对它自己的社会产生不可估算的后果，而且也对整个人类产生了相同的影响，甚至连它自己民主制度（更别说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民主制度）都没有讨论这种决定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并自己选择的机会。美国通过跨国公司实施的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霸权角色本身就很明显是对人类的一种威胁。

其他的类似判决也迅速跟进。在美国，第一宗针对植物的专利发生在 1985 年，接下来 1987 年是第一宗动物专利，哈佛鼠。在 1990 年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否决了一个叫做约翰·莫尔 (John Moore) 的人的请求。当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接受医生治疗的时候，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血液蛋白被送到一家公司被注册专利，并获得了执照。在欧洲，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偏袒工业。欧洲议会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支持生命专利

化，只是在 1998 年受到指示才开始妥协。现在在欧盟内部，人类细胞和基因和转基因植物和动物一样，也能够被用来申请专利，即使在这方面的争论在欧洲还是非常热烈。

许多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种结果，而这种结果也不胜枚举。

在植物方面，跨国公司在公共产权私有化及商业化过程中所采用的最为厚颜无耻、最为残忍的形式就是生物盗版。他们资助去南半球远征，夺取当地人的知识来寻找含有可以用来制药或制作杀虫剂基因的植物（沃纳 2000：38；利弗肯 1998：48）。他们在此过程中经常破坏自然有机物杀虫剂的有效性，就像苏力菌的案例一样。由于农作物（玉米、棉花等）的大面积播种，苏力菌的大量使用时的害虫产生了抗药性，有机物杀虫剂对这些害虫已经失去了作用（见拉佩和柏莱 1998）。

把植物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私有化带来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跨国公司对种子的垄断。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整个世界的种子都控制起来。现在仅仅 10 家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世界上 32% 的种子。最大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杜邦公司、蒙桑托公司（Monsanto）和诺瓦蒂斯公司（Novartis），每年都要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以购买种子公

司，以期进一步减少这个求过于供市场上的公司数量。拿蒙桑托公司来说，已经控制了美国 85% 的棉花市场（利弗肯 2000：66）。在南半球国家里食物生产的结果是完全破坏性的。种子市场被操纵，种子只能和化肥和除草剂一起从同一家公司购买。此外，不允许农民们在收获季节自己留种子——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耕种土地进行发展——或者他们改变种子的基因，消除自己留种子的可能性。因此，能够买种子的农民们对跨国公司产生了依靠，向他们进贡，而其他的农民只能放弃——给世界上 2/3 的人口的营养安全问题带来了威胁。这个例子更加生动地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制市场经济会给人类带来死亡。追逐资本积累最大化是以数以百万计的人的饥饿以及死亡为代价的。^①

当我们再看看物种的灭绝，这种植物私有化所带来的饥饿和死亡就更加明显。例如，如果小农民生产者在正常情况下会种植一些适合他们地区的物种，那么种子的垄断就意味着生物多样化就是一个永久的威胁。这种过程开始于 20 世纪早期更多现代统一多样化的引进，

① “如果农民们不能种植他们所收获的东西，而完全依靠这些（比如只能种植一年的种子），那么你就提高了大规模饥饿可能性的赌注。”布舒，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利弗肯 2000：69 作了引用。

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绿色革命中有所减弱。自那以后，“大约有 3/4 的对农业有利的植物基因多样性在全世界消失”（沃纳 2000：30）。作为回应，基因银行成立，里面所储存的 93% 的基因物质起源于南半球。一开始，这被看作是“人类共同的遗产”。通过 1992 年的生物多样化大会，任何国家所提供的植物多样化的控制权就被授予了那个国家的政府。现在，那些跨国公司，如果他们没有进行直接盗版，则更加努力和个别国家达成优惠的协定，来剥削他们的基因资源（同上：46）。

相同的机制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通过专利把动物私有化。购买者不再是购买那些动物，而是租借。比如小牛或者小羊不再是农民所有，相反，对于每个新生的动物，都有一笔费用付给以知识产权的形式拥有这个专利的公司（利弗肯 2000：69）。

对于人类大约 5 万个基因组成的基因组，跨国公司也开始一场申请尽可能多的专利。一旦他们把这些控制下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研究基因在药物和治疗过程中潜在的使用。知识所有权以专利的形式垄断会给那些利用人类基因在制药上取得成功的公司的资本所有者自动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收益。另一方面，公共卫生供应也越

来越受到威胁，因为药品的资助不能够得到保证。一个典型的案例就发生在南非政府和一个提供抗艾滋病药品的跨国公司之间，这个案例也预示着世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案例中，死亡也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也是通过所有权的排他性，把产权所有者的资本积累放置到比人类生命还要重要的地位。

由富有工业国家支持的跨国资本用来让生命在世界范围内私有化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沃纳 2000：56；利弗肯 1998：51）。世界贸易组织是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谈判的基础上于 1994 年成立的。他的最大目标就是贸易自由化。签字国只能在防止以科学的方法证明有害的产品的時候才能使用贸易限制。不允许对可疑的风险采取预防性措施。这是建立在自称中立，而实际上是和私人工业相勾结的西方知识基础上的最初的决定——这包含着潜在的致命性后果。汉斯尤臣·卢曼（2001）是伍珀塔尔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在 2000 年（North German Radio）上作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演讲，题目是“特定的知识——我们今天供奉人类牺牲的神”。通过举出安眠药导致的畸形以及含有戴奥辛（一种致癌或致畸杂环族碳氢化合物——译者注）的木材防腐剂导致对身

体健康的严重危害的例子。他说，即使当时的情况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猜疑，成千上万的人还是成了这种危险的化合物的受害者，因为这些公司威胁要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在法律上，只有清楚的“科学的”证明才有效。这些肇事者没有受到惩罚，仅仅是因为坚持说没有科学证据，他们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目的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保护这些工业国家的经济和政府利益，特别是防止发展中国家仿造西方国家的产品。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卫生供应的成本就会通过 5~10 个代理人而上升”（沃纳 2000：57）。的确，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所谓独特的制度来防止植物多样化被申请专利，而且最穷的国家也被允许有一段转换时间，直到 2005 年，但是这些国家的弱势非常之多。首先，他们对他们基因资源的主权被私有化剥夺了。第二，他们的本土知识被征用，当作指南针来指导偷猎者寻找只要有用的重要基因——这些都是发明和发现的定义不明造成的。然后，当地农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展有用的植物，但现在他们却被完全忽视了。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已经阐明的那样，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受到了威胁。他们为修订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努力被美国和欧盟使用

的各种诡计所阻挠——就像在 2001 年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上所发生的那样。

生物科学对于 21 世纪和原子物理学对于 20 世纪所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将会在未来形成所有制市场经济的核心，而正是这种核心会在未来产生对于人类和地球的主要危险。

然而，所有的这些并不会简单地直接侵入到个人或整个人类，相反，他们会通过文化资本主义的形式诱使危险的到来。利弗肯也把这一过程和现时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作了对比。在这里，他把这一过程称为“圈公共文化运动”（利弗肯 2000：135）。不论过去在各自文化社区里通过有创造性的人际关系曾经建立或者培育出什么，在现在都已经成了全球商业化的目标。不仅是典型消费文化对此负责，而且还有提供经验的市场营销，它对旅游业和新兴的购物中心文化都适用。像环境运动这种表达上的反文化形式，也已经被合并到新的娱乐文化和生活方式里。即使是道德规范和宗教也变成了对商业化有用的促进者，就像波尔兹和波斯哈特（1995）嘲讽地描述的那样：“道德更好卖”。这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逐步变成全球化的，霸权的文化。

帝国变成了绝对所有制市场上看得见的手

六大全球媒体大鳄买断了各个地方的传输频率，其结果是只有他们的多媒体节目才能在实际意义上到达世界的每个角落（利弗肯 2000：218）。但是，当然，只有那些能够付得起费用的人才能进入这种交流。即使是在这种领域，私人所有权，无论人们同意还是反对，都要进入人们的生活。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帝国看得见的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在工作。在 1987 年美国军事的秘密战略文件以及在里根和（老）布什任期内的政策文件圣达菲一号和圣达菲二号（Santa Fe I and Santa Fe II）已经展现出，苏联政权解体之后，他们的目标是发动一场“文化战争”为资本主义赢得人们的“心和大脑”（见杜赫罗等人 1990）。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只能够在通过学校、大学、基督教组织以及大量的媒体发动的密集的意识形态战争的范围解释。^① 绝对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① 见考克特 1994 关于智库的解释以及宾斯万格 1998b 关于“经济学家的忠诚社区”。

是作为惟一的选项出现的，而且反对它的所有运动及其附带的不公平都应该受到反对，包括国际团结和人权运动以及解放神学。因为它所要求的是“对自然资源和战略原材料的支配和销售”（杜赫罗：55）。为了能够得到这种支配权，新自由主义必须在所有的“权力层面”上发动它的战略，比如经济、政治和军事，以及在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上。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的圣达菲四号政策文件又一次使用了这样的主体。^①在阐述其他事情的同时，他也说：“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也得到了普及。他们按照几十年前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和其他想渗透进这个半球的人所制定的议程在行动。他们通过许多渠道：宗教（解放神学）、新闻，和他们的文化相联系的教育机构（共产主义在我们的大学里生存得很好）以及通过司法系统”。

可以预见，这场全球性对恐怖主义新的战争将会给反对“经济恐惧”的抗议运动带来新的压力。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帝国不允许这场运动改变它对世界的观点，也不接受一个重新开始的动机。相反，它显现出了

^① 见 www.geocities.com/proyectoemancipacion

为绝对资本或者——用另一种方法来说——对产权的专政主张利益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再面对单一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全球帝国和全球资本是一体，而且是同一件东西（见奈格里和哈尔特 2000；奈格里 2001）。如果我们总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帝国的全球化必须消除通向资本主义市场完全支配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比如说，资本产权在追逐无限制的财富积累而不用承担任何维持生命的责任的这种能力上的每一个障碍。^① 每个社会和环境制约因素或者义务都应该尽可能地被移除。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德国的基本法里，这种社会和环境义务只服务于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市场经济，让它不再遭受 1929 年那样的自我破坏。凯恩斯用类似的方法理解他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如果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积累模式现在也寻求推倒旨在防止威胁在人类社会和整个地球遭到社会和生态破坏的保护之墙，那么它在这样做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破坏（见迈尔 1992）。这种

^① 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极权主义特征，见欣克拉麦特 1984。另外，更多详细论述，见库尔兹 1999：524。库尔兹认为：“现代概念上的极权主义只有在包含一种全世界的力量的迫切要求的资本的背景下看，才有可能出现。”

由帝国培育并保护的整个世界市场，威胁着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破坏就是自我破坏”（见欣克拉麦特 2001a: 359）。

恐怖主义也用相同的逻辑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破坏性恐怖活动以及自我破坏做了回答，并为新的直接的帝国战争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中的穷兵黩武提供了借口。

第五章 世贸双塔的坍塌

——通过绝对帝国贯彻整体市场

布什的《圣经》和塔利班的《古兰经》相冲突。布什的上帝和塔利班的真主相冲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和所有制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杀的年代。^①这个年代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圭亚那的集体自杀，在 1978 年由吉姆·琼斯带领的 600 多名追随者的美国的一个宗教组织实行了集体自杀。许多其他人也模仿他。后来到 80 年代，出现了自杀式杀手。他们也首先出现在美国。最

① 德语 Selbstmorder 的意思是自杀的人。但是，从字面上翻译，它的意思是“自我谋杀的人”，那就是我为什么在本章适当的地方力图包含这种意思。——译者注

初，他们杀死许多他们不认识的人，然后自杀。一开始，这在美国看起来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发生在学校、办公室以及街道上。很快，自杀式杀手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尼泊尔、非洲、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很快，这种谋杀和自杀便和政治活动联系起来。第一起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攻击发生了。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投弹人蒂莫西·麦克维也出现了。尽管他没有自杀，他还是拒绝了任何司法辩护的机会，并像庆祝庆典一样庆贺他的死刑。他（在宣读诗《万神殿》的时候）把自己描绘成“无敌”的人。有时候，自杀性杀手是和宗教有关的人；他们的虔诚是建立在对一神论的忠诚上。由于寄希望于对死后生命的憧憬，他们希望在谋杀和自杀之后能够得到永生的奖赏。

谋杀和自杀的联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基督徒的宗教语言中得到了文字性的表述。林赛，在里根政府里很受欢迎的一个人提到了哈米吉多顿（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译者注）战斗，并说这场战争意味着原子弹战争。他说：“当哈米吉多顿战争在达到最高点，地球上的生命看起来濒临灭绝的时候，此刻，主耶稣就会出现，并将阻止完全灭亡。由于世界正在越来越快地向这个时刻靠近，我想问问读者几个问题：你们感

觉到害怕还是希望解脱？你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会展现你们的精神态度。”^① 在这里，集体自杀和自杀性谋杀，被鼓吹成精神上的英雄行为。林赛的书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非常畅销，卖了 1500 多万册。

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被选出来，时刻准备着等待总统按下发动原子弹战争的按钮。选择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是因为他们很自然会遵守这个命令。他们甚至还希望得到这种命令，因为他们一直期盼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无神论者不值得托付这种信任：他们只是知道今生，所以不愿意冒险。

在美国的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教徒的案例中，杀手先谋杀别人，然后自杀，以期能够在天堂里由于他们的行为得到奖赏。在林赛之前好几年的一个德国神学者也表达了非常相似的观点。冈拉克（1958/59）也提到了原子弹战争的可能性：

即使是为了这种可能性，即惟一的结果可能是显示王室的权威和作为人类应该感激的上帝的命令，保卫产权的责任和权利也是能够想像得到

① 译自德语引用的原文。

的。是的，即使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继续下去，它仍然是反对我们主题的争论。首先，我们肯定世界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次是因为我们并不对世界的末日负责。我们可以说上帝，我们的主人，由他的深谋远虑来引导或者允许我们在需要向他的命令表现忠心的情况下结束这个地球，并对此负责。

从这一点来看，宗教——对上帝的信奉——是完全矛盾的。在基督教里，圣经的中心线（比如说上帝和人类的团结，人类的生命受到了权利和财富偶像化的威胁）可以被颠倒。然后生命之神杯转化成了死亡的偶像。

关于“9·11”，我们发现这个日期在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上出现过两次。第一次“9·11”出现在1973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智利空军轰炸了圣地亚哥拉蒙德——智利政府所在地，并摧毁了它。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兰德在总统府被谋杀。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民主地引进一种社会主义形式，并第一次引进一种纯粹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最终，皮诺切特将军招来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米尔顿·弗雷德曼。

第二次“9·11”发生在2001年。没有任何理由，这场袭击毁坏了纽约的世贸双塔，并摧毁了成千上万条生命。谋杀者在袭击中也当场死亡。这场袭击令全世界非常震惊，以至于他们认为这可能代表着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我们同意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必须要问一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从它本身来说并不明显。完全根据经验判断，这场袭击和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其他袭击差别不是很大。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们现在几乎不能记得的更严重的袭击，其杀伤水平更高。也许对日本广岛的袭击也给人们留下了相似的印象，因为原子弹被全世界认为是可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武器。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事件，对它的谴责也并不明显，更不用说让人们震惊了。

为什么第二次“9·11”和其他的事件如此不同呢？当然是因为这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和帝国的统治中心第一次受到打击。直到那个时候之前，它还以无可比拟的力量干涉那些它不喜欢的国家，甚至不必担心任何反作用。这一次，这个中心本身变成了空中袭击的打击目标。直到那个时候，天堂里的上帝才比这个地球上的神更伟大。打着“天佑美国”和“上帝的国家”的口号，这个超级大国把自己看成了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并认

为自己是地球上的神。如果它真的是神一样，那么它就是没有阿基里斯之踵弱点的阿基里斯（传说阿基里斯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译者注）。这个超级大国把自己看成了神并像神一样接受世界的供奉，这次却严重受伤了。这的确是杀长辈、弑君以及杀神的行为。

世贸双塔是这个神的圣殿。罗马的梵蒂冈之对于基督教堂的意义，麦加之对于穆斯林的意义，就是世贸双塔对于建立在产权、货币和资本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这双塔，在另一方面，是崇拜的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对五角大楼的袭击——或者对白宫的可能的袭击——与对世贸双塔的袭击相比还是不太重要。从从事金融的人的角度来看，对世贸双塔的袭击是一种亵渎。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想法。五角大楼和白宫只是产权、货币和资本神秘主义核心的点缀性外观，而这种神秘主义把世贸双塔看作是神圣的宝座和神圣的场所。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来看，这是弑君行为，这也是整个世界的感觉。一种弑君行为，也是伴有杀长辈的杀神行为。这次空中袭击是一种亵渎，一种对上帝和国王的反抗。毫无疑问，这就是别人如何看待这次袭击的。弑君行为本身通常是一种简单的普通的谋杀行为。但因为和国王有关系，那它就不再普通了。虽然

一个偶像已经坍塌，让我们说这并不是是一种安慰，还有其他的偶像。也许在 5 世纪哥特人侵犯罗马的时候，给罗马帝国留下了相似的感受。

当一个国王驾崩，欧洲中世纪的法国人经常会重复“国王去世了，国王万岁”这样一句话。但当一个国王被谋杀以后，他们就不能重复这句话的第二部分。什么事情都会改变。国王活在心中，随着弑君行为的发生，活在心中的国王也死掉了。心没有死，但活在心里的国王死了。虽然人们也尝试着重新恢复国王的统治，但很少有成功的。加缪在他的评论《叛逆者》里把这种恢复做了比其他人更好的分析，他认为不论是谁杀死了国王，谁都必须自杀。

世贸双塔是国王吗？在玩国际象棋的时候“王”和“车”可以交换。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种情况更多，事物是人的替代品——人们被转化成了“人力资本”。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世贸双塔的坍塌的意义比谋杀肯尼迪总统的意义要大得多：肯尼迪只是在人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之的国王的代表，而世贸双塔却是国王。

同时，这个国王也是一种神，这也就是我们还要谈论杀神的问题。谋杀那些杀神的人能让被谋杀的神起死回生。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谋杀那些杀神

的人，就像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西方帝国在危急时刻所发生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常和反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反犹太主义从来不把仅仅迫害犹太少数民族作为其目标，尽管迫害代表一种少数民族的犹太人的确发生过。反犹太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工具，用来解释任何反对帝王统治的运动，这种抵抗被描述为“犹太人的疯狂”。这种解读会涉及到任何选中的有杀神意向的人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社会主义被所有的西方国家看作是“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这样，障碍就被清除了，在反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他们就允许参照谋杀那些想杀神的人的做法杀死共产主义者，同时还允许杀死犹太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注意到犹太教里关于共产主义的解释，那么他就会曲解纳粹分子的反犹太主义。

今天，我们再一次谈起杀神行为，尽管这个话题是长期的。这些话在谈论上帝祝福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被使用。但当布什总统宣布正义对邪恶的战争的时候，对他来说这种社会风气是正义的：和平、自由以及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意味着资本拥有者产权的增加。一个人利用发动战争来得到这些价值，而这些价值代表着最神圣的价值，他们都被融进了“自由贸易”的概念，而

且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当布什说“天佑美国”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些价值之神，其宝座就设在世贸双塔里。

这个神被谋杀了，而且如果有人杀死那个凶手，神还会再次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用布什的话说，需要有一个十字军。布什在2001年10月7日用如下的话来宣布的：“今天我正在白宫的条约厅里对你们讲话，这是一个美国总统为和平而工作的地方。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在突然到来的恐怖世界里不再有和平。在今天新的威胁面前，追求和平的惟一方法就是追踪那些威胁和平的人。”^① 他的讲话还是和平，但是这里的和平则意味着战争。套用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的人物“老大哥”的话说就是：和平就是战争。所以和平能够到来，而和平的敌人需要被消灭；所以宽容可以接受，而宽容的敌人需要被消灭；所以自由贸易可以得到繁荣，而资本经济中自由贸易的敌人需要被消灭。

就像所有历史上的暴君一样，不是在同样的演讲中

^① 对国民的讲话，2001年10月7日因特网。

宣布了意味着和平的战争，而是借助了一个无辜少女的语言：“我最近收到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说了很多关于美国在不同时期的状态——这封信是一个四年级的女孩写的，她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我几乎不想让我的爸爸去打仗’，她写道，‘我现在愿意把他交给你’。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她所能给的最大的礼物。这个小女孩知道美国的一切。自从“9·11”以后，美国整个年轻一代已经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及其责任和奉献的代价，有了新的理解。”

这听起来像人吃人。刽子手在杀人的时候也奉献了自己。十字军已经在一种完全非宗教的语言里开始了，而乔治·布什却乐观其成。

为所有的权利而战

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人们提出了许多猜想，因为这里涉及到许多的利益。一方面，中亚有丰富的石油；要进入这个地方，必须要控制阿富汗。另一方面，它还有一种想要包围中国的意图，想从陆地上对中国进行胁迫。最后，在很多政府里，还存在着所谓人民党倾向的人比如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被视

作美国国家安全的危险的敌人。于是，还有好多不安的理由。但是如果用这些来解释美国现在权力政治，就会是一个错误，好像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利益在权利制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样。我们认为还有更多的危险存在。

从注重实效的角度来说，美国从来不会只为单独的利益而战：它经常为整个权力而战斗。依靠所得的整个权力的范围，单个的利益也能得到。通过要求整个权力，利益就能够被看清楚，并成为能够被追逐的绝对价值。巴黎的文艺评论人特兹福坦·托多罗夫分析了科尔特斯是如何攻占了莫斯科的。托多罗夫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分析我们当今的问题。

在柯苏玛，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派几个武装人员到整个国家的中心地区寻找黄金。“科尔特斯大笑着回答了他，说他并不是为这些琐事而来，而是为上帝和国王服务的。”当他听说了阿兹特克王国，他决定不再满足于只是敲诈钱财，而是要推翻整个这个王国。这种战略经常受到他的士兵的关注，士兵们希望经常能够得到利益，而科尔特斯并不为此而动摇。所以，在一方面，我们感谢他，因为他发

明了一种军事占领的策略，另一方面，也因为和在平时期的殖民政策（托多罗夫 1985：122）。

当然，科尔特斯希望得到黄金。但他对这一件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想要所有的东西——当然也包括黄金。他不想以致富的方式回到西班牙，然后以贵族的身份颐养天年；他想要的是所有的东西，伴随着没有尽头的征服。这个西班牙的征服者找到了财富，但也远远超越了所有水平的产权。这就是科尔特斯为什么拒绝了这种“琐事”，而想为上帝和国王服务。这种方式意味着整个王国都必须被征服，然后就是地球上所有的其他王国。科尔特斯并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这种整个国家的利益意味着所有可能的利益都应该永远得到满足。在这里，托多罗夫主张，现代性开始了：现代性从来不会简单地把单个的利益放在心上，而是经常想要整个的利益，以便有效地服务于现在和未来的利益。这些利益就会自己转变成形而上学的价值。通过要求这些利益，这些利益的代表也准备好了献出他们的一切，甚至他们的生命。这就是哥伦布所说黄金是一种物质，它甚至能够打开天堂的大门时的意思。

最后的一份圣达菲文件（圣达菲四号）很清楚简洁

地说明了这些：“除了这些，这个半球的自然资源应该首先保证我们民族的安全。如果有人想这么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门罗主义’”。^①

当然，这里指的不仅仅是这个半球包括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自然资源，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今天，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制度再一次从事于为整个国家进行征服活动，并为它的核心利益服务：资本所有者产权的增加。人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追求整个利益，那么他就能得到其他的利益。

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战略已经获得了它的追随者所描述的整体市场。全世界都在追寻整体市场。但它仍然可能识别那些还没有完全融合的抵抗或利益；仍然会有试图避开这种运动。也会有抵抗这种批评资本积累战略的运动的意愿。对于这种资本积累——称为全球化——这些运动在每个地方都很活跃，而且动员了人们，而这些人们具有威胁这个战略未来的力量。

即使在攻击以前，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整体市场的政治学只能在极权主义政治的世界权力的辅助下才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很明显，而这种世界权力有

① 关于以前的圣达菲文件，见杜赫罗等人 1990。

这种能力消灭所有的“市场扭曲”。今天，我们承认，对纽约的攻击使得这个工程通过称之为反恐斗争的一部分而成为可能。即使是世界上最后的角落也要受到这种资本主义产权经济的绝对市场的支配。恐怖主义这个词的定义于是就被延展得足够大，一旦抵抗运动限制了他们的征服活动，他们就能够以反恐怖主义的名义指责他们。布什的座右铭就是：“不和我们在一起的就是站在恐怖分子的行列。”这个座右铭被历史上所有的极权统治者使用过。美国社会学家迈克·戴维斯（2001）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真实含义：

如果美国历史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先例的话，那肯定不是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而是 1949 年 9 月 23 日。在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的美国公众宣布，苏联在三周以前成功地试验了一枚原子弹。恐惧的冲击波和不确定因素弥漫着整个美国。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反应，提出了“NSC-68”，赋予了建立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自由行动的权利。同时参议院约瑟夫·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利用了人们的恐惧，

发动了残忍的追击内部敌人的行动。曾经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左派偃旗息鼓了。让 50 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同意加入独裁主义的是恐惧，而不是意识形态。

我们和乔治·沃克·布什一起回到未来吗？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会不会意味着对移民的开放的结束，互联网自由的结束，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抗议的结束，个人秘密的权利的结束，以及经受住了毒品战争侵袭的有重要意义的公民自由的结束？

今天，新麦卡锡主义不再仅限于美国，而是扩大到了世界范围的目标。它的武器，被认为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工具，这些都被要求使用来威胁任何对整个战争的抵抗运动。美国，作为这个系统的权力中心，希望得到绝对的权利。它依靠这自己的能力威胁能够消灭任何反对这个系统的运动。

我们要讨论的既不是文明的冲突，也不是反对伊斯兰的十字军。这不是关于美国政治学者和政策顾问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的冲突”，布什政府对此毫无异议。这是一个和整个世界的冲突，所以，当然也是和伊斯兰世界冲突。毕竟，帝国全球化不仅仅是关于狭义上的经济，也包括对文明或文化的控制。整个世界一直

是一个目标，可以用来控制每个单独的部分。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只要有人相信它扭曲了产权积累的整体市场；他们就会要求使用武力对抗恐怖活动，其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国家成为打击的目标。这在现在尤其明显。当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其他的许多国家也已经在美国人的眼里排上了号。这是不择手段的战争。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把恐怖主义描述成像毒瘤一样生长。这个描述以前被用来形容共产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已经取代了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反对恐怖主义的新联盟包含的国家数目已经差不多和联合国一样多，它威胁要取代联合国。其目的是要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反恐世界政府来代替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这个世界政府代表了全球化战略，并利用它在世界上其他大国之中卓越的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麦卡锡主义。历史变成了一个世界法院，而美国成了法官。里根发动的对“邪恶帝国”的斗争已经复苏。对恐怖主义发动的战争为一个大国控制世界上每个大国提供了机会。我们第一次面对着在世界水平上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不再能够由其他大国调停，也不能由其他大国反对。这个帝国追寻无限的威力。它不能明白，它越是

接近无限威力，它的弱点就越是暴露。这样，更多的阿基里斯之踵的弱点变得更加明显。

对纽约的袭击发生的时间正好是对全世界范围内新的极权主义进行探索的时候。对反对恐怖主义战争的宣传已经集中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点上。为了开始宣传，他们把对纽约的袭击和袭击珍珠港作了对比。这个对比的确让人触目惊心。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珍珠港的袭击也是对它本身的一次袭击。很明显，它已经得到信息表明一场袭击正在逼近，但还是决定不作阻止。这场灾难非常严重，以至于美国公众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以坚定的决心进入战斗。但愿，在纽约发生的事情不是珍珠港事件。但是，仍然有事件证明类似的事情也在进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美国在历史上所做的最愚蠢的政治决定，只要和它行动的结果有关，这个决定就充满了荒谬可笑的愚蠢的事情。

· 正义和邪恶坐标的崩溃

我们相信 2001 年 9 月 11 日有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并会对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场袭击打击了整个西方文明的正义和邪恶坐标。我们语言上的混乱是很明显

的。这个帝国的双塔坍塌了，帝国本身也随着双塔的坍塌而倒下。他们并不是因为炸弹而倒下，而是因为语言的混乱而倒下（见圣经中通天塔的故事）。

有一个很糟糕的先例，虽然发生的地点是在某个国家而不是在全球化的世界：1933年的柏林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一场大火。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知道是谁造成的火灾。这场火灾可能是某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杰作，或者是纳粹党人自己渗透进去的。在纳粹的眼里，这既是弑君，也是杀神的行为。随着帝国国会的大火，以前存在的正义和邪恶的坐标也化为乌有，不光是大楼，还有人的内心。纳粹没有提供任何坐标，相反，它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灾难性的、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有的障碍物都被清除。一段没有正义和邪恶坐标的历史开始了，也就是语言的混乱。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历史上第一次的“9·11”，也就是1973年的9月11日对智利圣地亚哥拉蒙德的袭击。可能这也启发了对世贸双塔的袭击。同样，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段很关键的时期，正义和邪恶的坐标被毫无妨碍地抹除。但是全球帝国仍然存在，并支撑着后来的恢复时期。

今天的崩溃是在全球的水平上，而且没有人能说发

生了什么。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另外的选择还没有出现。文明本身能够被重建，但是谁能够创建这种新的基础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未来的前景非常可怕。所有的障碍和妨碍都再一次被清除。但是这个帝国不再有任何更高的用来支撑恢复的权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头寻找以前的经验。由于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有决定权的大国，也就没有另外的政治大国来反对将要发生的事情。

随着世贸双塔一起受到袭击并倒塌的还有建立在我们社会上的正义和邪恶的坐标。这让那些发生的事情变得非常赋有戏剧性。它们是伪善的坐标，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坐标。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比袭击世贸双塔更加不幸的空中袭击也时常发生。但还是有理由把对纽约的袭击看得更加严重。所有的早期的灾难——广岛、河内、巴格达、贝尔格莱德等——都发生在对这个帝国有理的环境下。这是一种不正当的环境，只是指示方向的罗盘而已，但毕竟也是一种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帝国，在洛克之后，依然争论说这些灾难是服务于它所说的人道主义的执行。从这种不正当的观点来看，这些灾难都被看成了“人道主义干涉”，尽管有许多抗议的声音，但是整个世界的舆论仍然接受这种观点。

但是攻击纽约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次的恶魔是起源。也许袭击纽约的凶手也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人道主义干涉”。但是已经没有正义和邪恶坐标来衡量这种行为。伊斯兰世界也拒绝用坐标来衡量攻击者的行为。我们必须很认真地看待他们的领导在这一点上所说的话。他们不能给出这些行为的意义，连不道德的意义也不能给出，就像西方国家经常为他们自己做的恶劣的行为所做的不道德的说法一样。

当代全球化的西方把自己看作是没有阿基里斯之踵弱点的阿基里斯。在巴格达，它通过发动两场战争，杀死了数以万计的伊拉克人，但自身只是伤亡了几百人（以前的数字，现在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军已经超过 1500 人——译者注）。在南斯拉夫，它杀死了几千人，但在北约方面却没有任何伤亡。美国梦想有一种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让它能够在世界上成为主人，并向世界施加无人能够反对的绝对专制权力。但即使是阿基里斯也有弱点，就是阿基里斯之踵，这也是弓箭袭击的目标。到底有没有一种防御陶瓷刀子的盾牌？

错误出现在哪里？是情报组织出了毛病？当然，它们的确出了毛病。世界上就没有不出毛病的情报组织。情报组织也不是没有阿基里斯之踵弱点的阿基里斯。他

们允许犯错误吗？当然不允许。但他们还会犯错误。他们应该尽量少犯错误吗？这就是我们所能够要求他们做的。

有一位智慧老人用威胁来诅咒他的敌人：“你将生活在有意思的时间里”。现在这种有意思的时间到来了，我们都被诅咒了。但和情报组织犯的 error 相比，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整个世界观出了毛病；所有的科学分析活动出了毛病。完全根据经验的科学，甚至不能够辨别出真实，也遭受了完全失败。好莱坞的梦魇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以经验主义而自豪的科学家们却没了主意。这种科学是如何理解这些事件的可以被看做是在使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让我们研究一下用马克斯·韦伯和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分析可能看起来有些愤世嫉俗，但是这种愤世嫉俗并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是这种秩序的客观性创造出来的。以下就是所发生的事情：

大约 20 人控制了四架飞机，并向纽约的双塔、五角大楼和白宫飞去。一架飞机坠毁了，另外几架都到达了目标：他们彻底毁坏了世贸双塔，并撞击了五角大楼。

如果完全按照经验，那么，科学——或者至少是经

济学——应该问什么问题呢？根据 20 世纪早期德国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只能评估目标——评估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科学只能判断方法和参数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些关系，就会很明显地发现这些动作取得了非常高的功效。这些陶瓷刀很明显非常适合于用来劫持飞机。这样，飞机就变成了巨大的炸弹，并达到了攻击者精心挑选的目标。从经验主义的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正式地看”，是在最合理的基础上实施的。实施者脑海中有一个目标——或者说参数选择——而且最终实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这种功效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中是应该受到高度称赞的。经验主义的科学宣称这种功效是科学实验中最理想的能力。

如果我们现在问科学的经济学家谁应该来判断这个行为的结果以及犯罪者的选择参数，这些凭借着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就会哑口无言。科学对于这件事什么话都说不出。它并不判断价值，只是判断其合理性。科学家们考虑问题的过程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描述。犯罪者可以有許多选择。他们可以把飞机开到另外一个机场降落，然后下来散散步，逛逛商店或者买点东西。他们也可以去炸世贸双塔。他们为什么要炸世贸双塔呢？科学

家回答：他们想实现他们的选择参数。他们做出了正式的，理性的选择。但是科学并不能说出他们所做的这几种选择参数所产生的结果。那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但是科学是中立的。无论一个人喜欢这个还是那个，都是他自己的偏好和与口味的相关因素决定的。没有人能够在口味上争论。一个人是出去散步还是去炸世贸双塔——这种选择性的问题和一个人喜欢鱼还是喜欢肉这样的问题是一样的。

当然，这些科学的经济学家今天不敢这样说，但他们的科学遵守着这种逻辑。所以这种科学不能够领会现实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因为现实是由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决定的，即这些飞机是被劫持的，并直接飞向世界贸易双塔的。但是这些科学家把这种事情看作是科学外部的事情，和科学毫无关系的事情。

几年以前，一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因为他发现了计算股票市场利益的一套新的公式。但是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不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这位科学家认为这不是科学应该处理的问题。这种通俗的事实——无论股票市场存在与否——并不影响那个公式的永恒的正确性。即使是没有股票市场，这个公式也应该是成立的。有没有股票市场成了

一个口味的问题。但是用来计算利益的公式应该是永恒的——应该和物理学家用来解释世贸双塔倒塌时所用的地球引力原理一样永恒。但是并不是因为有地球引力，世贸双塔才倒塌。它们的倒塌是因为有人让它们倒塌，这些人非常理性地把地球引力也计算在内了。但是它们是如何被弄得倒塌了呢？没有任何的经验主义科学家愿意解释而使得自己成为靶子。这个原因是科学之外的，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这也意味着这种科学是在现实之外，超越现实而存在的。即使是德国社会学家尼科拉斯·卢曼已经发现一个人，作为一个对象，也是在这个系统外部的对象，也就是说，存在于这个系统之外。是否有人真的认为纽约世贸双塔的坍塌可以通过地球引力原理来解释？还是可以套用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式？

这并不是对科学的挖苦，尽管科学的一些举动的确非常玩世不恭，由于正是对真实生命在体系上的漠视才导致了这种破坏性的间接效果。这也是为什么维维安妮会写下了“经济恐惧”。如果科学本身相互抵消，那么人们就很自然地需要在攻击者的帮助下创造出一个让世贸双塔倒塌的魔鬼。这就是乔治·沃克·布什的观点，他相信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但很可能攻击者也会看见魔鬼。在他们的眼中，魔鬼正在利用这种制度和世贸双塔。世贸双塔的坍塌

就是他们对魔鬼斗争的一个部分。一些人的神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恶魔。在科学和理智的领域，每个人都和他们在其他人那里看到的魔鬼作斗争。科学和现实分了手，并把现实拱手让给了魔鬼，而在旁边观看魔鬼之间的斗争。这不光是科学，理智也和现实脱离了关系。马克斯·韦伯宣称：“在个人所占据的最后的位上，一边是恶魔，一边是上帝，而个人必须决定哪边是他们的上帝，哪边是他们的恶魔。这就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韦伯 1956: 329）。一些人的上帝，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恶魔。“命运，而当然不是‘科学’，在统治着这些上帝及他们的斗争。他们只可能理解对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来说什么是神圣的，或者，能理解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秩序”（同上：330）。

布什的上帝就是本·拉登的恶魔，本·拉登的上帝也是布什的恶魔。马克斯·韦伯补充说，不是科学，而是命运决定了这些。西方社会已经废除了作为它基础之目的的理智。教堂在提前安排好的祈祷的那天挤满了人，人们向上帝祈祷，而上帝被认为能够代替消失的合理性。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上帝。即使是无神论者也参加这样的祈祷日，但能够听到这样祈祷的上帝并不存在。这种上帝替代只能让情况更加糟糕。

现代社会在几十年里一直在反对乌托邦和其他的社会选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它宣布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事实上，它的确成功地破坏了各种抵抗运动，而且还经常用难以置信的残忍的手段。但他们的辩论却的确令人信服。几乎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灭亡了。这种制度在人类生命和地球的废墟上庆贺胜利。一种没有希望的文化被贯彻了下去。他们宣称那些在地球上想要天堂的人创造了地狱。这个没有希望的社会声称无可替代，却一天天地恶化，令人失望。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令人失望的世界。很快，我们就能看见地狱，这个地狱并不是魔鬼建立的，而是那些绝望的人自己建立的。但是他们也只是在制造早已经为他们制造好了的地狱。在此引导下，我们得出结论：不管是谁，在地球上不想要天堂，就在创造地狱。

霍布斯把文明社会解释成为用来代替人人互相斗争的秩序。这种秩序现在执行的结果却是人人相互争斗。这种争斗并不属于过去，它在未来还会和我们碰面。

地球村里的内战

世贸双塔的倒塌标志着地球村内战的开始，这种内

战我们已经说了不少，但只是用可怕的警告的形式告知民众。现在，它已经抓住了人们的心。但是这种战争的位置是不确定的。破坏世贸双塔的攻击者不想攻击其他社会，也并没有预兆新的方案。但是受到攻击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提出别的方案。它宣称自己是历史的结尾。然而，这只是意味着它自己的方案已经结束。它确认了它自己和它所产生的破坏。它并没有提供别的，只是从现在的痛苦中为整个未来设计出一个方案。它制造出破坏性。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它也全球性地破坏着世界。社会不再有对未来的先见之明，而且人们也不再能够从社会上要求这种事情。它所说的自由——持久的自由——意味着通过手里控制的权力持续地进行着破坏。这容易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并击碎任何改变的希望。但这只是在重复产生现在这个毫无意义的社会本身正在产生的东西：它谋杀别人，为了进一步地整体自杀。在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以后，白朗古将军说过的话能够很好地概括它的进步：“我们正处在万丈深渊的边缘，通过军事政变，我们已经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制度对恐怖主义的反应也有相似的本质。

马丁·海德格尔说过：“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但是这个制造了这场内战的上帝却不能拯救任何人。在

某些案例里，它却把天堂给了那些通过自杀实施谋杀的人，只要他们继续做他们已经做过的事情。

现在已经不存在文明碰撞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全球化的文明以及下面的几个次文明。提起文明的碰撞只会制造更多的借口和更多的语言的混乱。人们并不想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为侵略做辩护。对世贸双塔的攻击并不是来自外部，并不是来自另一种文明。这种攻击来自内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全球文明的产物，而攻击的对象正是这种文明的中心。这种文明来自其他各种文明的毁坏。它的中心并不是建立在大学或者剧院。它的中心是战争部门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中心。为增加资本所有权而进行的交易和战争决定着这种文明；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附属品。

这场攻击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攻击者的训练营并不在阿富汗，而是在佛罗里达州和汉堡。在阿富汗，计划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攻击是不可能的。他们可能在那里得到激励和资助，而从别的地方组织起来的。这场攻击发生在全球化的世界的中心。今天，世界真的成为了一个地球，但在这方面它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果。相反，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果。

它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圆圆的地球。超越人类世界社会的事情不会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种文明的中心，即使这种文明的某些特点一起决定着对这些事情的反应。从美国来的恐怖分子，比如说蒂莫西·麦克维或者尤纳博然（Unabomber）组织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的，而阿拉伯的恐怖分子用他们的方式行事。但是他们所进行的恐怖活动是不相上下的。另外，他们的供给品的来源也是同一个地方。

这种来源并不是全球化的世界。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是他们行动的空间。这种来源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的一种追求资本积累的战略，他们称之为全球化。恐怖分子的活动所带有的恐怖性是和培育他们实现的这种战略本身所产生的东西成正比。他们的恐怖主义仅仅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战略的另一侧面。这些国际机构和举世无双的正统派基督教一起行动。即使是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把这些国际组织表述成“全球市场的正统基督教信徒”。他们向世界灌输和他们全球性的本质相反的“资本产权积累战略”。事实上，它们正起着破坏性的效果。但是这种战略允许对人类和地球进行剥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国际组织通过它们的反乌

托邦主义和反人道主义来系统地宣扬一种没有希望的文化。统治阶级是这种赌场经济的全球参与者。但在这种赌博游戏中，受到损害的还有人类的生命和环境。

所以新的全球范围内的威胁也被煽动起来，在最近一直恫吓着我们每个人。在消除市场扭曲的名义下，所有的障碍都被清除，以便让资本能够毫不受责备地增加。和市场扭曲一起被清除的还有保证真正生活的基本人权。同时，人类的尊严也正在失去，因为人正在被变成人力资本。对地球的排除和破坏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机械操作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对人权的破坏，可悲的是，这种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了。

全球性的威胁正在一连串螺旋形的破坏中进行，而全球化战略并不能阻止它，因为正是这种战略制造了这一连串螺旋形的破坏。相反，一种自动的反射映像被制造出来，以致我们对正在经历的破坏麻木不仁。我们的经验主义科学几乎从来不提这种螺旋形的破坏。他们把破坏看作是一种“外来的结果”，因为它是由直接市场行为的副产品或非直接作用产生的。

把人们中的大部分排除在产权经济之外，导致世界上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人们无法生存。他们开始移民。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给暴力驱逐增加了压力。这种

压力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以致威胁到了以前受驱赶流动人口影响最小的地区，多数是中心国家。这些地区关闭了他们的边境，并使用暴力阻止移民潮。其结果是，一场未经宣布的战争在中心国家和被排除的国家的边境爆发，每年都要导致好几千人死亡。

被这种积累战略排出的人愈多，移民目标国家的移民运动的压力就愈大，而这些国家的反应就愈强烈。而且，设法通过边境的移民也要饱受这些国家的歧视和剥削。然而，他们也得到了根本性的问题，他们已经可以活下来了。

关于和环境的关系，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模式。对环境的剥削正在导致一场环境危机，这场环境危机在最近几十年里正在向全球性危机方向移动：臭氧层空洞正在扩大。鱼类正在从河里消失，水被严重污染而变得有毒。新技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疾病。作为产权积累的赌场资本主义，这并不是问题：每一次新的危机也意味着新的利益，因为这样就需要新的投资来修复以前投资所带来的损坏。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危机只是给了移民更多的场所。

地球是圆的。这种说法对美国来说好像很新鲜。从我们的枪膛里射出去的子弹击中了我们的敌人。但是，

子弹从他们的身体穿出，环绕地球飞行，然后又射中了我们的后背。正因为地球是圆的，每个人都受这种说法影响，包括美国。它想一直发射子弹，但他们所射出去的子弹环绕地球又回到了他们的后背。

赌场资本主义忽视了所发生事情给人以及环境造成的影响。赌场资本主义只是知道他们用武力贯彻下去股票市场指数作为标准。海湾战争是否成功取决于股票市场。如果股票市场上升，那么这就是一件好事。在对南斯拉夫的战争的原则也是一样。如果为“9·11”复仇的十字军们能够让股票市场价值攀升，那么这也是一件好事。其他的都不算。如果没有股票市场的报道，任何新闻广播都是不完整的。股票市场也显示局势正在向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没有其他的标准。

那些值得注意的抵抗运动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对所有改良、所有乌托邦和所有人道主义的拒绝已经让全世界的人的良心变得麻木了。为了能给赌场中的参与者提供和平安静的环境，世界被播种了无希望的种子。这一点做得很成功，但是更多的事情发生了。不仅是无希望的理念被传播：无希望已经变成了绝望。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宿命论，而绝望并不具有宿命论的特点。

失望不会产生抵抗，却能产生令人厌恶的事情和社会迸发性的情绪。我们从一个早期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是怎么来的：发生在 1989 年的 2 月加拉加斯起义。他们没有改变社会的计划，但是人们发现了他们无法忍受的情形，于是就发生了起义，商店被抢劫。这种社会性的迸发没有任何前途，只能导致更多的道德败坏。

政府对这些奇异的反应也是同样的盲目的愤怒。卜莱兹总统变成了刽子手，并命令射击。在屠杀了几千人之后，这些起义结束了，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绝望。加拉加斯起义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运动发生在同一年。天安门广场的背后有设计好的方案，而几个月以后的加拉加斯起义则没有。尽管这样，加拉加斯成为了未来的指示器，而天安门事件却没有。但是通讯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天安门广场，而不是加拉加斯。

赌场资本主义却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分析这种情况。这些全球性的参与者继续用世界的命运来赌博。自杀性杀手在各处出现，最先是在美国，然后是整个世界。没有人觉得和这件事有关。赌场继续进行，并相信会一直这样下去，因为它把自己看成了历史最后的形式。它宣扬无希望和失望的理念。绝望在世界上传播。

从无希望到绝望

但在我们的世界上，绝望并不以宿命论为结果，而赌场资本主义认为是这样。绝望向前发展就变成了狂热而盲目的行动：为被破坏而进行破坏。在麦克维被执行死刑之后，布什总统说他已经遭受了和他（通过行动）追求的命运相同的命运。我想布什并没有真正理解他所说的这些。

我们面对的是背后没有政治计划的恐怖主义，这是一种不再有动机的犯罪。他们不再想得到任何东西，于是也不知道界限。如果他们有一个目标或者追求一种乌托邦，他们自己必须有限制，至少是和他们目标有关的。但因为他们没有目标，所以也就没有限制。这种制度不再承认任何边界，恐怖分子的反应也是这样。

对纽约的袭击是迄今为止最坏的结果，和 1995 年对俄克拉荷马州的攻击很相似。攻击者开始了破坏行动，并接受了以死亡作为行动的结果，甚至作为行动的原因。他们接受了这种制度的座右铭：没有别的选择——想在地球上得到天堂的结果就是在制造地狱，人道主义是对人性的攻击。袭击者是后现代主义的人。但

他们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者鼓吹的那样躺在吊床上喝酒，而是把自己投身于战斗。

为了能够看出 1995 年对俄克拉荷马州和 2001 年对纽约攻击的相似性，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前面的攻击。对蒂莫西·麦克维执行死刑让我们面临新恐怖主义这个问题。这种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形式要求我们对它要全神贯注。蒂莫西·麦克维没有任何计划，并不想通过他的恐怖行为得到任何具体的东西。有人甚至说他的行动和恐怖主义毫无关系。但是我们能够公平地说他的行为是第一次严重的恐怖行动，而以前所有的行动都很少和恐怖主义有关系。蒂莫西·麦克维发动破坏的目的是自身被破坏，它本身也没有想通过恐怖行动来能为什么事情做点贡献。所有早期的恐怖主义都源自这样一种想法，即用一种东西替代另一种东西。国家恐怖主义或者个人的主动行为在创造别的东西的帮助下宣布他们的破坏行为。这种新的恐怖主义不再有创造东西的野心，只想自我毁灭。但是这种自我毁灭也是源自对别人的毁灭，所以这并不是简单的自杀。这种自杀实际上是谋杀的后果。但这种自杀既不想得到证明，也不想获得什么东西，甚至不想树立任何标志。除了这些，这种自杀还是一种社会行为。恐怖分

子和其他人一样是社会上的一分子，虽然他们是和其他人作对的一分子。新的恐怖主义只有在他们的恐怖行动中才能获得利益，别无选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对蒂莫西·麦克维的执行死刑可以称得上是神圣的举动。这个深受谴责的男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他除了宣称自己无敌以外，什么都没说。他要求为他读威廉·亨利（1849~1903）的诗《万神殿》。到场的人都开始祈祷。在这里，也给法律带来了一种牺牲，即死刑的意义就是直接反对多数人牺牲的一种行动。

这件事情可以非常简明地说清楚。在 1995 年，蒂莫西·麦克维使用了两吨炸药引爆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公共建筑。这样，他杀死了 168 人，包括大约 20 名在这座建筑的托儿所里的儿童。在审问的时候，蒂莫西·麦克维的父亲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只是知道自从他结束兵役回家以后，就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在部队服役，一直到 1991 年的海湾战争结束）。”^①事实上，蒂莫西·麦克维在这场战争中受到很高的非常荣誉。当记者问起他的行为的时候，他还

^① 以上关于麦克维的描述以及他的引用，译自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份报告。

是用战争的语言回答。“他当时告诉我：‘那是一场 168 人对 1 人的战斗’，卢·迈克尔写了一本关于蒂莫西·麦克维的书，他在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迈克尔说，麦克维当时把自己看成了一个胜利者。迈克尔也被麦克维允许目睹他的死刑的执行。”我们记得这种话是在海湾战争中有人说过。在 1999 年 4 月 30 日，有报道说：“毫无疑问，不是像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大约 100 名联军的死造成了 15 万伊拉克人的倒下。”

在海湾战争中的关系是 1:1500，而麦克维认为他的胜利是 1:168。当有人问及是否为那 20 多个孩子的死亡感到恐怖时，他回答说这是一种“附带损害”。他的原话是：“那么多人失去生命，我感到很遗憾。但那就是做这种事情的方式。”关于他对遇难者的反应，他说：“我为那些在俄克拉荷马州失去亲人的人们感到难过。但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你们不是第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或者第一个失去孙子的爷爷。这种事情在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我不会像遇难者生前所想像的那样走进审讯室藏起来并号啕大哭。”

这是一种战争语言。在审讯过程中，他虽然承认了所犯的罪行，但一直声称自己无罪。这也是战争语言的

一部分。当然，恐怖主义并不是战争的一部分。而麦克维却把海湾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带到了每天的生活中。从他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但那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海湾战争的确包含着像麦克维那样的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同时还伴随着对更重要价值的追求。这种说法就是“为和平而战斗”，为保卫人权而进行的战争。麦克维没有辩护就承认了他的行为。这样他就把这种行为转化为赤裸裸的暴行。现在，这种行为无处不在，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发生——而的确发生了。不论是攻击者还是海湾战争中的战士麦克维，都有道德之心。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而且宣称自己无罪。

如果我们分析麦克维的行为，我们就会意识到，新型的恐怖主义有这样的范例：为了被毁灭而去毁灭。“我一直希望能够最终离开这个糟糕的世界”，麦克维说道。“让我们把这种整个事件称为国家发起的自杀。”有时候恐怖分子自杀，有时候他们要求国家当局杀死他们。在其他的场合，集体自杀也会发生，在集体自杀中，闪动着杀死了他们自己，也杀死了其他人。很明显，这是从美国开始的，但很快传到了欧洲和日本。而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够看见。

对恐怖主义传统的分析无助于了解这种现象。尼采

在他的文章中向我们介绍了这种绝望文化：

如果一个受到痛苦折磨，受到压力的人对轻视权力想法的权利失去了信念，那么他们就可能踏上了绝望的舞台……道德能够保护虚无主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在虚无主义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无穷的价值，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并把他们放置到一种和世间的权力排列不相符合的顺序里：它强调顺从、谦卑等等。假使在这种道德上的信念崩溃，那么下层人就不再有慰藉——也将会崩溃（尼采 1982：第三卷，854）。

这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一个人用来抵抗绝望的无限价值被破坏。人被变成了人力资本。被资本主义产权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于是就成了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

这种崩溃是以让自己崩溃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一种必须被破坏的事物的本能选择。这种自我破坏的下层人症状：……首先被用来把权贵当作自己死敌的动作的本能性强迫（相当于培养自己的刽子

手)，作为仍然是深层本能的破坏性的意志，自我破坏的本性，无为的意志。

虚无主义，作为下层人不再有慰藉的征兆：他们为自我破坏而进行破坏，从道德上面清除，他们不再有“自我投降”的理由——他们把自己置于相反原则的境地，而且也想得到权力，以便于他们强迫官贵成为他们的刽子手（尼采：855）。

看起来非常清楚，尼采所说的情况现在正在发生。这段文字看起来像是对蒂莫西·麦克维或者是对纽约的袭击的一次注解。在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新闻舆论的评论像这个 100 多年以前所写的这段文字这样清楚。但是尼采并不是一个能卜未来吉凶的预言者，但是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在一种文化绝望后面将要发生的结果，一种他本人在推动的文化。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和谐。恐怖分子自杀或被执行死刑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受害者和刽子手之间的矛盾消失了。刽子手想杀人而被杀者想被杀死。从持久的观点看，相反事物同时共存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就是一直被认为是神圣活动的行为。对尼采来说，这就解决了虚无主义这个问题。权贵和下属之间的

矛盾就能够得以克服。权贵通过惩罚他们下属的犯罪行为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处死他们。权贵可以不受限制地追求他们向往的权力。在最底层的人们，“下层人”既不能，也不想发动人们抵抗。“道德”已经告一段落，因为现在它仅仅是权贵们的事情。

但是尼采的解决方案论证了一种简单的幻想。一个人破坏了道德，目的是破坏他自己，而这些在 1889 年尼采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所有的强迫处于底层的人向自我毁灭方向发展的处于顶层的人们最终也毁灭了他们自己。整个社会就像一个旋转木马，所有人都进行着破坏活动，其目的只是最终毁灭自己。

新的恐怖主义在通向资本产权积累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过程中，站在了相反的一面。人们被简化成了人力资本，而且每一个超越人力资本的前途都被缩减。这就是具有支配作用的绝望文化出现的原因，这种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人们认为不会再有别的选择。但是人力资本是一个对象，即使在现在的这种反常的状态下：破坏只是为了被破坏。新的恐怖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意义的本质的血淋淋的符号。

新恐怖主义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纳粹主义本身也提

供了一个先例。在对世界所有地区犯下了令人发指、无理性的暴力统治之后，纳粹主义也分崩离析，而且纳粹的三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希特勒、格贝尔斯和戈林——也自杀了。格贝尔斯同时也杀死了他的四个孩子和他的全家。在德国崩溃之前，他们曾经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得不从世界的舞台上退下来，他们就会用力摔向他们身后的大门上，让整个宇宙都发抖。

我们的赌场资本主义及其全球范围内的参与者没有说过这种话吗？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绝望的人的刽子手，虽然正是他们自己把这些人逼上绝望的道路上的，而且如果他们想让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就必须得这样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为了刽子手。制度的灭绝人性化和它的赌场强迫那些为这种制度负责的人变得比那些受害者更加没有人性。到后来，他们只是刽子手，他们发射出去的灭绝人性的子弹击中了他们的后背。那些自认为是文明的、继续着这种制度的社会经历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兽性行为。那些发动阿富汗战争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

他们知道这些。当2001年10月7日开始对阿富汗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CNN播出了B-1、B-2和B-52轰炸机起飞的画面。这些战斗机被涂上了会产生反射

的颜色。它们有着鲨鱼一样的眼睛和牙齿。它们看起来像可怕的巨大的空中妖魔：飞行的鲨鱼，一路吞食着挡在它们面前的任何东西。这些飞行的鲨鱼组成了西方国家所宣称的价值观，而且这是一位通过选举欺诈而掌权的总统的所作所为。在水里尝到血腥的鲨鱼会变得疯狂。他们已经吞食了阿富汗，正在寻找下一个可以吞食的国家。飞行的鲨鱼的图像只是在第一天被播出，然后他们就撤下了这种图像。但是这种鲨鱼飞机还在继续飞行，尽管媒体不进行报道。

在深入这种分析的时候，我们将要比尼采走得更远。新恐怖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所作所为是一样的，只是从相反的一侧入手。赌场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一样具有自毁性。赌场资本主义通过其资本积累合理化的不合理性实施自杀。恐怖主义，在一种世界舞台的环境下，表现出赌场资本主义真实的一面——它是古罗马圆形大剧场，在那里人们是真真切切地被杀死的。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世界剧场。那些疯狂的自杀性攻击者所上演的残忍的现实戏剧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社会上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我们整个社会正在进行着疯狂的自杀性攻击者在世界性舞台上的表演：他们杀死了别人，而且知道最后他们也将要自杀。然而，这些疯狂

的自杀性攻击者，被描述成了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而对所有人类做着同样事情的人却坐在了非常荣誉的席位上。

在这里，我们有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主题，对纽约的袭击是比以往任何一次空袭都要恶劣的灾难。这次灾难显示出这种体制——赌场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正义和邪恶的坐标。正因为这个制度本身造成了发生在这些袭击中的灾难，所以这种制度要谴责这些灾难的实施者，必须先谴责自己。但是因为它不会谴责自己，它只能接受这种袭击作为赌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尼采非常清楚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结果，事实上也的确表示这种方法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刽子手只是尼采所称的完人的相反的一面。这种既是全球参与者也是刽子手的完人一直做着自己的游戏，直到所有的东西都被炸掉，并在永恒的循环中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制度并不需要正义与邪恶的坐标，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正义与邪恶之分。

所有的人都通过呼吁人类尊严来谴责这些袭击。这种制度和赌场资本主义的代表也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但是，考虑到这种制度，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它没有任何权威来用这种方式谴责。因为有全球化的战略，它已经在

几十年里违反、谴责并践踏了人权。人民有权来谴责这种行为，因为他们经常保卫人权。这种制度的代表是以什么名义谴责这场袭击的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权利，而这场袭击却表明了缺少对这种权利的尊重？这种制度的代表所表达的是一种谴责，而许多人认为这种谴责并不具备权威性。

整个全球化战略已经背叛了人类尊严。这恰恰排除了市场扭曲所产生结果：人类尊严被清除了。对尼采来说，这种清除代表着上帝的死亡。当人类的尊严被杀死以后，上帝也就死亡了。尼采把上帝之死描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英雄式的行动。尼采是那些代表这种制度的人特别喜欢的哲学家。但是这个行为既非最重要，也非英雄式的，它只是非常俗套。

任何背叛人类尊严本质的人都不能谴责这种呼吁人类尊严的袭击。这就是为什么皇帝没有衣服。这种恐惧打击了今天的人性；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制度正在失去它的导向性。它只是通过要求自己的权利，或者通过追求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股票市场价值来谴责这种袭击。除此之外，别无任何方式。罗盘上的指针正在转动，不再指示方向。如果有人走错了方向，至少还有得到更正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罗盘里的指针正在转动，而这个人已

经达到了地球极点，指针也不再只是方向。这种制度已经达到了这种极点，所导致的眩晕已经让我们所有人为它所掌控。

任何人在谴责对纽约发动的那场袭击的同时，也应该谴责指向资本产权积累的全球化战略。这种战略的间接作用已经导致对这种制度的反应和这种制度本身一样极端没有理性。在这种新的恐怖主义里，这种制度出现了与其本身的矛盾。两种相反的事物合二为一。

死亡神秘论起来反对人性的尊严。这从 20 世纪到今天的支配性的哲学都以死亡神秘论为中心，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后现代性。海德格尔宣称一个人一直向死亡逼近。如果这种神秘论是我们当今文明的主题，我们还能期盼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制度已经把人变成向死亡逼近的人。这是真的吗？尼采说：“我们正在利用事实做一个实验。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人性会死亡！”^①

美国跨国资本的智慧库美国公司协会的官方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称：“在民主资本主义心中的‘空地’就像一块战场，在这块战场上，个人在混乱和许多倒下去的人中移动”。就像尼采一样，他得出结论：“自然不应

^① 海德格尔引用。

该被视作达到、完成、结束。创造还没有完成。仍然有
人类不得不做的事情。惊喜在于积累。如果还有恐惧需
要面对（经常有），上帝就会和我们在一起。未来不会
有往上的倾斜，耶稣受难的各各地除外：所以，不要动
它”（诺瓦克，1982：73）。

他们还会用这种方式执行下去吗？他们非常清楚，
这会把我们引导到哪里。这不恰恰就是这种制度的恐怖
主义，“经济恐惧”吗？每一个支持这种制度的人都瞄
准了地球上的天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坚持他们否定的
前景：灭绝、各各地、地狱。

他们相信炸毁世贸双塔的恐怖分子的想法和他们不
一样吗？他们甚至可能例证了相同的想法。带着相同的
想法，他们在暴力的陶醉中相互鼓励。一个人用非宗教
的语言谈论灭绝问题，另一个人用基督教语言谈论耶稣
受难的各各地，还有人用伊斯兰教术语谈论类似话题：
这里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文明的碰撞吗？但是对于那些
参加了这种他们津津乐道的暴力活动的人来说，他们之
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最多，他们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别的就没有区别。或者如果有人戴着穆斯林头巾或者圆
顶硬礼帽，这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会有影响吗？

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这场袭击之前很久，微软开发

并卖出一套电脑游戏，在游戏里玩家是一个劫机者。玩家必须克服重重困难以达到目标，包括让飞机坠毁在帝国大厦上。这种游戏能够很容易地用模拟器进行操作，给潜在的劫机者提供了训练机会。能有人说出售这种游戏机是一个错误，抑或只是简单的暴利驱动？还是因为贪欲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不相信是这样。失去了主观性把它本身变成了对自己的侵犯。一个人把人类看作是“向死亡逼近”，把死亡作为目标——也包括这个人自己。

比尔·盖茨设计了这个计划，而本·拉登执行了这个计划。他们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颠倒的一致——一起行动。这当然和文明的冲突毫无关系。我们正在面对的的确是一种全球性的文明，这种全球性文明伪装成各种不同的文明：伊斯兰的头巾或圆顶硬礼帽，本·拉登或者比尔·盖茨。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分裂，而分裂的两极能够相互接触。对于他们的故事，我们还能相信多久呢？这就是摧毁世贸双塔的语言的混乱起源所在。谁是罪犯？是设计计划的人还是执行计划的人？在他们背后所支持的是什么样的强势力？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整个欺诈过程。我们想看看没穿衣服的皇帝。

现实中所发生的要比好莱坞电影中所表现的世贸双

塔的倒塌要更加糟糕（《空中一号》、《哈密吉多顿》等）。但是在电影里，都是外部的强势力发动的攻击。在微软的电脑游戏里，一个玩家可以自己主动攻击世贸双塔。这种毁坏是来自内部。当人们看到纽约世贸双塔倒塌的时候，有谁没有想到过：“难道我在以前没有看过这种场面吗？”这种想法并不是来自已经引退的文明的敌人，这种场面更是来自他们内部核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所有文明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的文明扫除了所有对死亡的本能的抵抗行为。它让死亡的本能变得有理性，并交付给了对暴力的陶醉中。它在自掘坟墓。正在进行中的自我毁灭被描述成了进步。那些执行这种场面的人被处死，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他们整个民族。但是对于那些设计出这种计划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呢？即使他在设计这种计划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意图。

在公开承认自己意图的层面之下，还有一个层面是被否认的满足自己梦想的想法。戈雅说过理智的梦想会产生妖魔。而这个梦想让理智本身变成了一个妖魔。这就是合理化的不合理性之所在。比尔·盖茨和本·拉登能够对簿公堂吗？还有没有不是帮凶的法官？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疯狂，完全理智的人的疯狂。他们毫无困难地运用自己辅助性理智。到目前为止，精神病学还

是把使用辅助性理智归结为常态，它把那些疯狂的人视作常态。它甚至不能找到那些疯狂的人，因为这是一种在辅助性理智范围内的疯狂。画家戈雅是第一个展现这种疯狂的人。

西方国家的危机正在靠近最后阶段。在利用产权经济把人们排除在外的危机过后，环境危机和社会关系危机正在传播。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类本质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有理智而且有完全正常行为能力的人变得疯狂起来。这种危机会导致所有人之间的战争，每个人都会用理智的方式杀人，而且尊重所有辅助性理智和市场的规则。

这种危机本身也遭遇到了危机。如果有人没有炭疽热，他们至少可以有一些白色的粉末来冒充炭疽热，目的是传播恐惧并表明他们的意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是恐怖分子会伪装成好邻居潜伏起来。我们分析越深入，区分恐怖分子和非恐怖分子就变得越困难。最后，每个人都会成为恐怖分子。

这种制度，及其和这种危机之间的关系一直试图计算出容忍的界限在哪里。它挑动起骚乱，以便能够以秩序保证者的形象出现。这样，这种制度已经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但是这种容忍的界限还是没有能够被计

算出来。只有他们超越了这种界限的时候，才会知道界限在哪里，但一旦超越了这种界限通常不会有折回的情况出现。这种制度现在已经跨越了这种界限。它只能执行谋杀行动，没有折回的可能。它所取得的胜利被证明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获得的胜利。揭露有理智的人的疯狂无异于脱下了皇帝的衣服。

是否有出路？

他们在地球上保证地狱，任何想要去地狱的人都会得到。他们永远不会找到天堂。这就是在对天堂的期望中区别所在。保证人间天堂可能或走错方向：可能会导向地狱。但相同的是，一个好的世界也可能出现，离天堂更近一步。保证抵御——这种方法不会走错方向。

这个问题并不是用来保护可能已经死亡的文明并为之唱挽歌，这种文明大规模地杀人，但这并不能挽救它。相反，这种问题是用来保护人类尊严，完全超越了物主的身份，以便于那种文明最终能够尊重人类的尊严。

战争已经被宣布出来，但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宣布——击败恐怖主义的惟一方法是找到一种替代这种制

度的可能的方法。更进一步来说，恐怖主义只是这种制度本身所实施的恐怖行动间接的结果。如果这种制度不能被抛到身后，这种间接的结果是不会被击败的。那些正在寻找新的选择的人如果成功了，那么他们就是惟一的能够稳定我们生活的人。只有击败全球化战略才能打败非理性的恐怖主义，而全球化战略的非理性只是在恐怖主义的非理性上简单地体现了出来。这个问题是双重的，但是归根结底是单一的问题。现代的对暴力事件案的陶醉有一个超新星的外表，它将在身后留下一个黑洞。

寻找新的选择的运动已经对应该做什么事情有所暗示。当今的一些灾难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运动必须更加强烈来防止未来更坏的灾难发生。这种制度作为整体是以两个部分存在的：在一方面，它是建立在全球化战略的非理智基础上的，而在另一方面，是建立在恐怖分子非理智基础上。这两种非理智基础必须被同时摧毁，否则任何一个都不能被摧毁。这种摧毁是必须的，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变得稳定，而能够动摇让我们社会变得不稳定的赌场资本主义。如果不能动摇赌场资本主义，我们就不能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被固定在信奉传统基督教的两个极端之间。这两个极端相互接触，而且他们的

冲突非常明显。通过这种冲突，他们相互确认支持。投资者逃到了“黄金保护地点”。他们为什么不在人性尊严新理念，而是在物主尊严的共识下寻求保护呢？他们是不是认为黄金有更高的安全因素？

当所有的都说了，也做了，市场必须变得更加灵活，以便让人们和社会能够找到他们重获稳定的路。赌场资本主义想让人们更加灵活，以便让市场继续保持着产权积累的不灵活的方式。

如果一个人的上帝是另一个人的恶魔，而一个人的恶魔是另一个人的上帝的话，那么一场生与死的毫无希望的战争就会发生。正义与邪恶的坐标就会消失，任何事情都变得可能。我们就能够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如果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接受自杀，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因为这场战争中的敌人也接受用自杀来作为解决方案。

在这种想像中的正义与邪恶的战斗中，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放到任何一边。我们必须摆脱战斗本身。就像一句谚语所说：“如果只有两种选择，那么就选择第三种。”

我们必须用这样的事实来面对这个社会，为了公共福利，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人性尊严的共识。这种公共福

利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这一点必须成为在此冲突中各方面都应该考虑的最重要的参考点。在拉丁美洲，被描述成了这样的画面，一个“所有人都有生存空间的社会”——包括一无所有的人和环境。这个主题受到了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的启发。因为社会是个圆球，只有每个人都有空间才能称之为社会。如果不是这样，最好任何人都不会有空间。

在 19 世纪，尼采第一次阐明的是野蛮人，而不是社会主义。他是这样说的：“为了从混乱状态奋力达到这种形态——这需要抉择：因为，人们必须有所选择，要么毁灭，要么成功。统治种族只可能由恐怖和强制的开端产生。问题在于，20 世纪的野蛮人在哪里？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种种严重危机过后，他们才会崭露头角和自我巩固——必须是对己严酷无情之类，也就是有能力至死坚持意志的分子。”（尼采 1982：第三卷，690）。

这个有关野蛮人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座右铭非常流行。首先是纳粹主义，接下来是赌场资本主义的野蛮人及其全球参与者。罗莎·卢森堡对这个格言的反应是倒转这个座右铭：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人，意味着社会主义而不是野蛮人。但是社会主义也经常在面对这种问题

的时候败下阵来。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套用这个座右铭：公共福利在野蛮人之前，关注公共利益，而不是关注野蛮的行为现在非常流行。在拉丁美洲，我们说含有一切的社会——包括环境——在野蛮人面前也有空间。

第六章 需要增长的是增强生命的产品，而不是资本主义产权

——拉丁美洲更新的从属关系理论

20 多年以前，全球化像飓风一样横扫了整个世界，也扫过了拉丁美洲。这个大陆也被国家功能私有化、自由贸易、国际资本运动的激增、福利国家的分解、向跨国公司移交经济的计划功能以及劳动力和自然对市场力量的屈服所破坏。

对此，几乎还没有有效的抵抗，部分原因是国家恐怖主义和全球化一起使得这种抵抗变得毫无用处。谋杀、折磨以及人的“消失”及埋葬在秘密公墓的行为，伴随着这个过程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是，因为别无选择，这个过程也被合法化了。由于很明显没有演习空间，服从于全球化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现实。统治阶

级以这个过程的管理者和执行者的形象出现，而大量的媒体也打着效率和竞争的名义把自己变成宣传员。占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理论并不分析全球化，而是对其一片赞扬。整体市场看起来像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和人类必须要知道的权威的知识。它看起来像是绝对精神。

面对这种情况，今天的拉丁美洲的从属关系理论应该获得新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属关系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兴起，伴随着应用到那里的发展政治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 70 年代。它是建立在一种中心 - 外围模式上的。根据这种模式，中心国家（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和日本）在几个世纪以来，把他们的发展建立在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基础之上——尽管中心和外围国家可能在世界上处处可见。对于外围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这样一种战略，为了发展，在开始从事国际贸易之前，首先要部分地和世界市场脱离，实行一种按照需要进行调节的受保护的国内经济。从 60 年代末起，这种曾经成功的发展计划进入了一种危机状态，这种危机状态使得发展计划再形成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工业化集中在了国内市场，其结果是资本货物进口的增加不能通过相应的工业出口来偿还。这种结果是在国际收支平衡基础上的一种危机，这可以通过重建工业

化进程来解决。相反，从智利 1973 年的军事政变开始，全球化的飓风已经导致了这种工业化和发展计划的废止以及后来被摒弃。

这种情况可以和今天西欧的情况相比，在那里福利国家危机已经变成了一个废止福利制度的借口。他们不是通过改革和重建来解除危机，而只是公开抨击并宣布福利制度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降临到拉丁美洲的发展计划的命运，也是伴随和解释计划的理论，特别是从属关系理论的命运。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是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理论，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只是其中一种。由于当时拉丁美洲正在寻求一种相对独立的政策，这种附属 - 独立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它提供了在那个时期对现实恰当的解释。这些观点在联合国组织地区性的看法、政治领导人的讲话、各种不同导向的社会组织的宣言以及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科学分析中都能看到。

全球化的飓风和附属 - 独立观点并不协调。在拉丁美洲，它通过向世界市场的逻辑屈服来替代独立发展：通过附属进行发展。国际压力、专政所追求的国家恐怖主义、对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控制——无论是通过警察行

为还是通过改变这个大洲研究活动所依靠的基金会的政策——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把从属观点从公共领域排挤了出去。由于依靠世界市场逻辑的资本变得流行，对这种支配进行解释的理论开始广泛被接受，这种理论通常在今天被概括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在效率和竞争的名义下，他们使得对属地的征服合法化。

对从属观点在公共舆论范围内的镇压绝不证明从属关系理论已经被驳倒或者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相反，从属关系理论已经增长到了不被允许公开讨论的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的从属关系理论更表明了，在现有的从属关系里，依然有非从属的思想和行为。从70年代以后，这些从属关系观点遭到压制，因为从属关系已经变得很权威，对它的任何批评不再能够被接受。

从属关系理论并不是简单地消失了，而是被边缘化，并被排挤出公共舆论之外。只要世界市场逻辑和现在的全球化过程仍然在没有有效的抵抗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它就不会带着像60年代的那种重要性回来。因为相同的原因，新自由主义理论将保持着它的支配地位，不管它有多少的错误。实际上，它们在今天的用处不大。

就像熊彼特（Schumpeter）所阐述的效用论那样，

这些理论被一种减少边际效用的趋势所控制。它们越多，其用处就越少。它们今天效用理论大部分仅限于帮助其他的作者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范围。

同时，从属关系理论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不仅在拉丁美洲，也在西欧和美国，而且事实上是在全世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在全球化及其意识形态合理化过程中的某种合法化危机。这场飓风给人类和自然所造成的破坏变得越来越明显。于是约束和限制舆论就不再那么容易。

在拉丁美洲，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对 70 年代以后的从属关系理论和发展新的讨论。这场讨论当然包括它的弱点和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用公式表示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从属关系理论和处于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和新自由理论有明显的区别。这些理论能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支撑着自己，而不用担心和现实相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它们所相信的那样是绝对真理的载体。这展示了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简单重复的基础上的。根据新古典理论，市场价格如果是在一个竞争市场上形成的话，那么这个价格就是合理的价格；并且如果价格都是市场价格，那么一个竞争市场就会出现。只要涉及到工资，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份工资是从一个竞争的

市场上产生的，那就是合理的工资。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论，不会受任何批评所影响。相反，从属关系理论必须经常有所发展，因为它表示的是现实，而不是语言的重复。在这个理论上，一份工资是否合理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在竞争市场上形成的，而是因为这份工资是否能够让人们活下去。这就终止了语言的重复，用现实说话也就变得非常必要。

从70年代到现在，从属关系理论必要的发展也已经发生。现在，有一种越来越强的意识，就是这些发展必须在一种理论性的框架内成为一个整体。这实际上就是现在讨论的目标。下面的一些问题应该被包括在内：

1. 作为增长政策的发展政策；
2. 世界新的两极化；
3. 和一般发展政策有关的问题。

作为增长政策的发展政策

在20世纪60年代的从属关系理论共享了这种占有支配地位的看法，经济增长率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带领着整个社会的火车头，它自动把社会带到充分就业和能够保护整个劳动力社会整合的社会产品上。当时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结如下：今天的储蓄就是明天的投资，也是后天的工作。这样，经济政策就变成了一种经济增长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产品能够通过适当的社会政策措施来服务于把整个人口整合到社会生活中。

直到 70 年代，这还在结果上符合西欧的经验，一般而言，也符合拉丁美洲在 50 和 60 年代发展政策的经验。拉丁美洲也发现这种正面的增长率只能在适当的增长政策下，并且在依靠进口代替品工业化战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一种怀疑这种经验的现象变得很明显。在那段时间里，工业生产以很高的速率增长，但是在工业领域就业的人数却停滞不前。在拉丁美洲，人们开始谈论“动态停滞”这一话题（见欣克拉麦特 1983：138）。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事业增长。拉丁美洲的人们在那个时候谈论由进口代替品带来的工业化危机。马克思主义从属关系理论代表看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种生产关系可能再一次把高经济增长率和充分就业联系在一起，并同时使用剩余产品来弥补所有社会整合所带来的花费。但是资产阶级干预所造成的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福利国

家，无论如何，也是明显的事实。

那种认为增长率可以是充分就业的火车头的想法现在已经衰退，这不光发生在拉丁美洲。失业率增长已经是增长的主导性形式，特别是在中心的发达国家里。美国的“灵活”模式看起来是这条规律的一个例外。因此，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了。但这些就业机会大多数都是报酬很低、不安全或临时性的工作。接受这种工作的人被迫要做好几份这样的工作来养家糊口，或者他们变成了“工作的穷人”。增长率作为解决问题处方的神话继续被全球化政策的拥护者们大肆宣传，虽然宣传的方法让人很难相信是真实的。类似的观点仍然在社会民主和贸易联盟界出现，他们主张以通过公共开支来促进全球需求，从而改变这种情况。即使这种措施有可能会成功，但我们怀疑他们能否像 50 年代和 60 年代那样解决问题。

很明显，现在中心的发达国家（第一世界）经济政策不能够自主决定增长率或者以广义增长的形式提高增长率。提到广义增长，我们指的是能够导致就业增加的增长形式，而狭义增长只是增加现有工人的生产力，而不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狭义增长是无就业增长或临时工增长，而广义增长则把新的可靠

的工人增加到生产过程中去。处在中心的国家特别依靠广义增长，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已经达到了现有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只有通过开发新技术的可能来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忽略基础投资，那么新的投资只能实现潜在的增长率，而这种潜在的增长率是由新技术发展决定的。因为这个原因，生产资本投资只能在改变利率的情况下在一定限度内受到影响（欣克拉麦特 1969）。如果广义增长不可能发生，那么可利用的资本就不能被应用到生产的范围里：它会寻找新的投资可能，比如说用投机的方式。

我们的主题是，正是整体市场政策本身让广义增长变得不可能。消除“市场扭曲”以及对市场的所有政治干预都意味着阻碍生产领域投资的可能性。其结果就是，正在寻找投资机遇的资本必须首先进入非生产范围，特别是服务业，转变成国债以及金融投机。所以，这种导向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非生产投资对于生产投资的巨大利益，而在于一个更加广泛的整体市场政策阻碍了在生产领域的投资，即使这种领域有很高的利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动态停滞不仅是生产领域就业的停滞，还包括生产投资的动态停滞。

世界新的两极化

60年代的从属理论是从第一世界（中心）和第三世界（外围）两极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这种观点，第一世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从更大程度上讲，已经解决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世界。它看起来像已经成为“长着人脸的资本主义”。而第三世界看起来像正面对着成为第一世界那样的任务。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有着分等级的，也是分地域的两极化。通过了解第一世界——对于有的情况，还要了解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就能学会如何发展自己。

这种高度简化了的两极分化当然不能够用来描述当今世界。回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第一世界里谈论第三世界，在第三世界里谈论第一世界。纯粹意义上的两极已经模糊了。但是简单的两极化越是失去其合法性，第一世界也就越是失去其榜样的特点。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不再费心来展现其“有着人脸”。实际上，它已经不具有“人脸”了。在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以后，它也不需要这种“人脸”了，节省了综合成本。人们推倒了墙，只是为了建造一面新墙。

所以今天，第一世界是地球上到处可见的大海里的群岛，他们周围的区域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上都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尽管这些群岛主要是位于北半球，这种关系已经不再能够被理解成为南北关系。这种关系被指定为排除关系。

当然，我们还有“中心”，尽管这种“中心”是以群岛的形式出现的；而且我们还有“周边”，尽管这种“周边”是以群岛里各个岛屿周围海水的形式出现的。虽然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包括所有的这两种形式，这种中心已经具有了被包围土地的特点。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已经出现，而且还预示着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并对它有所需求。这种全球化的基础是资本和货物的自由运动以及在资本和货物的自由运动中国家干预的缺失；但是，人却不能够类似地自由移民。这不是以任何方式暗示国家的缺失。没有国家持续的、决定性的动作，全球化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国家现在主要以全球化支持者的形式来让资本和货物流动更加便利，并用超过福利国家里任何补贴规模的大量的补贴来促进这种流动。它正在变成一种“国家竞争”（见赫希 1995），成了整体市场的政治代表。竞争被视作全球化真正的马达，在竞争中获得胜利是效率的标准。

对于资本的生产投资，也有了结果。通过“生产资本”我们了解了在工业、农业以及在原材料生产中投资的资本，并产生了生产能力（这里不包括在基础设施里的投资，这些都是由其他规则控制的）。现在发生的是，把生产资本投资进入广义增长恰恰被全球化过程所阻碍。群岛中被包围的土地继续以一种非常动态的方法，以技术进步所能允许的速度在发展。这些被包围土地的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是和这些增长率相应的资本投资。但是这种狭义增长主要是生产力的增长。广义增长，超越这些被包围土地的增长，只是在有限的案例中出现。所以被包围土地和整个群岛向动态停滞方向发展的趋势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具有货物和资本自由移动特点的全球化阻碍了这些群岛广义增长的可能性。要让这些事情发生，新的生产投资必须在一开始就具有竞争性。由于没有保护和宣传，他们就很少具有竞争性，所以就没有这些投资。这些被包围土地保留了它们的内部的动态，但不能扩展这种动态。所以，这也解释了向动态停滞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有跨国公司操作的全球性劳动分工需要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在另一方面，对这个条件的强迫接受也阻碍了生产资本广义增长的可能性。

在这种环境下，竞争优势理论已经变成全球化意识

形态最突出的特点。这个理论主张自由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这种商务的国家都获利。比较不理想的情况是有的国家没有优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也排除了这个国家在接受自由贸易以后可能失败的可能。根据这种理论，买便宜货永远不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这个理论并没有预见到向停滞的转变以及后来向动态紧缩方向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破坏了多于通过讨价还价所得到好处的收入。很多东西可以很便宜地买到，但是这种购买方式破坏了能够创造更大收益的国内生产。当这种生产被破坏，而且没有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来及时代替的话，这些收入也是一种损失，没有任何相等或更大的补偿。对很多国家来说，买便宜的东西是最昂贵的一种购买方式。创造这种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家从来没有把这些成本考虑在内。他们公然违抗人们每天的生活经验，他们不加区别地谈论自由贸易的优势，而从不谈论自由贸易带来到损失。

这完全改变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投资的特点。比起可用来投资生产的资本来说，资本还是要多得多。更高比例的资本应该被投入到非生产领域。由于这些资本必须要创造至少和生产资本相同的成果——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必须增加——对有利可图的投资可能性的探索开

始于非生产领域。这些情况特别作为社会部门私有化的结果出现，这些社会部门直到今天仍然在收益标准范围以外发展。他们会转变成为非生产资本领域。这包括各种变化形式的国家行为。寻找投资机会的资本需要国家职能的私有化来寻找投资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迫使以前所有的国家功能实行非国有化，并把它们变成资本投资的领域。

资本现在吞噬着人类：它变成了食人者。所有的人类活动现在必须成为资本，并带有利润，以便让寻找投资的资本有机会生存下去，比如学校、幼儿园、大学、医疗系统、能源设施、公路、铁路、邮局、电信以及其他的各种通讯工具等等。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梦想走得更远。甚至连警察和立法机构也想变成资本投资的地方。只要一个人用利益的形式向资本交付了其要求的费用，他就能够获得生活和参加任何社会领域活动的执照。资本变成了“超级世界”，必须给他们进贡。

同时，全球化战略增加了迫切要求有利可图投资的可能性的资本的数量。工资竞争把工资水平压得越低，它所造成的收入集中就越严重。而比起低收入者，高收入者有更大的存款倾向。新形成的资本，向收入集中是增加了新的压力，于是进一步扩大了寻求投资的资本和

寻找新的非生产投资领域的可能性。寻找出路只能恶化这些问题，并最终导致群岛中心的减少。其结果是一种动态紧缩，这是，也仅仅是动态停滞的结果。我们已经从 1/3 的社会缩小到 1/5 社会，尽管这种增长率仍然是积极的，并有可能保持下去。

新的中心也在发展，我们看到像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印度以及其他的一些东亚国家的一些地区。但是，这些新中心的崛起都没有承受全球化之痛，相反，他们正是利用了全球化才崛起。这些国家是通过国家和商业部门相联系，目标是促进国家企业，并使得它们能够通过出口渗透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以便于让它们成长成为跨国公司。基于这些企业的经济计划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国家计划，并通过国家政策来促进它们，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公司就能够扩大。促进发展的经典式方法——特别是关税保护、进口限制和系统性的货币贬值，以及在生产关键领域对外国资本投资的限制——被采用。另外，这些国家企业只接受国家补贴和低工资政策的促进，这种补贴和低工资政策通常以系统的国家教育和医疗系统发展为补充。

这种政策很明显在我们所提到的国家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随着 1997 年的经济危机，这种政策在多数的

国家里已经结束。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却是一个例外。现在，随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龙可能被迫放弃保卫它经济的保护措施，并在和亚洲四小龙一样的危机中结束这种政策。

在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执行过类似的政策。拉丁美洲——用安德烈·弗兰克的话来说——是一个落魄资产阶级的大洲。追求成功以及动态出口政策的智利从来不把它的资本投到相关的工业发展中去。它的出口是传统的类型——农业和矿产品——没有更大的工业出口能力。墨西哥通过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方式没有使用这种政策最重要的手段。巴西没有能力执行这种政策，尽管在发展进口替代期间创建了比较大的工业，因为它最重要的生产分支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的手里，不可能被用来执行这种政策。特别是自从 1965 年以来的军事专政执行的是有利于这种公司的系统性政策。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通过保护资本自由移动和禁止外国资本投资到汽车生产领域，以及国家对国家企业适当的系统的促进，韩国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跨国公司现代汽车。如果它允许外国资本投资，韩国可能已经有了福特、大众或者尼桑汽车的分公司；这样，我们最多只能从书本或者报纸上

知道韩国的汽车工业了。世界市场也许没有相关性。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如果不是它排除了发展中的外国资本，它将永远发展不起来。它不可能拥有尼桑或者丰田，只会有大众或者福特公司的子公司；当时大众或福特可能永远不会在世界市场上给尼桑或丰田一席之地。那样的话，日本就可能成为像墨西哥或巴西一样的国家。当20世纪80年代尼桑的总裁在墨西哥一家公司开业讲话的时候，他赞扬了外国资本对墨西哥的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所没有说的是，如果日本也执行像墨西哥一样的发展政策，尼桑根本不会出现。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政策也不能作为一种一般性发展的模式来使用。为了能够利用全球化，它已经预见到了全球化。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有许多国家，实际上是整个大洲的国家，只是屈从于全球化。那些亚洲国家非常赞同全球化，但是，为了能够利用全球化，它们把自己全球化除外。就像在电影院里一样：如果一个人站起来，他就比其他人看得更好。如果更多的人站起来，他们也能够看得更好。但是要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每个人都看得更糟。

那么，我们正在面对的这种发展政策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或还不能追求这种政策的基础上的。

采取这种政策的国家肯定要受到其他的也采取这种政策的国家的反对。就像毒品贩子，他们就反对把毒品交易合法化，因为他们的暴利就是依靠毒品交易的非法性赚取的。

只要这些亚洲国家利用全球化，但继续实施保护主义措施而不愿意全球化他们自己的话，他们就赢定了。随着他们被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化当中，他们就会遇到麻烦。

和一般性发展政策相关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的从属关系理论有一个更深的局限性。这个理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完全忽略了环境问题以及从破坏环境的威胁中产生的增长限制。特别是在当时伊万·伊里奇对库埃纳瓦卡（墨西哥）所做的分析。他的观点也渗透到从属关系理论中去了，后来用更加系统的形式进行了阐述。

从属关系理论考虑到了动态停滞，这种动态停滞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我们今天称之为无就业增长。由于直到现在关于环境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从属关系理论认为一般性经济增长中

的解决方案超越了这种动态停滞所设定的界限。增长仍然被看作是保证人们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融合的一种方法，尽管这种理论承认克服资本主义对增长的限制的需要，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从属关系理论和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理论一起占据增长政治学的中心位置。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正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破坏这一问题，一种以增长为起点的批评开始在从属关系理论中发展起来。这种批评并不导致同样的对增长的谴责，但是它确实让人们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最大价值以及经济增长并不能被看成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引擎。很自然，这和全球化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全球化史无前例地宣扬经济增长，宣扬效率和竞争，把经济增长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好像是人们越来越强烈的环境被破坏的意识增加了全球化代表事物继续其破坏性的意愿。

拉丁美洲的全球化只是强调其动态停滞。无就业增长被更少工人的经济发展所替代——动态紧缩。但是，多余的工人也要生存，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正式的领域，而且在今天，这种非正式的领域已经扩展到劳动力的 1/3，而且经常能达到一半。这些“非正式”的

工人是在依靠不稳定的生计和“灵活的”就业的帮助下得以糊口。这个领域也会破坏环境。

只有一部分人仍然相信，通过建立在增长基础上的全球化能够克服这种被排斥的情况。在全球化战略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随意提高，但它对改变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在外的情况却无能为力。它增长的速度越高，它破坏人类自然环境的程度就越深。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产权积累模式中，对人口的排斥和环境的退化是一对孪生姐妹。

于是，今天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对解决方案的讨论，特别是以下面这两个问题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的讨论：对人口的排斥和环境的退化。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提议不能帮上太多的忙，因为他们——和今天的全球化战略完全一样——是建立在增长作为进步引擎的基础上的。今天，暂且不谈环境退化问题，这种政策即使在群岛的中心也不再能够导致克服对人口的排斥这一问题。

如果对人口的排斥被证明是在任何增长政策中都不可避免，那么人们必须要怀疑经济增长本身。

从动态停滞的观点来看，不可能继续把竞争性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标准。竞争意味着一方胜利而另一方失败，这就相当于宣判了失败者死刑。由市场来决定并对

失败者执行死刑。竞争是一种战争，它不仅仅是在市场上玩的一种游戏。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场战争，其结果和真正意义上军事战争的结果是一样的。一般性的发展是可能的，但只能通过对市场的继续干预，以便于竞争中的失败者不被宣判致死。

竞争中的失败者有权利保护自己。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这样做也具有经济合理性。如果这些被竞争抹杀，他们所失去的要比他们从竞争的正面效果中肯定得到的要多得多。最终结果是，他们没有必要毫无反对意见地接受市场的宣判。没有竞争的生产部门也是合理的，如果竞争的优势——即购买便宜货——被损失所抵消或超越：消除无竞争力生产部门中所产生的收入损失。

首先我们看到国家必须干预的两个领域：

- 它必须保护无竞争力的单一物品生产；
- 它必须保护非生产资本产权的出现。

对于第一点，关于保护无竞争力产品的争论和著名的普鲁士的经济改革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保护性关税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在工业向竞争力发展的转型期内必须有关税保护。我们认为应该有长期的保护，而且是直接从动态停滞的基础上起源。

对经济增长及其竞争性的中心标准的疑问在涉及一

种经济的非正式领域时是很必要的。这些领域必须发展一种经济形式，以便让他们从不稳定的生存战略中解放出来。他们不再把目标定在与资本积累部分相互融合，而是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自己。^①

地区性和全球性分工系统必须遵循，并能够保护他们避免屈从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分工的专制。他们相关的内部组织可以用正被塑造成单一货物生产来描述。这可能是当今惟一现实的可能让被排斥到社会之外的人重新获得安定的生活。

但是这预示着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保护主义不同。它必须发生在社会之内，而不是简单地发生在它的政治范围内。它必须允许当地和地区性的劳动力分工制度，这种分工和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相分离。这可以有許多不同形式：从对传统生产形式的保护（比如对当地人居住的拉丁美洲依然存在的单一产品生产的保护）到城郊单一产品生产形式的重建，因为，这里所有经济关系都已崩溃，人们只是通过零散务工糊口。如果我们想维持一般性的发展政策，这种解决

^① 这个问题在欧洲引起了越来越广泛地讨论。见杜思韦特 1996；朗和希恩斯 1993。

方案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光有这些还完全不够。

对于第二点，以资本主义产权积累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本身必须被重建。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减少寻找投资机会的大量的资本。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世界”并扼杀破坏了现实的世界。从拉丁美洲国家整体的预算来看，利息支付是支出项目最主要的一部分，至少占公共支出的 1/3。资本必须被限制在它的生产性投资的功能上，这种功能必须同时和单一货物生产部分的存在情况相一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士·托宾所建议的旨在限制投机性资本范围的税收只能是一个开始。阻止这种形式的资本很有必要，这也需要今天采取非常紧迫的两项措施：

- 向依靠低收入生活的人重新分配收入和产权是限制那些不可能找到生产性投资而不得不寻找非生产性，通常是纯投机性投资可能的资金的出现。这种方法很有效，因为比起高收入的人来说，低收入的人形成资本的倾向比较小。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这里有世界上最极端的收入和产权集中。所以，产权为民，不为利。

-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货币资本来源，它更多地被用作投机目的：大投机货币基金的形成，特别是通过私

人保险系统，尤其是人寿保险系统形成的基金。在1992年，美国所有跨国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资本都控制在这种基金的手里（德鲁克1993：88）。一个人可以通过加强老年养老金保险的公共制度来影响这种形式的发展。这些都是基于直接支付的原则上，以便于在每个时期，保险费必须和应付的保险支付相等。所支付的费用没有引起投机性的资本基金，而是直接变成了那个时段的养老金支付。但是私人保险制度就不同，他们所征收的保险费被积累成资本，而负债是用资本利润支付的。这些大量的“漂流”资本基金的发展恰恰超出了人寿保险的范围，它们通过投机资本把整个世界看成他们的活动场所，并把所有的生产——甚至包括跨国公司的生产——变成投资和利用的领域。这意味着时下流行的私有化意识形态必须从根本上值得怀疑。它只是服务于煽动投机资本形成的过程以及加速能够掩埋我们的雪崩的形成过程。在这方面，许多工业国家的养老金改革都恰恰走错了方向。它们倾向于把部分公共养老金的规定改变成基于私人资本利润的制度。另外——就像在第一届“红-绿”政府的德国那样——他们打破了最基本的、来之不易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雇主——也就是资本拥有者——必须支付老年养老金保险相等的一半。

这些绝不是亟待解决的所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今天类似于从属关系理论，在拉丁美洲的这些领域里被广泛讨论。从这些讨论中，产生了一种双战略：对当地和地区经济可持续改革所作的发展和保护，并结合用来阻止、规范纯粹向资本积累方向发展的全球化的宏观经济公共干预。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试图阐述一种新的产权秩序来在这方面加深讨论，并通过这种方式把这种双战略作为一个坚实的、广泛的基础。

第七章 另一种可能的世界

——从生命和公共利益的角度
自下而上地重新建立所有权制度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目标是无国界的资本积累，而这个目标也间接地注定要破坏生命及其配套的制度。为了所有人类的生命和地球，这种死亡逻辑必须被打破。这就需要对实践中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步骤的前景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就要对所有权进行重组，以战胜私有化意识形态。

什么是生命和公共福利？

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所介绍的那样，在货币以及货币价值的驱动下，古希腊风格和罗马产权经济的最

初形式对社会凝聚力以及人的生命和社会都有破坏性的后果。个体小农们通过债务束缚失去了土地和自由，而大的土地所有者就能够在城市里过着越来越豪华的生活。农民之间的团结也渐渐腐蚀。

在古代以色列，这种方式在基督运动和早期的基督社会遭到了最强烈的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回顾这种抵抗运动以及它所代表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然而从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种经济和政治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关于注重实效的细节，它们的根源在于“上帝功能”的基本安排上，并成为一个社会的最终权威（见威坎普 1993：11；理查德等人 1983）。在以色列，是耶和华听到了受尽压迫、穷困潦倒的奴隶们的哭声，并把他们从作为压迫者的富有的奴隶主的手中解放出来。这个耶和华就是生命之神，揭露并挑战了其他一些神，他们把权力和财富合法化，并以偶像的面孔出现，以索取人类的牺牲供品。这就是希伯来人从埃及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和圣经传统有关的最根本的观点（《圣经·旧约》出埃及记：3）。

这个重要观点的第一个参考点是君主体制下的社会金字塔。大约在公元前 1030 年～公元前 586 年，在以色列本身也可能建立一种君主政体，尽管也受到批评并

加以改进。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公元前 8 世纪后半叶往后，就有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以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的因素渗透进来。先知们已经开始批评这种君主、贵族体制的不公平，他们和农民们团结在一起，立刻表达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批评的中心是：所有人都必须能够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开始与穷人和生计受到威胁的人而哭泣。^①

从方法学的观点来说，我们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第一次遇到了通向知识、伦理道德和已经是我们今天的一种选择的实践行动的渠道。在每一种烙以王室结构和产权—货币机制雏形特点的历史情况的起点，都是一段在特定制度下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经历。占据统治地位的胜利者把这种制度描述成为必需的、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而且是通过神权执行的。圣经从根本上和失败者站在一起，这些失败者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而他们也必须能够活下去。对现存制度的分析开始于对其消极面的一种批评性分析。同时，公共福利的看法从根本上是开始于社会上最弱势、生存最受威胁的成员。如果他们能够生存，所有的人就都能够生存。最后也会有一个从压迫中

^① 关于生命在经济问题中作为最终神学参考点，见杜赫罗 1987。

得到的解放，与所有人有关，所有人都有生存的条件。公平和生存是最基本的观点，也是圣经传统的一条金线。在“中立”学识的道路上，对于知识、伦理道德和行为来说，却没有中立的位置。在各种情况下，人们都会面对各种决定，要么接受现状，要么站在批评性、建设性解放的位置。这就需要检查什么对所有人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福利是一致的（用圣经的话来说，上帝的意志——罗马书 12：1）。

正是使用了这种方式，自由意识形态的支持者提出了不同学科间的交流，比如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在资本主义历史的背景下以及着眼于这个星球未来的生命，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①起点是对证明、促进以及保护市场权力和当今新自由主义终极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批评。然而，首先，这是一种认识论。就像我们在前一章里所论述的那样，对中立的设想也导致了完全根据经验科学的可笑结论；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合

①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特别推荐下面的参考：欣克拉麦特 1986；阿斯曼和欣克拉麦特 1992；欣克拉麦特 1994；欣克拉麦特 1996；欣克拉麦特（修订）1999a；欣克拉麦特 1999b；欣克拉麦特 2001；欣克拉麦特和莫拉 2001；杜赫罗 1987；杜赫罗 1995；杜赫罗和利特克 1989；鲍夫 1998；杜塞尔 1998；杜塞尔 2001；古铁雷斯 1998；古铁雷斯，2001；达尔克森 1998；达尔克森 2000；塔梅斯 1998。

理中的不合理（见阿斯曼和欣克拉麦特 1992：90；欣克拉麦特 1996：12）。

关于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所有的合理动作都被缩减成为手段－结果的合理性。如果这个目标有收益性，比如说，为个人利益而使用资本资产的最大利益，那么它将认为惟一合理的就是利用最有效率的手段来达到这种结果。例如一个人可能需要雇佣尽可能少的工人，用尽可能少的工资，利用尽可能差的，或尽可能便宜的工作条件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保护环境的成本需要避免，税收尽量降低，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根本不用缴纳税收。通过竞争，在手段－结果合理性的市场活动将变得越来越有效。

就像在第二章里所阐明的那样，亚当·斯密主张由于个人私利而进行的有效活动（故意），以及这种手段－结果的合理性，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非故意，间接）来协调的。卡尔·马克思使用了这个理论，并批判性地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话。在巴黎的原稿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合理性的间接结果会导致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死亡，根本不会导致所有人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并不调整劳动力分工，让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具体见欣克拉麦特和莫拉 2001）。

作为他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结果，按照全球资本主义的角度看，他写下了可以被称为预言性的一句话：“技术和由它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过程的结合意味着孳生资源——土地和劳动力，一切财富都源于它——的同时耗尽枯竭”（见马克思 1887：442；欣克拉麦特 1999：55）。这种合理中的不合理性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人用他的合理性把他的锯子磨锋利，并用锯把他正坐在其上的树枝锯掉（见欣克拉麦特 1996：17）。他跌落到地上摔死了，他所有的结果和手段以及他所有的合理性都和他一起死掉了。他接下去说所有工具的、结果 - 手段的合理性的情况必须是生活生产的合理性，生命的合理性。

全球产权市场经济的真实性明白地展示了毁坏与自我毁坏工具的逻辑。宣称有意图的、自私自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的间接结果是由市场为公共福利考虑而进行调节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被事实加以证明。^① 很自然，我们现在有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的资本主义（见欣克拉麦特 2001：321）。但是这只是确认了真实的、无管

① 大卫·简金斯（前达拉谟主教）已经在一份深入分析中分析了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主张并得出了该死的结论，认为从有些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必须设想那些进一步辩护这些主张的人是故意在撒谎：简金斯 2000。

制的、帝国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谋杀性和自杀性逻辑。

值得这种称号的任何理由于是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经济结构、制度和行为必须按照所有人生存的逻辑重新建立。

一种道德上的立场导出了相同的结论。在曼德维尔之后，亚当·斯密已经从道德规范发展到了他的经济理论（见古铁雷斯 1998：31）。他相信“看不见的手”为了公共福利调节非理性的行为，他把道德规范降低到市场行为的功能性道德规范。后来，马克斯·韦伯在这矛盾的基础上，引起了至今在意识形态上和事实上流行的术语的混淆。他声称，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是“非道德的”；它和道德毫无关系，因为它遵循能导致“无主奴隶”的市场竞争规律（见杜赫罗 1995：112）。相反，道德规范或许是“信念道德”，他在这里指的是圣经里“像兄弟一样的道德”，以登山宝训为最高形式，在他的眼里只对私人领域实用；或许也是“责任道德”，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更清楚地进行阐述。一方面，它只是遵循市场规律，于是和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功能性道德是一样的（比如哈耶克；见欣克拉麦特 1994：62；古铁雷斯 1998：129）。于是韦伯把市场行为指定为“非道德”，即没有任何道德，是一种误导。他认为，任

何遵循市场规律的人都在按照责任道德来行动。这给了这样做的人以良心上的安慰。他们代表了“现实主义”，而所有对市场持批评态度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或“空想社会主义者”。波珀以他著名的名言把这种区别带到了极端。他的名言是，地球上所有为天堂而努力的人都会产生地狱。“理想主义者”在理论上的不合格和歧视会产生危险的后果。在“国家安全”制度上，他们和“共产主义分子”，以及最近的“恐怖分子”是相等的，并被消灭，就像在 1987 年美国军事秘密文件中所显示的那样（见欣克拉麦特 1994：172；杜赫罗等人，1990）。

在另一方面，韦伯按照那些不能理性地理解的与价值判断相关的决定来解释“责任道德”。首先，这种道德在政治行动中有它的空间。它不能被用在科学或经济学的“客观”领域，这个领域的所有判断都必须是客观的。应用到市场的破坏与自我破坏逻辑中，并得到全球帝国主义的支持，韦伯的责任道德因此意味着把制度化的无责任变成合法——有着双重含义。围着资本积累转的市场的间接结果并不在功能性道德的责任之内，而且市场的政治和法律条件的组织并非理智。于是它们就受纯粹权力的支配。在当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

下，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些：破坏和自我破坏。

这些对合理性批评性的分析认为，对制度功能进行正式限制的道德规范，以及把所有更深层次的伦理道德上的挑战宣布为个人或非理智的政治价值判断，会导致人们和地球的无责任和死亡。

这导致了道德规范的必需性，以事实为基础的客观判断，以及人们的行为必须优先考虑那些能够给所有人的生命和我们的地球创造条件的行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寻求个人结果的个人手段才能得到判断并付诸实施。用以前的说法，这种生命的道德被称作公共福利道德（欣克拉麦特 2001：375）。

墨西哥哲学教授恩瑞克·杜塞尔（1998）大概描述了这样的一种生命和公共利益的道德。他的论述从批评现代西方道德体系开始，现代西方道德体系把自己禁锢在传统道德的范围内，并从这种体系的受害者（人和地球）的观点开始，呼吁道德应该扎根于生命的物质性问题上。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谈论中的道德提出来的关于道德的交流结构的问题才能够盛行起来，而且，还要所有被排除在各自社会体制之外的人能够参加这种交流的过程。这种道德规范对生命如此大的重要性展示了它在生命道德的真实定义中和它的综合性、参与性特点上所

表现出来的解放的特点——特别是反对现行制度及其合法化。它指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社会是由土著的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的工作类推出来的（欣克拉麦特 1999：170）。

然而，光有对生命道德和通过参与而得到的公共利益的必需性进行承认以及对现状及其合法性的批评性阐述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另一选择的可行性。^① 在现状的实现和毫无约束可能性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真正可能的选择。“有一种知识理论，知识和能够被技术性生产出来的东西相互联系在一起，比如能够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如果有人需要给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制造出来的东西之间不同可能性的选择做出一个标准的话，那么，那些必须用来作为所有其他可能性的条件的标准将会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标准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主体是一种有需求的活的主体……人类基本需求是绝对的标准”（欣克拉麦特引用杜塞尔 1994：319）。只有和事实可能的选择一起，解放运动道德才能有效地抵御不能够支撑所有人类生命和地球的资本主义工程。在解放运动道德在经济、

^① 欣克拉麦特 1994，由杜塞尔做系统性结尾：309（西班牙语 1998：258）。又见皮希特 1996。

法律和政治的层面执行的时候，这就变得更加明显了，这也是杜塞尔最新著作中的一个主题。^①

这恰恰也是手段 - 结果关系这一问题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但只有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为所有人的生命和参与服务？回答不能直接源自权利、制度、政治秩序和战略，以便能够表达出它们的绝对性或者不容许其他选择，就像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一样。人们也不能够把自己限定在好的意图中，并选择忽视其非故意、间接的效果。

关于其他制度选择和行动的每一种实用的建议，都要通过它是否是事实上对真实生命有用，以及在创始过程中是否有人被排除在外或者不能从结果中受益来进行检验和判断。

这对产权的基本制度也适用。在此，没有对某种特定形式产权推理性指定的、绝对的优先权。没有管理（资本主义）私人产权的自然法律，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也不能成为惟一的选择。恰恰是这种错误的、绝对化的选择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入了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境地，又进一步把它推进了深渊。于是下面所建议的任何一种选择，都要

① 杜塞尔 2001: 24。又见杜塞尔 1998: 87。

经过所有人生命和参与必要的标准的严格检验，也要经过可行性的检验。所有历史、文化、技术、政治、法律和经济因素都需要考虑。其结果必须可以修订。我们并不是将市场基督教运动替换成为其他形式的基督教运动。我们的目标是真实生命的饱满性和多样性。

所有制体制如何自下而上地建立？

历史上的例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所有制体制？为了能够更加接近于这个当代的问题，回忆一些历史上的例子是很有帮助的。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在圣经传统中没有宣扬任何绝对的模式。相反，它是从能够听见人们哭泣的，并因此维持了所有人生命的上帝的基本看法入手，发展了新的实用的形式。在《立约书卷》（公元前 722 年之后）对利息的禁令中，重点是通过债务的产权机制防止对生命的威胁。“申命记”（622）增加了定期取消债务和债务的束缚，如果它们是通过所有权机制产生的。在牧师的一些著作中（公元前 6 世纪）产权最终被剥夺了绝对性，因为这个地球和人们都“属于”上帝，所以人们只是有对地球的使用权——其结果是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获得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根据古希腊

和罗马帝国带来的以产权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化，忠实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只能选择抵抗。他们在上帝和财神之间进行选择，并在较小的，更有吸引力的圈子里建立新的选择，这个圈子里人们共享他们的产权，以便在他们中间没有穷人。

另一个例子是由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供的。在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风格的产权 - 货币经济经验的基础上，他非常有才气地预料到了后来的发展，分析了这种体制的结果，并提出了实证选择的建议。当驱动经济活动的不再是生产和消费货物的有用性，而是它们的交换价值和通过货币机制进行无限制地积累的时候，拥有产权的个人就陷入了无限生命的幻想中，而且社区也受到了破坏。于是他从这个原则上得到了关于产权有意思的、与众不同的结论：产权是为了实际使用（亚里士多德 1961：1254a，1 - 5）。

亚里士多德所作的阐述的背景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家庭作为希腊的基本经济单位。于是，有用的产权同样涉及个人产权，也涉及保证基本满足需要的生产产权，比如食品和衣服。在这种背景下，他也允许以货币为中介物的交换，只要它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有用的货物的有效性。他也了解城邦的公共利益和私人产权的使

用以及对穷人的关注。“这些事可以被视作组成真实财富的对象；这些用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家庭产权并非毫无限制……财富可以被定义为一定数量的由家庭或国家使用的工具”（亚里士多德：1256b，25 - 40）。昆兹利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的被允许获得的产权如下：“只要，而且只能是，获得物产生个人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工具和供应，并在服务于生计和在一个有尊严、有道德的生命上调整自己向人们的基本需要方面发展，它能够自然而然而且积极地被评估”（昆兹利 1986：103）。

因此亚里士多德很明确地按照社会上的人们和个人的生活仿制了经济，尤其是所有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强烈反对货物和货币因其本身原因而被获得：“但是在获得产权的总体艺术上还有第二种形式，它特别被称为，也只能被称为，获得的艺术。正是这第二种形式的特点导致了财富和产权没有尽头的观点……这第二种形式并不是天生的”（亚里士多德 1961：1256b，40，1257a，5）。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获得垄断的贸易和交换利益是因为产权自身的原因而进行无休止的产权积累的两条不合法的道路（见杜赫罗 1995：21）。它们不仅在理论上被抵制，还因为这个社会上的生命而应该受到政治上的压制，因为通过腐败，这种财富的额外

形式是所有政治秩序的毁灭。当然如果居民们也没有通过道德教育被说服相信在社会上中庸的生活方式扩大了他们的自我保护，那么一种纯粹的法律或政治解决方法是不够的。从这种程度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论述是他关于经济和政治学论述必要的一部分。在现代时期，经济和道德、政治分离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不考虑经济机制间接的结果以及对整个社会行动的方法对他来说也是不可想像的。

圣经和希腊哲学（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还有柏拉图和他呼吁的在卫兵和战士中适用的公共产权）都成为了教父们关于教授私人产权的复杂基础。他们把重点放到了不同的位置——两个极端：一个是激进分子克里斯托莫斯（见索姆潘尼迪斯 1999：189），另一个是亚历山德里亚，他对富人来说相对比较友好。但他们也有一些相同的观点：

1. 产权的积累是贪欲，是主要的罪过：“为什么，请告诉我，你是否每天为了更多的财富而折磨得自己整天卧病不起，并购买土地、房产和浴室，并通过抢劫和贪欲得到它们，并像先知所说的那样：‘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人，’（以赛亚书 5：8）。……“关于贪欲是非常可

怕的，任何有贪欲的人都应该被从教堂里驱逐出去”（克里斯托莫斯，昆兹利引用 1986：141）。

2. 单独享受物品则意味着失去物品，损害了整个社会和他自己。在此关键的是利益。由于所有的物品都属于上帝，我们只是现存物品的受益人。从严格排他的法律意识上说，是没有私人产权的，如果不能被废止，这种权利应该受到由这一标准义务所限制：“任何事物都属于上帝……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利用它，我们将会受到怎样的责问呢？因为它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上帝，我们有义务和其他人共享”（同上：147）。

3. 换句话说，假若私人产权的确要在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存在——在伊甸园，而且在原始的自然规则下所有的食物都是共享的——那么至少对它们的使用是共同的。

这就意味着基督教组织的教父在原则上坚持圣经的方法：无论如何，不是公共产权的东西应该是私人产权，并有相关的权利，以便能够让所有人受益。它绝不能被滥用为私人财产积累。

尽管托马斯·阿奎那被经常滥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合法化，但他知道只有一种使用的自然权利：

阿奎那不对任何具体的产权形式作出结论，而只是为这样做提供一种方法：一种特定的产权可以被认定是合法的，如果它在使用地球上的物品的时候能够保证它们的权利。这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结果。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条件也不同，某种特定的产权形式就会合法，而其他的产权形式就会不再合法。在本质上，阿奎那的方法使得产权制度附属与使用权上，并支持它仅作为那种基本权利的媒介。按照阿奎那的说法，产权制度都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它的合法性是来自其使用权……所以，阿奎那想像一种自然的使用权而不是私人产权。于是他把产权的规格看作在万民法之下，而不是在自然规律之下（欣克拉麦特 1986：161）。

马丁·路德站在早期资本主义的门槛上，激烈地为产权有用的特点辩护，并反对像富格氏这样的大贸易和资本公司（见杜赫罗 1987：59 及 1995：217）。首先他打击复利并严厉批评财富积累为偷窃和邪神崇拜。他号召大国在资本所有者的无国界商业活动中对公共福利进行干预。

后来兴起的加尔文（Calvin）主义给了马克斯·韦伯

以灵感，认为资本主义来自“新教准则”精神，加尔文完全秉承了公共利益这一传统，就像在路德的哲学中一样，这种公共利益最终通过一个人的邻居来决定。在他新教准则（加尔文主义）对产权的研究中，杜曼（1999/2000：18）总结如下：

首先，产权应该被分配给任何能够更好地为公共利益管理产权的人。第二，它不应该被认为有必要把一事物所有的权利，比如管理责任，都指定给一个主人：它们可以被分成不同的部分，并分配给任何能最好地实现首要目标的人。第三，效率并不是惟一的目标：高于一切的优先权是穷人的需要。最后，无论如何，产权的分配实质上是公共政策的问题。

希伯来和基督教圣经、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和新教改革都果断地把焦点集中到产权的使用和对社会的有用性上。然而，圣经启示的方法强调这种制度的受害者是评判公共利益的标准。毕竟，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被满足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条件就被满足了。经常被资本主义诽谤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提到了所有这些观点。马克思被一个犹太人赫斯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也绝

非偶然，并由后者的文章《货币论》中得出了许多的观点，用于他对商品、货物、金钱和资本崇拜的分析中（见泽格伯斯 2001；昆兹利 1986：402）。

在此，我们不能够概述马克思对产权和所有权观点的整个发展（见昆兹利 1986：425）。对于我们的话题，一些基本的评论就已经足够的。还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令人如此信服地对资本主义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含义和结果进行分析和批评。他展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事实，经济服从于资本积累这样一个事实不仅剥削工人，还越来越把他们排除在生活的再生产之外，并同样地破坏了环境。同时，整个社会在法律参与者的引导下，对商品、金钱和资本顶礼膜拜，进而破坏了人类的本性，还通过竞争，破坏他们之间的团结。

就像他所建议的解决方案，他倾向于最终抽象地取消私人产权，这将导致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死胡同（见欣克拉麦特 1994：136）。那种尝试用同样抽象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方案来代替抽象的、还原论者市场体系的错误应该被视为是历史性的失败。但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两个方法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新的选择应该从产品的有用性开始，以及生产者应该成为领导者而不是生产和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客体。所以，这就是要建立制度、政治和行为方

式，其始点是人类的真实生命以及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这恰恰是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们启发而来的规则感，所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人被排除的社会，而排除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普适者的社会原则，不论它关心市场和私人产权还是中央集权计划和公共产权，都应该以对人人有其位社会的需求进行合法性检验。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对全体人类呼吁的相互竞争。于是他们合法性的标准就不是基础的标准。相反，他们详细阐述了一个合法的框架。普适者的社会原则是合法的，或者只要他们和人人有其位的社会相一致就可以宣称合法。当他们执行把社会上的一些成员排除在外的手段的时候，他们就是非法的。当普适主义社会原则被看成是绝对的时候，对社会的一部分进行排除就是自动的。因此，他们只能是具有相对合法性（欣克拉麦特 1999：172）。

“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标准是在 1999 年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和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的原住民族社会宣言，

连同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

拒绝生命专利化！

我们，来自全世界的土著人民，相信，除了自然本身，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自然界所存在的事物。一个人类不能拥有他自己的母亲。人类是自然母亲的一部分，我们什么都没有创造，所以我们决不能对本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主张所有权。但是，西方法定产权政权一次又一次强加给我们，和我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相矛盾。

我们非常遗憾而且焦虑地认为，WTO 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27.3 (b) 条将会多大程度上诋毁和毁坏我们对我们的文化和知识遗产的权利，我们的植物、动物甚至人类遗传资源，并歧视我们的土著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一条规定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体之间人为制造出区别，并为制造植物和动物给“基本生物”和“微生物加工”之家制造区别。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所有这些都是生命形式和生命创造过程，它们是神圣的，而且不应该变成私人拥有的主体。^①

^① 全文请见附录 I。

这些除了传统和现在之外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会如何在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上实现呢？如果决定点是，真实生命以及和自然和谐相处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标准，那么，当地和地区层面必须是至关重要的。所有其他的层面，如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是和前两者相关的；如果国家和全球层面支持人们为使用价值而从事经济生活的层面，前者只是起到让当地和地区层面合法的作用。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这些选择不应该被限定在当地层面。所有层面，包括从当地层面到全球层面，都必须得到承认。问题只存在于：从哪个角度以及为谁人的利益而承认？我们说从当地人们角度出发并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这和时下流行的大规模所有这破坏性地、随意地使用他们全球化的资本在整个世界市场上进行贪得无厌的积累的（混乱的）秩序形成鲜明的对比（见戴利和科布 1996；杜赫罗 1995；科尔顿 1995；杜思韦特 1996；迪芬贝加等人 1997）。在古代，家庭、生产型大家庭是当地商业的基础。今天，最多样的组织形式出现在不同大洲和不同文化的这个层面上。除了传统的大家庭以外，还有村落社区、部落社区、合作社和地区。这种来自当地层面的方法主要的力量之一是产生不同社区文化特征的可能性。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产权，也适用于所有经济因素的所有制形式，比如土地、水、空

气、能源、工作、工业、知识以及货币，就像我们将要论述的那样。

个人产权

个人产权的概念看起来非常清晰简单。但它包含了一个并不简单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人”？在现代西方世界里，我们马上会在脑海里出现的感觉是个体的人。那么个人产权必须放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来定义，并和其他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分开。然而，看起来好像在所有的文化中都会有像个人产权这样的东西出现。关于非洲、亚洲和美洲土著人的文学，里特施蒂克（1975：319）写道：

而且，个人产权不是以个人兼并为导向的市场社会的一个产物。合法的历史和合法的人类学认为，即使在社会发展的初级水平，也有对个人对物体使用的所有权的承认。封建产权在物体的使用上和资本主义产权没有区别，但是在特殊的土地分配，这种在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分配上有所不同。在另一方面，自诩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已

经限制或者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而给个人产权提供了宪法保障。这种个人产权在历史和文化上的普遍存在表明它的分布和人类基本需要相一致。然而，人们对它的依赖性比起衣服和器具来说还是要轻。在所有的文化中，没有即时有用功能的物体也被包括在个人产权的范围内；对于有用的物体，恰恰是超过了有用性的质量让这些物体从本质上成为某人所有。

他所指向的研究表明，被剥夺了个人意愿的囚犯和婴儿承受着强烈的心理混乱。人类不仅仅是血肉之躯，他们还是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就像他们自己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一部分，这种相互联系因此还具有超越它本身现实重要性的审美尺度。

但正是这些基本的观察让人们很难精确地说出个人产权需要理解什么，以及上述现象实际上是否应该包含在产权的范围之内。当有人提出，“人”这个概念不应该单单在周围事物的环境中进行理解，还应该参考他们生活的社会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这种困难程度又上升了。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人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产权将与社会中的产权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这里的

“人”是作为在一种互惠关系中的“共同体的人”来理解的（见戴利和科布 1989：159）。

不必精心的阐述，我们只是说明个人产权是通向尊严和自力更生的人类生命的一个部分。它的定义也决定了它是由个人有用性来决定的，虽然使用价值当然并不意味着“功利主义式的算计”（里特施蒂克 1975：315）。于是，它就不能从交换价值或者资产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必须要强调清楚，因为在黑格尔理想主义哲学的帮助下，与自力更生的个人产权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一般被视作能够把企业主的产权合法化。

更进一步的困难在于对自己的生活尊严有着非常不同的个人产权需求程度不同的个人之中。看见过甘地留下的个人财产的照片——一双凉鞋、一条腰带、眼镜和一支自来水笔——的任何人都不愿意把复杂生活方式中玩世不恭的个人奢侈归到同一个法律类别里。但是，值得保护的产权的范围不应该被缩小。在使用上的奢侈问题的严重程度要小于允许奢侈的财富积累的社会机制。但这也影响了所有制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这里的重点是个人的使用。

这个问题也应该包括人们的房子。这已经存在于更

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人依靠他们的被雇用或者政府帮助来支付他们的租金。然而，在个人房产法律保护方面，房子主人自己居住和商业使用必须要作重要的区分。房子所占用的土地是另一个问题，下面将会论述到。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讨论德国宪法的时候，卡洛·施密德（Carlo Schmid）想让宪法只保护个人产权，而不保护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内的资本主义产权，但没有成功。这种所有制从本质上说，是以大多数人为代价，让一少部分人进行财富积累，而这一切的开端是现代时期开始阶段的土地私有化。

土 地

尽管比起二战以后，现在的权力关系更难贯彻下去，我们也应该重新认识首先在公元前6世纪古代以色列形成的见识。土地是件好东西，它不应该在完全所有权的意义上被拥有，不应该有绝对的私人拥有权；只能有使用权。在此，长期的目标只能是颠倒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句话不仅仅是建立在圣经传统和现在土著社团原则的基础上，它也滋生于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像在公

元前 8 世纪的希腊一样，现代时期开始阶段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采用，是建立在追求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尝试的基础上的，用以反抗对封建统治的依赖。通过以财富积累为目的的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这种方式被颠倒了。这导致了更加强大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以多数市民及其自由为代价的利益获取更加丰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土地的投机。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转变成为新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封建主义。在南半球的一些国家里，传统的封建主义只是转变成了资本封建主义。^①

这样，土著人民和像巴西无土地者的社会运动也为土地根本性改革而斗争。像来自瑞士圣加伦的汉斯·宾

① 有一种很天真或者说很理想化的想法，就是认为第三世界的贫穷可以通过给予贫困者产权来消除（完全所有权，也就是绝对的产权所有），就像德索托（2000）所认为的那样。他推荐模仿前几个世纪在北美洲的殖民者。这个建议忽略了两个基本的论证：一个是历史性论证，另一个是制度性论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美洲的财富创造是建立在在对土地的偷盗和对当地居民的谋杀的基础上的。这种模式不能为世界上占大多数的穷人重复，也不应该重复。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和利息、金钱以及令人窒息的竞争紧密相连的绝对产权所有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增大，对其他人的排斥和环境的恶化。这就是为什么德索托的著作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智慧库中广受欢迎，并被用来广为宣扬，而在穷人中却还无反应。当然，穷人需要靠近并使用对他们有用的产权，而不是产权交换价值的机制。这就意味着把他们引入到了一种贪婪的体制中，这种体制包含（不平等的）财富积累，而且只能共同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选择，分裂他们的抵抗运动，削弱他们寻求变更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

斯万格这位“第一世界”经济学家，号召关于土地所有制宪法性修改（宾斯万格 1987：27，在 58 上进行了总结）。带领着一个研究小组，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修订瑞士联邦宪法的建议来构建一个阶段性、或多或少激进地废除——或至少限制——对土地的完全占有。他们提出以下不同的建议：

1. 把房地产所有权转化成公共产权，由市政或国家管理。

2. 对使用产权和处置产权进行区分，并把后者转交给地方当局或者国家；使用产权应该服从于公共规定。

3. 在城市居民中，产权用这种方法进行分类，处置产权应该转交给新组成的公共业主的协会，或者包括所有居住者或者包括业主，但是要给居住者以说话的权利。

4. 排除建立在产权上的权利。

5. 保留产权的综合概念，但要由国家或当地权力机构限制使用的自由。

6. 维持对所有权的保证，但把处置的自由限制在当地权力机构或国家的范围内。

7. 在市场的指导下，国家税收来自土地的产权的基

本收入。^①

8. 在所有制上采取国家规定，让合法的实体只能成为公共利益的所有者，而且只允许对住房和建筑使用土地限制性的所有——和业主自己的使用有关。

很明显，这些变量显示了依靠政治进行可行性过渡安排是可能的，但绝不会保证为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服务的无限制的土地所有权。从真实生命和与所有当地股东有关的角度来看，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社区性产权。通过这种方式，作为文化传统的一个功能。人们可以决定，他们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想把土地留给他们的家庭作为私人使用，比如说用作耕地或者以他们自己家的方式用作世袭传家，这在德国已有悠久的传统。他们能够决定他们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想由合作社来处理，实际上是他们是否，以及在哪种意义上想让大工业进入他们的地盘（有时候这些是由德国的城市行使的）。在这里，和国家的利益相冲突也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要比用金钱的力量来

① 弗雷德·哈里森和其他人继承了亨利·乔治在其作品进步与贫困（1889）的衣钵，建议对所有的年度租税价值和自然资源课以百分之百的税，并同时对其他形式的税进行减少。他们提出了令人惊异的计算方法来展示这种方法可以形成让所有社会需要都满意的公共预算。见哈里森 1998。

决定人的头脑的方式更好。

中央集权者的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的解决方案，绝不能成为改变全方位市场的选择方案——这样可以避免当地人口的冲突。今天，所有的选择都必须自下而上。这并不排除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可能性。例如把跨越好几个市的森林作为国家产权来管理也不失为一个好的主意。类似地，也会有在公共土地上的其他公共设施。基本的观点是，土地不能在私人财富积累的处置之下。

这些能应用到实践中吗？如果许多组织在社会上涌现，宣告现行的制度非法、通过斗争来修改法律地位以及开始经历自下而上的改变的时候，这还是有希望的。在此，土著人民的运动以及拉丁美洲无土地者的运动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认知度。宾斯万格发起的倡议甚至在瑞士宪法改革过程中导致了好几次修订。

水和其他环境物品

下面发生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关于反对水私有化的斗争的例子，表现了不仅仅是这个问题的戏剧性的本性，也展示了当地人民在团结一致的时候所产生的力量

(见尤哈斯 2001 以及巴洛 2001a)。1999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强制性命令之下，玻利维亚政府通过了一项在科恰班巴把水系统进行私有化的法律。美国贝克特尔集团通过当地代理公司变成了所有者，而且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把水的价格翻了两倍，甚至三倍。在一个最低月工资低于 60 美元的国家里，人们为了水而不得不每个月花费 20 多美元。那些不能够支付这笔费用的人的水被关闭，那些已经在自己家里打井的人也要缴费。这家公司和政府谈判，17% 的利润归政府，而许多居住者却不能够吃上水。

当地居民建立了由工会、环境和人权组织以及当地活动分子组成的联盟，称为保卫水和生命联盟。他们开始时通过和平示威的形式。当政府对此毫无反应的时候，他们组织了有 5 万个签名的请愿书。当政府对此仍然置之不理的时候，他们组织了非暴力罢工，阻碍道路以及游行。于是，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逮捕了游行领导人，关闭了当地电台并向这座城市派遣了 1000 名武装士兵。他们射杀了一个 7 岁的孩子，并打伤了许多居民。在 4 月 19 日，政府屈服了，并解除了和那家公司的合同。后者指控政府违反了协定。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给这座城市供水，于是工人们组织了自己当地的水

服务系统 SEMAPA。他们和居民们一起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来决定他们的需要。他们把水价降了下来，安装了新的贮水容器和管道，以便让许多郊区的人能够生平第一次享受到自来水供应。这次胜利并非确定无疑了。这家公司留下了债务，并起诉政府，许多政治和商业精英也起来响应，抵制 SEMAPA，并拒绝付款。对这种斗争的国际支持还是非常必要的。和 SEMAPA 的工人以及国际团结组织一起，保卫水和生命联盟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发表了科恰班巴宣言（见附录 2）。

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了全球化的所有制市场经济的致命后果：穷人们不再能够得到饮用水，以便让某个组织能够在他们的资本投资商获得 16% 的利润。但是，这也显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富国的政府也应该被视为是对生命的威胁。而且，对于所有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来说，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支持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在日内瓦开始于 2000 年历时 5 年的谈判，这种公共服务设施的私有化注定要变成法律。只有世界范围内的抵抗才能避免这种对人民生命的公开袭击，而且这种抵抗运动导致了跨国投资协议的死亡。在 2001 年 6 月，大约 500 个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签署了“阻止 GATS

攻击”的宣言（《团体欧洲观察家》，2001年9月）。但是不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推动公共水供应的私有化进程，地区性贸易协定和共同市场也在这么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计划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巴洛 2001b）非常清楚地想这么做。太阳带供水公司自从 1998 年就开始起诉加拿大政府，要求赔偿 2.2 亿美元，因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已经全面取消了水进口合同。这个公司想利用新的私有化来努力保护对这个国家水的占有（国际全球化论坛公报，2001年夏）。

科恰班巴的例子也说明，当地的社团也能够起来抵抗所有的当地、国家一级国际势力，并把水供应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团结；而事实上，这些势力的全球化也意味着它必须是国际公民社会的团结。自从 2001 年 10 月，加纳反对水私有化全国联盟，包括基督教理事会、工会和不同的社会运动和团体，一直在号召这种团结。在这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在向政府施加压力来让水供应私有化。在开普敦郊区米歇尔平原也爆发了一场类似的斗争。在 2001 年 9 月 26 日，当地要被切断水供应的时候，人们建造了路障，警察也摧毁了数百个路障。这场运动也和南非

联邦工会和南非全国总工会发起的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化的强烈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 2001 年 8 月，一场全国范围内反对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罢工运动被组织了起来。^① 全世界的广范围抵抗运动表明，为公共水供应所有权而斗争，比如公众或国家，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在科恰班巴，这场斗争得到了甘地的鼓励：

起初，他们忽视你。

后来，他们嘲笑你。

接着，他们攻击你。

然后，你就会赢。

水不仅仅是人们必须赖以生存的环境物品。宾斯万格（1978：88）历数了所有有关的非经济需要。他把它们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生理需要或者经济前需要（Pre - economic needs），比如用于呼吸、吃和喝；经济中需要（meta - economic needs），比如融洽、美丽、高兴以及无噪音污染等；以及经济后需要（Post -

^① 见南非劳工通讯，第 25 卷，这两个特殊事件，2001 年 8 月和 10 月，约翰内斯堡。

economic needs), 用来为子孙后代而积攒的资源的需要。用来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可以是简单的自然给予。但是它们也会和人类活动有关, 比如高楼大厦或者无噪音或无污染。

经验显示, 不论是私人资本主义还是中央集权所有制都不能够保证这些物品的获得以及保护这些物品。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作为财富积累和消费资产的产权被定义成为完全所有权, 并置于所有者的任意处置中。宾斯万格总结如下:

现在的环境问题源自财富, 而这种财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通过投资有价证券或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而获利的金融或资本产权, 并有所增长。然而, 这样, 这种非金钱物品表现出了简单的临时价值, 只能通过商业化才能“实现”。也就是说, 通过货物销售或者对其消费获得收入占有 (income acquisition) 来实现价值。非金钱物品的期望越来越少, 那些本身含有价值的物品或者它们直接的有用性, 越来越多的重点被放到了他们提供收入和消费的特点上。也就是说, 当金钱和金融资产增加的时候, 我们从我们的环境中得到的真实财富就会减

少。然而，环境物品，作为真实资产，只能被使用，而不应该被消耗——至少不能被浪费。与环境有利的产权秩序应该有一个反财富“货币化”的目标，以及反对把非金钱物品转化成消费品。

保留绝对所有权制度作为来解决这种环境问题的尝试，比如说通过价格增长来解决，效果很有限。宾斯万格于是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途径，这条途径的基础是环境应该作为一种公共利益，而所有制度应该加以适当的改变。在此，他和罗马祖传所有制律法概念联系起来，即那种形式的所有制，和完全所有制不同，并不是建立在专断处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把一件世袭的物品传给孩子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宾斯万格 1998：131）。关于环境，广泛的所有制权利就可以成为祖传的财物，经济使用权也是源自其中以及源自适合环境的要求。在这种场合下，宾斯万格把祖传的所有者说成是“继承人共同体”，即所有的相关居民都是这种财产的共同受益人。

这种方法也出现在欧洲的传统中。宾斯万格列举了传统的国家（王室）权利，比如对一座山的独占权，或者对盐、打猎或捕鱼的专属权。在此，国家是相关人口

的受信托人；只有在这些资源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条件下，国家才能给出使用这些资源的特权。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森林权利。在此，国家作为受信托人对使用森林做出的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可持续地使用森林。最后，还有一种传统的公有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可以共同使用一座山。如果从这些人中能够得出这样的想法，即每个成员都可以过度随心所欲地放牧，那就错了。相反，这种制度的建立方法是，一座山上合伙人的所有权应该适应各自的放牧能力，并能够保证可持续发展。

宾斯万格认为，这是处理公共环境物品决定性的模式。这种把公共环境资源据为己有的做法源自对私人所有这任意处置的完全所有权的依靠，他把这种行为和废除奴隶制度作了比较。事实上，一种新的所有制权利应该被赋予共同的环境物品，而这种权利应该和旧的产权形式的残余毫无关系：^①

• “扩大专有权：不可再生资源 and 稀有的再生性受到威胁的可再生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水供应、捕鱼以及打猎等）应该由国家作为受委托的环境管理者进行管

^① 见宾斯万格 1978：111。这种方法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全球公共物品研究（1999）走得更远，后者只是正视了全球规则，而不是当地的所有制形式。

理。”国家为了经济使用有条件地作出允许。

- “可持续性原则：森林法背后最基本的义务——可持续管理——应该扩展到所有的国土和土地管理上，即包括所有农业用地。”这样可以防止单一栽培的过度使用和沙漠化等，并明确“所有的国土在总体上属于非经济意义上的一国民众。”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种方式支持小规模农业，而不是资本集中的农业产业。

- “建立地区性环境主管部门：祖传继承物将由带有合作特点的所有者协会来组织，有和国家不同的地区性联系。我们正在考虑把地区性环境团体变为相关自治、自我管理的实体。它们的成员是本地区的居民。”这种环境合作社依次对经济使用作出使用允许，包括有限制性的污染的权利。但这只能由他们共同决定（比如民主决定，每个居民可以投一票）。

与完全所有权的传统和普通法不同，这种新的法律构想并不认为私人产权具有绝对性，所以也有可能对私人产权作出限制。相反，自然环境的保持完全融入到了这种所有制的概念中，在决策中，优先权应该被赋予受这些决定影响的当地和地区居民组成的合作社。

生产资料、企业和劳动力

在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里，在一个公司里有三种相互制约的因素：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企业家使用前两者，在市场风险的层面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① 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和《德国基本法》（宪法）不同的条款联系起来，在固定资产和货币意义上的资本所有制是基本的宪法制度。这绝不是管理者的重要作用作为最终权力机构遮蔽了产权。管理者享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基本法第2条 [1]），而所有者享有自由处置他们产权的保障。企业家（所有者-管理者）找到了自己产业自由的法定场所。工人们只能在通过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上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在市场上提供他们的劳动力。法律允许他们自由地签订有这种效果的就业合同。

由于所有者有处置的自由，工人们只有在有关他们的报酬和他们在公司里的表现的时候，才在公司里有说话的权利。在像今天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工作是固定

^① 见里特施蒂克，343；以及《德国基本法》第四章。

收入，拥有产权归根结底和对劳动人们发号施令有关。从法律上来说，公司的主角（主体）是产权，而劳动者是客体。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有产阶级很快在限制市民在政治权力平等性上获得了胜利——甚至是有些权力必须靠争斗获得。

一个特别和关键的问题在 19 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公司出现并代替了个人拥有的小公司，并继续发展成为现在被广泛传播的公众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宾斯万格 1978：122；里特施蒂克 1975：346）。产权所有制的保障，以前是以自由个人发展而被合法化的，继续得以扩大，直到最后变成受宪法保护的一项制度。这样，对它最初的认识就颠倒了。由于自由市场把产权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而大部分人口就被排除个人发展的自由之外。相反，无边际的积累却被置于宪法保护之下。另外，产权的集中继续通过其经济权利减少政治选择。这种不合时宜的发展如何才能得到反击呢？

让我们首先再一次表述一下关于剥夺现有制度合法化的争论（见宾斯万格 1978：134；里特施蒂克 1975：374）。在此，有两个基本主张：（1）公共福利是通过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对市场协调出现的；（2）私人产权服务于维护自由。真实生命本身就反驳

了这两个主张。事实是，在市场权利中有大量的差异。在以独占的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劳动人民所冒的风险比公司所有者要大得多——不仅在工资方面，而且在有利益的就业方面也被排除在外。这种少数自由拥有者的自我实现导致了大多数人失去了自由。所有权的集中是对民主的破坏。

现有的关于产权问题改革的建议始于两个中心原则：即在一个公司和独立合作制下的工人福利和企业利润问题。在公司制下，企业主手中的资产作为制度的先决条件要求工人创造利润。在独立合作制下，问题的解决涉及补偿问题，如果立法者介入所有者权利的实质的话，只有在赔偿保障被清楚地限定在一个合适的数量，而不是在和市场价格相联系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

对于和经济法有关的不同的宪法条文的联系，宾斯万格提出了清晰的目标，这一目标与个人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他提议把“物品生产和公共福利相联系，作为所有经济法的目标和重点”（宾斯万格 1978：146）。由此产生了三种结果：

- 除物品生产之外的最高目标是个人发展以及对所有在公司工作的员工在经济上的维护。

•更进一步的目标是在这项任务中的共同参与权(共同决定)。后者是中心,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发展问题,还涉及民主化和权利的平衡。宾斯万格甚至要求这样的宪法目标“所有受公司决定影响的人都要保证适当的共同决定的权利”。这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影响到了住在一个公司隔壁的人,那么这个人也应该被纳入决策过程中。

•最后,他号召“扩大企业家所有制和在工人手中的公司所有制的形式,使之成为一个事件和一个宪法权利。”

用格里弗里茨(2001:4)的话来说,这就是关于“把所有情况民主化的决定。在这些情况下,权力和产权决定在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的机遇和参与。”只要是决定生活的保障和权利依赖于正规的就业,就肯定会有获得付费工作均等的机会以及共同决定权利和工人所有制的扩大。

在某些时候,也有一种实现福利社会的新模式,这种福利社会超越了以前的方法,能够在通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构建一种重要的里程碑:用税收供给的所有居民的基本收入(格里弗里茨2001:5;凯斯勒1996:113)。从生活和公共利益的观点来看,这具有重

要的意义。它将很明显地不仅有利于社会上那些贫困的成员，而且对所有成员都有好处。额外的付费工作也能够被自由寻找，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和个人工作、公民社会承诺、公共工作或者休闲相互关联。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有灵活就业和个人行为的自由，而没有任何生计的压力。许多的个人社会利益（除了那些像住房支持以外）将不是必需的，相反，还要从付费工作的收入税里减去相应的数量。

实现这种模式的一个前提就是“从生产力和财富开始的税收制度”（格里弗里茨 2001：6）。现行的财政制度，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正在把税收的重担越来越多地从资本上转移到工作上。这绝对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由资本投资所决定。所以，在增值基础上的税制在生产领域是适当的形式。财产的累进税制将会不仅减少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毫无拘束的变富，它也能减缓在金融投机上这种财富的毫无收益的、危险的使用。也就是说，它将把这种社会财富反作用到生产领域。在这方面，一种其他方式将是日益增高的对超过个人需要适当水平的所有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瑞典模式表明，所有这些方式在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这里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主权越来越多地被全球化破坏了，有时候甚至被剥夺了。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恢复税收主权。第二，由于在社会财富上的缺少以及统治阶级缺少传统的权力地位，这种模式很难应用于穷国。^① 在此，建立一套生产领域不被世界市场毁坏机制应该得到优先考虑。我们在前一章提出过一个建议，从被排斥的多数人生产简单产品开始，这种产品应该受到保护，不受由竞争所驱动的以及只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全球市场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宾斯万格的产品生产要适合于公共利益这一基本标准，它也将会产生广为传播的收入、产权以及购买能力。^②

如果税收激励机制能够让简单产品按照生态标准生产出来，那么环境的负担就会大大减轻。但是，首先，它会阻止这个世界上多数人持续不断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它将是以一种发展政策的形式出现，并扎根于经济中，提供区别于依靠全球市场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洛尼 1972）的另一种方式。

① 见欣克拉麦特 1999：39 关于拉丁美洲政府在征税中的弱点。

② 又见达尔克森 2001，特别是 174；罗斯 1999 也提到有类似的方法。

在这种基本的转变中惟一的输家是赌场资本主义，它拥有巨大的、没有生产效率的资本。在这种模式里，利益不会在赌桌上获得。相反，如果投机的泡泡被本身所产生的危机所戳破，吞食资本将会一无所获。而生产型资本在这种模式下将会有长期的收益。宏观经济计划将不会像现在这样掌握在大集团的手里。在这种模式下，私人利益很明显会服从于按照生活标准和公共利益制定的民主计划。在这种框架下，将会有有限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必须服从于政治上的共同决定，特别是适应地区的设置。例如它将服从于德国宪法下规定的与产权相关的社会义务，而不只是服从于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性。它将只能在与工作有关的生产性领域中执行，而不能运行于非生产性、投机的财富积累（见费舍贝克1996）。

连同上述的当地和地区性经济活动形式，以及从生活和公共利益的角度民主的、宏观经济的计划，这种模式将会超越在私人产权和合同基础上自我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方式。

这种模式的执行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当地级、国家级和全球级的民主监督。只是在地区水平上产生其他

选择是不够的。这里提出的双战略是重新获得对经济的政治控制。建立一套自下而上的新秩序应该得到宏观经济保障，以便当地和地区经济能够得到繁荣，而不是被世界市场所破坏。

关于全球控制，这涉及到金融政策领域，要从远低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角度来考虑。要想让人性得到保留，通向自由主义和非常规的倾向必须被颠倒。这种倾向必须要用以关注生活和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计划和规则所代替。也许，这个目标只能通过让世界贸易组织服从于更加民主的联合国这种方法来实现。这也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方法的一次扭转。民主的联合国及其经济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全球性经济制度所取代，比如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越来越多地被工业化国家所掌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1992 年和 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阐明了新的责任分配的形式（见杜赫罗 1995：288）。

基础服务设施

在通往生活和共同利益上的相同行动在基本社会服

务设施的所有制上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的是，把水供应私有化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把水供应转移到了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所有制形式。但是这也应用于其他的社会基本服务，不仅仅是水，还应包括公共交通、基本通讯系统、教育、医疗和能源供应。

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并不是要允许增加私人设施。中心点是，要有适当的公共机构来提供保障，让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承受得起的，能够得到基本供应的通道。这是关于当地或中央政府能否成为所有者的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当地公共交通如果掌握在当地管理部门的手里，就会发现它在一个不中用的人手里。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面是能源供给问题。一个高度垄断的能源工业已经出现，部分是由国家援助，但是组建方式却是利益的私有化。你可以研究一下加利福尼亚的结果，在那里，被私有化的——因而也是比较贵的——电力供应因定期性的瘫痪而不得不定量配给。并不具有反资本主义趋势的《华尔街日报》2001年11月30日在安然公司破产的时候简洁报道如下：

这是美国商业的一大幻想：一个没有管制的电

力市场向整个国家的家庭和办公室输送更便宜，更加稳定的电力。但看看发生了什么。安然公司这个在惯性下继续向前滑行的美国电力市场中心的能源交易商现在在一系列的金融交易问题的风暴中面临着破产。加利福尼亚，这个在美国第一个接触电力市场管制的州，发现它的实验已经陷入崩溃，而且有断续的灯火管制，零售电价比一年前整整高出40%。

同时，能源工业已经出现了危险的生态和社会后果。核工业一直威胁着地球上人们的安全，特别是切尔诺贝利（苏联欧洲部分中西部城市，位于基辅西北偏北。是1986年4月16日的一场核能大事故的所在地——译者注）事件以后。大型水坝的修建已经把整个人口驱赶到了悲惨的境地。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比如石油）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石油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正在造成全球变暖和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俄罗斯正在进行控制这些石油来源的战争，在伊拉克和高加索、车臣和阿富汗，代价是数十万人的生命。

现在除了太阳能电池板、风车、水电站和生物燃料，在能源生产上有了新的选择（见杜思韦特1996：

179)。但是，在规模大小上应该谨慎区别。那些认为通过太阳能就能够满足我们超出的能源消费的想法是错误的。尽管太阳能有助于正面的能源平衡，^①除了要为北半球产生新的可再生能源之外，我们还必须节约能源，比如改变我们的个人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

小规模能源的选择，因其技术简单，在当地水平上有很大的潜力。它们是能源的分散形式，平民也能够使用，虽然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使用强度。这可以让市政府或者比较小的地区使用自己提供的能源，而不用依靠世界市场。像德国黑森林地区的薰瑙（Schönau）这样的地方，以及其他沿丹麦海岸的地方，就是很好地利用了风能，成为很好的榜样。同时，这也刺激了制造业开发简单耐用的技术，让个人和社区能够使用分散的能源，有了最简单最便宜的太阳能炊具，可以让穷国里最穷的人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砍柴，或者破坏森林。另一个极端就是风力塔。无论如何，当地和中央政府必须对能源供给负责，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够享用并能保证持续使用。

这些例子说明，特别是美国和欧盟为了获得利润，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压迫当地和中央服务设施实行私有

① 和萨卡尔 1999: 102 的观点相反；比较：博鲁特 2002。

化，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曾经重复过的那样，所有负责人的团体、社会运动、工会、基督教组织等到了公开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中 GATS 计划的时候了。^① 就像跨国投资协议所发生的那样，它有可能停止通过私人资本所有制及其国家促进者对全球人口的福祉进行攻击。通过把 2001 年 11 月的会议进行专政，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避免了人们的抵抗运动的公开化，就像 1999 年 12 月在西雅图发生的那一幕。它发起了新一轮的自由化，没有达到社会运动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提出的要求把前几轮自由化的（间接）影响提出来进行审查并讨论这一要求。的确，这种独裁的，有时是敲诈性的方式只会得到受影响的人们以及和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人强有力的抵抗。^②

知识产权和文化

世界贸易组织在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上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像前面所阐述的那样。美国最高法院的一

① 见第四章。

② 这一点在 2003 年坎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表现，在那里，从南半球的国家和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共同抗议进一步的自由化。

个裁决打破了保护生命专利形式的栏杆，把生命转变成成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私人产权。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意思是要求所有想加入这个组织的国家只能接受这个为大商业利益服务的私有化的绝对命令。

在这里，也需要有基本的抵抗运动。要求很明显。和麦克弗森一起，杰里米·利弗肯已经强调了为什么生命的因素，普通民众必须被归到私人所有制里的原因。中心原因就是私人产权具有排他性，只对富有的购买者开放，而公共所有制保证（至少在原则上保证）对正在讨论中的利益开放，在这里指的是知识。利弗肯引用麦克弗森的话说：“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的、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产权形式是‘一种个人权利，这种权利不能被排除在整个社会积累的生产性资源的使用或者受益之外’。麦克弗森倾向于重新使用产权的古老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定义。产权需要扩大……应该包括‘不被拒绝进入的权利’”（利弗肯 2000：238；麦克弗森 1973：133）。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对生命形式的专利所进行的私有化肯定被颠倒了。比如在 2001 年 11 月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决定的正在和向艾滋病或疟疾这样的全国流行病作斗争的国家政府，应该对制药公司的昂贵的

药品进行打折，以便让他们的市民能够买得起药，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相反，政府应该对自然的医疗力量进行管理，并对私人工业为大众利益所做的让步进行奖励，或者控制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药品研究与发展。所有在私人领域的研究都建立在公共税收基金所组成的基础上，其利益的私有化是根本不能被接受的。

另一个例子是种子。当跨国公司用传统的方式偷盗了南半球国家农民发展出来的谷子和水稻的多样化，进行专基因处理并实行垄断的时候，上面所描述的对社会和生态结果的毁坏也随之发生。国家应该收回对种子的管理，让所有的农民种植他们自己的农作物。

这个问题在人类基因组方面更加紧迫。如果把这个领域通过专利的形式私有化，后果将不堪设想。必须通过公共的、民主的控制来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人类生命的这一部分的商业化和对其进行操纵。

在这一点上，问题已经超越了当地和国家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对世界贸易组织推崇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危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击。

这一点也应该应用到文化方面。在这里，地方性和地区性文化的全球商业化正在破坏它们自己的源头。文化创造性生长与人们的居住地，社区和传统直接相关。

没有目标是文化的本质，而现在的一些少数大公司按照其利益标准在均一形式下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文化和生态抵抗运动正在链状地形成，而且正在发生。在此利弗肯（2000：257），令人信服地写道：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社会运动。这两种力量联系紧密。所有的文化在自然中是同源的，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源自和地球的亲密接触……文化来自一种对组成自然世界的生命源泉的持久的尊敬和热爱。我们许多的当代文化表达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对地球本身的第一次文化联系。文化行为和建立大部分是对生命的承认。它们证明了我们与自然负有责任，并把我们的和更大的生命力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在这力量中，我们也是一分子。对生命的再次肯定处在内在价值的中心地位。和商业领域形成鲜明对比，文化成了可以接受的行为准则；而在商业领域里，所有的现象都被缩减到实用性、剥削性和私立性……

减弱或者消除文化多样性，资本主义市场就会跌跟头，因为，就像我们描述的那样，社会信用和

社会资本都会枯竭，不再能够作为建造和维持商业贸易的基础。

这段文字很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是未来生命的中心。同时，它们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正在为财富积累而通过破坏自然界中的创造性生命和文化基础来破坏它本身。利弗肯接下来指出，这些产权经济中崇拜物神的基督教信徒对这些领域的破坏正在鼓励对基督教的盲目、暴力的反击。但是资本主义、金钱和资本主义物神崇拜者的核心是如何被控制并征服呢？

货币和金融

我们知道，在和产权的联系中，自从公元前 8 世纪以来，货币一直是不同市场经济的中心。产权是以利益为中心的新的信用体制的基础。这种制度越来越多地通过载有利益的货币来运作。亚里士多德把通过货币进行产权积累的机制看作是个人以社区为代价为争取无边际财富的诱发工具。耶稣把它看作是财神，并揭穿了它的伪宗教功能。在现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恰恰表明了所有的存在物都被看成是资本，也就是

“产权产生利益”。^① 霍布斯把货币叫做在市场经济的血管里跳动的血液。洛克用货币引用中的“默许的协议”把产权的不公平分配合法化。马克思用无比清晰的分析，阐明了通过其本身设定的天性自身扩大的货币的物神特点，是如何把整个社会的生命驱赶到几个表演者的后面的——以及直接和间接破坏作用造成的间接结果。这一点对于今天任何一个想要看的人都能够看得见。

从生命和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社会对于货币价值的导向应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从根本上对其提出挑战，甚至要早于我们在研究并对个人货币和金融方面提出新的选择以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仅仅从货币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来衡量经济的成功与否是错误的。毕竟，破坏性的因素也被作为积极因素包括在这种衡量之中。交通事故（由于附加的服务和物品）、江河的化学污染（由于生活必需的清洁用品）或者股价的上涨（由于工作的重复）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货币价值。所以在很久以前，就有尝试把社会和生态指标引用于对经济进步的衡量模式。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每年一

^① 巴肯 1997：70：“资本……我们把它定义为产生利益的产权能力”。

次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它已经建立了一种人类发展指数（HDI）。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另外一种计算模型，即“可持续魔片”（magic disk of sustainability）是由迪芬贝加和他的研究小组提出来的（1997；又见安德生 1991）。这个模型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有 6 个指标，每个指标都是对真实的人和环境情况的实用性（不光是货币方面）作出显示。所以，它是关于社会认知的一种转变。经济活动不应该只是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考察，亦应从其对人类生活和环境的效果的角度来衡量。

关于货币在产权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还有第二个基本的问题：附加价值。回到 90 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高兹瓦德和德·兰格（1995：137）指出了这样的一种结构性不平等，实用硬通货的国家——特别是实用美元的美国——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货币进行交易和负债。然而，南半球的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和债务管理上不被接受。这些国家必须通过出口挣得硬通货或者贷款——其结果是无法支付的债务。于是这两位作者就建议用类似于 1944 年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以探索的方式改革全球货币系统。凯恩斯曾经建议为世界中央银行建立一种货币，叫做班柯（Bancor），代替美元作为世界

储备货币。然而，美国成功地强制其他硬通货以固定的汇率与其自己的货币联系起来，直到 1973 年（见杜赫罗 1995：95）。成立于布雷顿森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引进过特别提款权，但它们的分布还是有利于富国。高兹瓦德和德·兰格于是提出“这种分配规则应该转为有利于穷国”（高兹瓦德和德·兰格 1995）。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异常的因素，就像罗博瑟姆明白无误地表述出来的那样。^① 究竟是谁拥有流通中的金钱？大部分人当然认为是国家。我们浅薄地认为硬币和钞票的发行是国家的特权。在事实上，国家的钱现在只是占流通量的 3%。其余的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自私人金融机构，大部分是银行。

核心构成是在抵押产权的基础上增加价值。例如银行发行货币作为房屋为抵押的贷款。这同样也适用于土地、工业、公共制度和服务以及，最重要的，国家财政预算本身。这就意味着银行是在通过公民和公共部门负债的基础上获利的。例如 1998 年英国的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4110 亿英镑是来自房屋所有者，3000 亿英镑是来自工业，

① 罗博瑟姆 1998。“grip of death”的定义是从中世纪抵押的概念中直译过来的，它指的是一种习惯，某人用握手的方式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其他抵押的人……直到死亡。

800 亿英镑来自公共资产和公共债务（罗博瑟姆 1998：35）。这种由银行系统所有并控制的“债务货币”（罗博瑟姆）在整体上给公民和公共社会造成了两个决定性的不利因素。首先，他们的产权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及其代理人——银行的手里。第二，用来偿还债务的钱经常包括对资本所有者的利息偿还。如果银行发放贷款并以此赢利（银行本身的资本占很小的一部分），偿还则意味着债务的取消，但并不是以贷款获利所产生的数量。^①这意味着我们，政治社会，允许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所有者通过债务，不用做任何工作就可以获利，并为自己创造出更多的产权。通过金钱永久的自我繁殖，以及人们和公共部门债务的支持，产权正在自动地走到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所有者的手中，与附加经济大不相同，进一步加强了资本所有者重新分配的过程。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历史上第三届总统 1801～1809）通过把挣钱的权利留给银行了解了一个人自我剥夺的问题：

① 罗博瑟姆 29：“当钱被归还到一个透支的账户上的时候，银行就会取消这笔债务，但这笔钱并没有被取消或灭失。这笔钱被完全看作像存款一样；银行把它看作是它们借出去的钱的偿还。那笔钱被计算为银行的资产……这笔钱被计算、并被视为银行自己的产权。”

如果美国人民允许银行控制他们货币的发行，首先通过通货膨胀，然后通过通货紧缩，银行及其周边公司将会从人民的手中剥夺他们所有的产权，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一觉醒来，发现他们在其父辈占领的土地上却无家可归。货币的发行权应该从银行收回并重新赋予国会和它应该属于的人民。我真诚地相信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机构比常备军队自由造成的危险性更大（罗博瑟姆 34）。

更有意思的是，这段话让我们想到了公元前 7 世纪以赛亚先知所观察到的现象（以赛亚书 5：8）。

罗博瑟姆接着一步一步地分析了这种私有化了的货币机制的破坏性后果、它导致无约束增长、消费、武器扩散、农业工业化、工业和国家以及自由贸易等引发的债务等等。他追溯这种发展的源头到英国和美国，然后提出要求改革现在的货币体制。在这方面有许多不同的选择方式。

在这些选择的中心是债务货币的份额在流通中必须被减少，而无债务货币的比重应该增加。

罗博瑟姆把他的实用性建议和亚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上第十六届总统）和道格拉斯——20 世纪 20 年

代英国社会信用运动的奠基人联系在一起。亚伯拉罕·林肯在 1865 年总结了关于货币政策的一段话。他说：

货币是法律的创造物，而且，货币最初发行应该只属于国家政府。如果不能让它流通，货币占有对国家毫无价值。资本有其适当的位置，而且有受保护的资格。工人的工资应该在这种结构中以及在比货币工资更加重要社会秩序中得到承认……政府应该支持它的货币和信用以及这个国家的银行存款。个人不应该因为货币贬值或者通货膨胀或者银行破产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货币将停止作为主人，而成为人类的仆人。民主将上升到高于货币权利。^①

几个星期以后，林肯被暗杀。谋杀的动机一直没有被找到，但是有人怀疑银行界有人支持（罗博瑟姆：216）。他的目标是把货币和贷款完全从银行的手里拿出来，并建立一个国家系统。道格拉斯，相反，他的切入

^① 亚伯拉罕·林肯，参议院文件 23，91，1865，在罗博瑟姆 1998：220。关于道格拉斯和社会信用，见哈金森 1998。

点是通过让无债务货币在人口中流通创造购买力。

罗博瑟姆把这两种方法联系到一起，并提出了一个方案，目标是提出前进的方法，并不一定用同一种方法应用于各个地方。他关心的是不把这个提议做得太革命化，从而一开始就会受到反对，而是展示演变的可能。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国家应该创造出多少非债务货币出来（罗博瑟姆：264）。

在1998年，英国供应的货币的3%是无债务货币，而且是政府发行的。但是，由于7800亿英镑的总债务要比6800亿英镑的流通货币高出1000亿英镑，所以无债务货币供应实际上是负1000亿英镑。在另一个极端，过多的无债务货币供应会加速通货膨胀。在1950~1963年之间，无债务货币供应所占的份额是21%，通货膨胀率低，就业率高，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国际贸易也不太富有攻击性（同上：309）。然而，由于许多复杂的因素的存在，给出一个统计百分比并非明智之举。但是收支差额是如何计算的呢？如果不考虑一些细节，罗博瑟姆（Rowbotham）的方法可以概括如下：无债务国家货币供应每年都应该与由贷款产生的货币供应（称为M4）的增长相一致。也就是说，这种附加的货币供应不是由“债务货币”产生，而是通过无债务、国家获得的基金

所产生（罗博瑟姆：366）。于是，我们就会有一个国家控制的、“补偿性的”货币供应，来补充通过银行借贷获得的传统个人货币等等。

这些货币都流向哪里去了？首先，它被用于减少政府债务；其次，为人们提供基本的收入。在这种安排被应用到这种新的制度正式起作用时，还要经过几个阶段（同上：269）。大多数人和国家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国家可以承担起教育、卫生、交通和文化不受债务约束的责任。人民可以在这种基本收入的基础上，灵活地安排他们自己的工作，以便让与自由社会活动相联系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和兼职工作能够减轻持续增长的压力。持续的、高质量的以及可持续的生产也将通过减少压力而得以增加，并获得利益。引用这种制度的国家也将有这样一种优势，即他们的产品与利息关系不大。然而，引用这种制度的国家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好，因为这种货币制度并不是建立在淘汰性竞争的基础上的。这样，世界上 2/3 的债务将由通过特别提款权获得无债务支付工具的富国来偿付——只要债务是合理的。

再强调一次，无论这个问题是如何在细节上得到解决的，银行有资格只是动动笔就可以增加资本拥有

者的产权，没收公民的财产，把国家拖入深深的债务之中以及给经济和生态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本身就是一种丑闻。这必须马上列入政治议事日程。

在这种观点发生根本变化的基础上，应该探索个人更进一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够改变和产权相关的货币机制。他们应该不再像现在这样对少数金融资产所有者有利，而是应该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相当重要的是自然生命也支持这种制度。

古老的货币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集中到了对产权和利益的联系上。那些把钱借出去的主人想获得更多的回报。既然在古代社会“静态”的经济中，债务人不能够创造任何净增值来支付利息，这样做就意味着对他们生活的侵害。如果他们不能够从自己的家庭中取出钱偿还债权人，他们不得不作为奴隶用工作偿还债务，并/或者失去（土地）产权，也就是他们的生产工具，给了债权人。因为利息的致命性结果，圣经、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都号召对其进行禁止。

在今天的经济条件下，对利息的禁止将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对债务人的生存没有产生攻击，今天的要求是，实际利息不应该超过其产生的增加值，也就是在成本减除和通货膨胀调整以后所获得的真实增长率，只要

在我们经济增长中有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性。这将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所设置的正在运行的高利息政策是结构性高利贷。自从 1980 年以来，资本市场上平均的实际利率（通货膨胀调整后）大大超过了实际经济的增长率——随之对国家造成了破坏性后果，实际上它祸及 90% 的人和经济本身，导致不能偿还的债务。^① 对额外的无债务货币供应的简单提议将肯定会抬高利率。同时需要的是还有对跨国公司和国家市场重新引进国家利息规则。

因此，如果只为财富积累的产权不为真实利益而停止的话——不考虑社会和生活，允许利率超过实际增长率——把资本和使用价值的生产领域重新连接就不算成功。^②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现实的要求是在跨国资本市场上对利率进行政治上的重新规范，也就是废除货币主义政策。

还有更加深远的要求。它们包括瑞士的西尔沃·格塞尔（1862~1930）提出的“自然经济秩序”的支持者们所建议的“自我减少”货币的古老要求。这个要求认

① 在这个评论后面的原始理论是在弗塞尔的欣克拉麦特提出的，欣克拉麦特等人 1989：147。

② 这是对达尔克森 2001 所描述的一个补充因素。又见阿尔特法特 2001。

为，保留的货币在持续地降低价值，以便让它能够以交换的单纯手段进行流通。凯斯勒（1992：14）整理了反对这种提议的辩论。它会有效地导致更多的消费。重要的是，利息只是在产权、利息、货币、竞争和利益最大化机制中的一个加强因素。它被认为能够自我约束的市场的调节——这种复杂的机制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许多的不平等。

从短期来看，这种号召仅仅是要求对1980年以来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投资者的运作进行补偿。在这里，优先权被赋予了所有发展中国家通过免息的特别提款权的债务取消或者——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债务偿还。由于复合利息机制以及高利率政策，发展中国家已经偿还了大大多于他们所借的金额，然而，他们每年面对着更高的利息，并要求他们的国民作出更大的牺牲。这些方法，当然，和属于这些国家的精英们的货币返还联系在一起，这些精英们自己通过资本战争参与了对他们国家的掠夺，并掠夺到西方银行。像南非这样的个案，除了债务的取消以外，肯定还有其他的要求。那些为少数白人（他们的贷款）构成了“讨厌的债务”（odiousdebts）的压迫性政策提供经费的银行必须提供补偿，而不是要求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偿

还支持这种制度的债务。^①

所有的这些通向一种新的货币政策的必要的步骤需要有全球层面的政府间的配合。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安排开始之前，在地方层面的人民就有许多的选择（见杜思韦特 1996）。例如他们可以组织起以物易物的集团不用货币和利息来交换货物以及提供服务，这种方式已经在地方交换交易系统中和在国际范围内成功地实践过。然而，关键性的问题是其他形式的银行系统和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在欧洲，有超过 30 家其他类型的银行是国际社会经济投资人协会的成员。^② 他们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变化。那些超越了对环境的关注而特别提出利息问题的机构，像德国有的银行，有过特殊的经历，投资者准备好了为促进一种社会经济而改变他们的利息水平来适应上述的标准。这种潜能绝没有被那些按照他们自己的本性应该号召一种公平的利息制度的人和协会，比如工会、基督教组织及其成员所完全激发出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对公共意识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影响。

除了利息之外，以及与之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中

① 见阿克生·史维茨 2000。与合法的补偿要求相关的更进一步的问题，像关于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剥削等，不能在这里详述。又见达尔克森，2000：176。

② 关于民族投资，见 www.eiris.org。

心问题——投机。1973年货币管理的结束导致了在外汇上的投机行为，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们知道，每天的外汇交易量，大约为1.5万亿美元，实际上有多于95%的投机性。今天正在讨论中的最广为接受的对策是对所有的货币交易的营业税，就是托宾税（见尤罗帕2000：50）。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1978年建议对所有货币交易征收0.5%的税，以恢复金融市场上的平衡和冷通货膨胀。税率保持在0.25%~0.5%之间，一个更进一步的副作用就是每年的征收到的税款在1500亿~3000亿美元之间。这笔钱可以用于对公共债务的降低以及用到生产领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UNDP发表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建议，把征收到的这笔钱投到一个世界社会基金来惠及更加贫穷的地区，就像欧洲结构性基金。这种税比较容易征收，因为所有的外汇交易都是通过中央银行的SWIFT清算体系完成的。加拿大和芬兰政府，以及其他欧洲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表达了对托宾税的支持，而且像凯罗斯·尤罗帕和南半球大赦年运动也在许多国家为推行这种制度而活动。

托宾税并不是治疗投机性资本积累的万能药，但它是一个开始——遵从市场，也是一个强烈的象征。在金

融危机中，像亚洲爆发的那次一样，从投机中得到的利润大约是 40%~60%，这笔小的费用可能毫无意义。更进一步的手段，比如资本移动和流通控制也应该被应用（尤罗帕：51）。中国避免了被卷入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因为它还没有废除这些手段。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它将如何能在下一次的危机中全身而退，我们将拭目以待。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一样，要求它的成员对市场不加约束。

更进一步说，在证券交易所里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对付越来越多的为不劳而获的产权积累而进行的投机行为（同上：51）。股票的发行和为真实投资而发生的借贷正在为投机的二次交易而被滥用。德国和其他的国家应该采用一种股票交易营业税（大约 1%），就像在伦敦和新加坡那样。在德国，公共预算就会有大约 125 亿欧元。另外，投机所得就会受税收的支配，不受一年时间的限制，就像损失可以被减少而不受税收的限制一样。德国执政联盟非常不负责任的税务改革是废除了在公司股票出售上的税收。这就孤立了公司之间的兼并而不会产生真实的经济增长。它只会促进资本产权的集中，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还会以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为代价，这就会变成国家预算的一个包袱。而公众受

到的损害则是双倍，甚至是三倍的——有税收、工作以及提高的公共债务，这些反过来又会要求提高利息支付。税收应该在更高比例的基础上重新调整。

最后，在资本产权被投机性地滥用以及对其进行控制的领域，一个完全不同的点需要被提到：养老金制度（尤罗帕：39）。到目前为止，养老金一直是建立在不同几代人累积的基础上的。年轻人，工作的人从他们的工资里支付一部分，雇主也拿出相同的一部分——参考产权的社会义务。这部分收入可以用来支付养老金。通过倒置的年龄金字塔，工人收入的负担越来越重。德国的红-绿联盟的反应是在2001年对养老金进行了改革：它采用了“第三条腿”，部分由工人的私人资本贡献，并放弃了雇主的社会义务。结果是，他们不需要支付相同的数目。这是一种丑闻，也是对基本法的一种亵渎，一个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决不会强制实行，因为它和工会抵抗运动以及一个社会民主反对派迎头相撞。大家都知道，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养老金基金在资本市场上已经非常活跃，而且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已经作为参与者加入了赌场资本主义。金融市场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将不仅加强了它所造成的破坏，也将加大它们的不安全感。如果再来一次大的崩溃，这些养老金该怎么办呢？

即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政策转向以后，在近期也没有迹象表明有改变这种“改革”的现实的机。最后，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对此作出改变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必须要争取这样做。毕竟，它具有适合的象征意义。现实政治是让看起来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一种艺术——特别是如果选择是毁灭和自我毁灭。这种选择是重新使用一种经过改良的平等团结的制度，这种制度部分地被资本收入积累制度所减少。由于年龄金字塔，与此相对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大增加的辩论是站不住脚的。研究表明，雇主的贡献不是通过工资被取消，而是通过增加值被取消的，养老金的筹集也是可能的。所以，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技术，都作为各自提高生产率的一部分，这也对社会保险作出了贡献。这也增加了非金融性的争论（见凯斯勒 1996：102 和 2004：114）。

还有其他的可行的社会保险模式（养老金、医疗、就业），作为不同国家表现出来的例子。关键的标准是：所有的公民对这种制度有所贡献，也都从这种制度中获益。斯堪的纳维亚有以税收为基础的制度。在瑞典，所有的收入集团都是养老金基金的成员。这包括了从资本和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并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降低。

自然，在这些模式里，资本将会有更大的负担。但是，为了把它从投机通过有利于工人的收入再分配重新转移到实体经济上，这样做也是有意义的。对于资本上的税收负担问题也同样适用。

除了利息、货币、股票交易和养老金基金，我们必须提出逃税和避税这一话题。在此，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应该知道，当新自由主义政府宣称大的资本所有者能够通过减少他们很高的税率和类似的赠品来在扩大就业上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说实话。这种宣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0年左右德国联盟政府税制改革，而且它一直都在某种行动的掩盖之下。至少自从关于失业率增长的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发表以后，人们逐渐就应该知道，公司如果不是投资进入投机性金融交易，理性化地进行他们的资本收益投资，于是丧失了许多的就业机会。应该扩大对资本收益和资产收入的税收。这样就会减缓投机行为，而且生产型工业将会从金融红利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将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另外，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不用借债进行融资，而且能够产生就业机会。所以，在我们讨论打击非法逃税以前，我们必须强调合法的避税应该被置于控制之下。只有这样，德国宪法中所强调的产

权的社会义务才能够得以恢复（见罗斯 1999；衡斯贝克和默灵·赫斯 1999：195）。这些对所有国家都公平适用，就像克里斯丁·德布拉所描述的法国那样：

这种个人的、累进的收入所得税是出类拔萃的共和国税收制度，是惟一和我们宪法性共识相应的制度，即任何公民都不能免除按照其能力为公共花费负担做出相应贡献的责任。但是，有一半的公民并不受此义务所限，而且在另一半中，这种负担也是不公平地被分配。10%收入最高的纳税者中——他们批评54%的最高纳税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其纳税负担在1988~1996年中从19%降低到了15%。国内税收中收入所得税的份额只是10%；剩余的90%并没有按照能力原则进行征收，最贫穷的纳税人负担起超过平均水平的负担。

这一点在国家不愿意打击资本产权的逃税问题上尤为明显。就像在第四章里所描述的那样，国家并没有雇用足够多的税收检查员。除了他们自筹的工资，他们每年还能给公共预算和大众带来数十亿额外的税收（在德国，这个数字在150亿~500亿欧元之间）。所以，首先

要做的就是给税务局提供有能力的工作人员。

不可否认，在这方面国家行动并不充分。关键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即关于税务避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的问题。（见尤罗帕 2000：52；布莱斯威尔·米尼斯 1979 以及 1980）。他们惟一的目的是收回资本主义产权对社会和公共利益的承诺。它们必须被废除，不仅从人和自然生活选择的前景上，而且也为了国家，甚至实体经济的自我保护。根据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项研究，仅发展中国家每年就要因为税务避风港而损失 500 亿美元。与不可能废除这个论调形成对比的是，可以说，即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公布黑名单，就已经能够让那些被认为是“干净的”的中心作出明显的努力。这场战役应该从适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公司和个人开始。这个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实现：

- 宣告更强硬的管制，这将会导致更多的谨慎；
- 如果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有避税行为，就对它们实施制裁；
- 废除匿名信托、非实名账号；
- 用全球统一的标准对跨国公司征税；
- 建立一个全球检查机构。

国家政府能够，也必须在此问题上进行配合。特别

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卢森堡、爱尔兰、瑞士以及程度较低的其他的欧洲国家，都要对容忍这些对公共利益公然有害的设施的存在负主要责任。拿德国为例，联邦政府对破坏基本法第 14（2）条的行为没有能够进行有效充分的反应，研究反对联邦政府的这种做法的结构性建议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益的。基本法第 14（2）条规定“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

国际金融制度

从生命和公共福利的角度看，一个人如何能够应付“金融驱动下的帝国主义”（见邦德 2000：196；奈格里和哈尔特 200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实际银行的势力呢？有这样几个战略选择：

- 批评性对话；
- 把现在非民主的国际金融制度换成新的民主的制度，在一个改革后的联合国的监督下调整全球经济；
- 回到国家规范，或地区发展规范。

批评性对话已经被基督教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所使用，也被北半球大赦年运动使用。自从 1997 年世界

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参加了朗伯斯会议以后，英国圣公会就已经发起了广泛的叫做世界发展真诚对话倡议。^①另外，在国家层面上不同的对话正在进行。德国福音教会大会在2001年11月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教堂必须明确他们把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看做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虽然有批评性的对话。”^②北半球大赦年运动更具有批评性，并争辩说为了能够在北半球获得一个广泛的基础，很有必要从具体的问题入手，比如在负债严重的国家名单中为最穷的国家减免债务。从那里，他们打算将结构性转换为工作方向，比如国际破产法。

世界教会议会的一个工作组已经起草了一个文件，警告基督教组织在对日益增多的批评，要求他们的政策要集中到抗击贫困作出反应的时候，不要轻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花言巧语（世界教会议会2001）。世界银行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组织的社会工作提供公共融资，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它的框架结构是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正在起草的新减少贫穷和战略

① 见网站 <http://www.wfdd.org.uk>.

② 德国福音教会2001。英译版与2002年5月单独出版。

文件。这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方法，用下面的观点来看，这一点很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的最后阶段叫做促进结构调整资金设施。在经历了对这些计划猛烈的批评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9 年科隆 G8 峰会之后，把名称改为减少贫穷和增长文件。这就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在继续着那些产生结构性贫困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政策。为了掩盖这些，他们花费了部分钱财来减轻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并消除对他们的批评。

德国福音教会大会应该通过把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称为他的伙伴（而不是“对手”）的形式来很明确地把自己和这些批评性民间机构和世界教会议会分开，并因此为其作辩护，虽然他们有不民主的特点和破坏性的政策。这并不是蛊惑视听。这种言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绝对）权利忠实的表达，表明了大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比事实和圣经的消息要强烈得多。从人性上讲，南半球贫穷社区非常贫困的基督教组织接受世界银行的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尽量避免。批评性对话只是作为一种平衡行动才可能出现，并号召根本上的转变，比如一种新的国际破产法，导致贫困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废除以及世界经济制度的民

主化。

第二个战略性的选择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民主化的要求。这里有许多有关非常不民主的国际金融制度的描述（杜赫罗 1995：95 和 288 方法）。它们和股份制公司相当——一美元，一份投票权——另外，美国还通过它的股票份额为自己保留了否决权。从内部转变这些制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毫无争议，在许多方面，从人类的生命和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全球层面上的制度在规范现有的全球市场上是绝对必需的，而这些市场现在是纯粹用来追逐利益最大化。这对利息、货币、股票交易、养老金基金和税收制度也同等适用。在这里，惟一的长期前景看起来正在扩大联合国的经济能力，联合国至少拥有一套民主的制度。1992 年的 UNDP 人类发展报告表明了一套关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综合的计划（杜赫罗 1995：288）。它仍然非常的卓越，即使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新自由主义权力的胜利它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和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提出的建议一致，它从长期的角度规定了一个全球中央银行，一种累进税的全球制度，一种以社会为导向的国际贸易组织，以及一种为经济问题而设立的国际安全理事会，所有这些都都在联合国的管辖之下。这样，国际金融制度和

世界贸易组织——在一个过渡期之后——将是多余的组织。关于权力政治，这些建议很明显没有机会。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它们将被证明是有用的。从现存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相互依存的角度看，建立全球的计划和规范是最基本的。

什么是国家和大规模地区控制的选项的机会呢？这并不排除长期全球民主的规则。相反，以优先考虑当地人民在他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生活为起点的对经济的控制，必须从地方性层面向全球层面发展。就眼前来看，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更容易达到目的。邦德（Bond）（2000：251）非常精炼地指出：“全球规模可能有一天以一种类似战场的形式出现（比如通过联合国制度，这种制度至少在概念上是民主的，不像布雷顿森林所确立的制度）。但是现实的‘选择’可能不得不在全国和地区规模上经过斗争而获得”。

这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现实评估的基础上的，这种评估认为，由于全球规则和资本产权的积累战略，从上层根本不可能得到转变。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本身就是这种选择的实质性的部分。只有当人们采取当地层面和小规模地区层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行动时，这种产权制度及其工业基础最终才能为所有人和生活的利益

作为一个整体所承认。从政治角度来看，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种运动在全球层面上只能为生活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提供抵抗运动，让当今制度失去法律效力以及最多制定的关于全球社会生态控制的长期目标。在国家和可能的大规模地区层面上（比如在南部非洲、东非、安第斯山脉以及欧盟等），它们除了能够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外，还有可能完成个人社会生态和产权和经济秩序的民主再规范。在富国中的一种抵抗形式可以是，比如通过停止向布雷顿森林组织提供资金而达到胜利。

在邦德（2001：282）最新的书中，他在一种民主化的经济政治的环境中总结了她的自下而上的新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如下：

总体来说，不仅是在南非，在这方面一些发展主义国家的干预可能包括对密不透风的外汇控制的强迫接受；通过战略国家的花费导致的经济谨慎的通货再膨胀；向金融机构注资以便把金融重新定向为社会使用的方向；增加经济战略地点的国有化；对进出口要求创造性的修改以便避免外债和由于奢侈消费而带来的资源浪费；对不合理的外债的拖欠；以及一个大体的承诺来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利率

补贴而“扭曲价格”以及把信用定向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如果需要的话，可保证最多的民主投资的发展回报。

像阿明（1990）这样的经济学家建议让地区和世界市场脱离联系，以推动建立自治的社会和生态规则，远比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金融势力更容易。在这里，欧盟有独特的机遇，但它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尽管有社会运动所作的巨大努力。截然相反，和经济暨货币联系一起，它和一个货币“稳定公约”联合到了一起，而不是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在一起。由于欧洲的社会传统，它会在原则上有可能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永恒不变的全球化宗教神话和美国风格（见布尔迪厄 1997）。1999 年以后把奥斯卡·拉封丹赶出新自由主义的总理施罗德以及和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布莱尔已经毁坏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把欧洲转变成一个福利国家模式的机会。这种福利国家模式至少能够在一种新凯恩斯主义者，而不是在后资本主义的模式中勇敢地站起来反对社会达尔文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过程。

没有人能够说明事情将如何发展。赌场资本主义可能在任何时候崩溃。在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各国发

生的危机只是这种控制性体系本身全球性危机的征兆。只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的声音才被西方国家所听到，尽管他对自由主义制度及其主张的批评在以前就已经为西方国家所知道。所以后资本主义这的选择很快就会有市场。但是如果人们还没有对这种选择做好准备，就会再一次出现有诱导性的人民党主义者的法西斯主义，这已经在欧洲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即使欧盟现在允许自己成为这个全球的、以新自由主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渠道，这种社会运动也必须在这方面持久地坚持，努力把它变成一个推动福利国家的工具，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化剑为犁。

无论这种制度的崩溃或者为生命而进行的政治干预来得早还是晚，在地方层面上的人们在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机会来组织并管理产权、工业和金钱。无论他们是通过合作还是通过他们的市政这样做的，至少他们是忠于生命以及生命的全部。

第八章 上帝?还是财神?

——在社会运动环境下
基督教组织的忏悔

社会运动

当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正在进行秘密谈判被泄露的时候，多边投资协定受到了阻碍，这也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运动。自那以后，全球社会运动网络已经在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方面。在1999年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上，他们帮助阻止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发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八国集团（G8）各种不同的峰会上，他们的抗议越来越强大。密斯已经描写了不同的事件和运动，并出版了他们

的文件。^①

在 2001 年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时向一名游行示威者开枪射击标志着，暴力对抗被另一方发言人以“反全球化基金主义分子”的名义所抛弃的人的新阶段。反暴力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事情。“和平”改变的事件和声明很少能给媒体可报道的题材，如果有的话。如果在非暴力示威运动中混进了一少部分暴力的人，那么媒体就会只报道那一小部分暴力活动，而没有非暴力的大部分人的信息。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而且没有一般的解决方法。既然布什总统已经从他的帝国主义的高度宣布“不支持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没有人口和政府政策的区别。所有那些不能同意这种过于简单的观点的人都被看作是恐怖分子或者他们的同情者——情况和 1987 年美国军事战略文件相似。这个文件把像国际特赦组织的人权集团、解放主义理论家和救护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分子”并加以打击（见杜赫罗等人 1990）。一条古老的规律表明，一个帝国越是依靠直接武力和极权方法

① Mies 2001. Wielenga (1999) 也在把公平和生态相互 (eco - justice) 联系上以及在这样做的方法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来支撑，它就越靠近死亡的边缘，这显示了其内部虚弱并失去其合理性。这种情况要求坚决的抵抗（不用相同的帝国主义的方式）。

在寻找新的选择上，这也非常重要。首先要提到的全球事件是在 2001/2002/2003 年一月发生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和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同时举行。^① 到 2002 年，它已经举办了地区间的论坛，有广泛的参与者。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因其最后的示威而吸引到 50 多万人。尽管有一部分针对达沃斯的独立的反对事件（2002 年世界经济论坛在纽约举行，也有针对纽约的反对事件），少数的暴力人员的渗透在一开始就被阻止，使得媒体对世界社会论坛的信息有了更好的报道。

关于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选择成功的关键问题是全民社会中大协会的行为，像工会、基督教组织和其他宗教社区。西雅图的胜利最重要的是由于北美工会惊人的强烈参与。而在欧洲，通过社会运动来更新欧盟的社会政策的尝试效果很差，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工会到目前

^① 见 Dierckxsens 2001 and <[http://www. forumsocialmundian](http://www.forumsocialmundian.com)> ([www. euromarches. org](http://www.euromarches.org)).

为止还参与得很少。问题出在双方，就像在“欧洲反对失业、不稳定工作和社会排斥”运动中所显示的那样。

促进教会团结的环境

下面的思想是关于基督教组织的。在这里，他们的重要性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并不简单是一种经济或者政治现象，而是一种宗教现象。后面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另一方面，一旦和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基督教组织就会成为强有力的参与者。这样就集中到了以无望的负债累累的贫穷国家形式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即使是在北半球，许多基督教组织也参加了以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为中心的两大大事件，在1998年的伯明翰（英国）和1999年的科隆——共收集了2000万个签名。而且自从2000年以来继续从事运动的人数的减少也正在试图让政府信守他们在停止执行过程的承诺。^①

北半球大赦年运动和凯罗斯·尤罗帕一开始就已经就

^① 在英国，这种运动的继续现在已经和伦敦的新经济基金会联系了起来。非洲的南半球大赦年运可以从 www.jubileesouth.net 里联系上。

试着向基督教组织表明 2000 大赦年运动只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结果的一种征兆。也就是说，这只是开始，并不能被认为已经结束。特别是金融市场和整个金融系统问题，它是“债务危机”和许多其他社会和生态灾难的症结所在。^① 产权问题最根本的意义，我们本次研究的主义，恰恰是在这些努力的背景下变得清晰起来。

同时，一种显著的力量在国际全基督教层面上出现，这需要更加详细的描述，因为它正在继续着并提供了许多在这里提出的建议执行的机会。在 1997 年，第 23 届互联网纾改革宗教会联邦全体理事会在匈牙利的德布勒森举行。在此之前，一些地区性准备会议已经举行，包括在赞比亚的基特韦。后者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今天，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被神圣化而且被提升到皇座的位置。它已经改变了创造它的人所居住的地方。通过向人类重新解释它的定义，它已经成了人类的创造者。于是它也篡夺了上帝的主权，并主张只属于上帝的自由。作为我们基督徒们，这也

① 凯罗斯·尤罗帕和教堂援助机构、不同的宗教神职仪式、世界教会会议和世界宗教改革议会一起组织了几个工作室和会议来准备这个话题的工作。Kairos Europa Documentation, 1999, 2000。

提出了偶像崇拜的问题和对谁忠诚的问题，是对上帝还是对财神。……因为这个不公平的经济秩序造成了非洲贫穷的现实已经超越了一种伦理问题，而变成了神学问题，这是我们痛苦的结论。现在形成了一种忏悔状态。穷人的福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经济的机制下变得危如累卵。

这意味着，这种非洲的讨论把全球化的经济不平等和对自然的破坏，归到了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的范畴里来了。它号召互联网纾改革宗教会联邦大会来动员基督教组织运动以及南半球其他和基督教组织团结的运动。

德布勒森大会在 1997 年对这种号召作出了回应，并决定邀请其成员基督教组织参加反对全球化经济不公平和破坏自然的忏悔过程。这会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认识、教育、承认和行动的过程。1998 年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世界教会议会第八次大会对忏悔过程表示了欢迎，并号召成员基督教组织参加。这里有两个计划上的重点：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战胜暴力、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团结十年计划。

所有这些都代表了 1983 年在温哥华举行的第六届

世界教会议会所体现的精神的继续（见杜赫罗和列克 1989）。同时，在忏悔过程中，互联网纾改革宗教会联邦和世界教会议会也加强了合作。其他的世界性团体，比如路德教会世界联盟也加入了这一进程。世界不同地区的成员基督教组织和基督教理事会也开始对德布勒森和哈拉雷的号召报以积极的回应。所有的大洲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磋商。

- 在亚洲，1999 年 11 月在曼谷和汉城举行了关于经济全球化后果的研讨会。曼谷的研讨会向基督教组织、宗教团体、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信息，号召他们采取明显的行动来反对经济不公平和环境退化。^①

- 第二次研讨会在 2001 年 6 月的布达佩斯举行，主要议题是经济全球化对中欧和东欧造成的结果。这次研讨会所释放的信息是“服务于上帝了，不是财神”。^②

- 太平洋地区 2001 年 8 月在斐济举行了磋商会，主题是“希望之岛：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选择。”^③

① 互联网纾改革宗教会联邦的文件 2000。这些文件请参阅 www.kairoseuropa.de。

② 世界教会议会的文件，关于全球化的第 7 卷。见《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团结评述》第 53 卷，第四期，日内瓦，2001 年 10 月。

③ 同注②。

• 在西欧举行了一个全球性的讨论会，主题是“全球化面前的忠实社团和社会运动”（见杜赫罗 2002）。这次讨论会的组织者是由世界教会议会、互联网纾改革宗教会联邦和凯罗斯·尤罗帕组成的一个联盟，这是关于经济公平的一个基督教基层网络，由德国的一个大支持团体援助。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宗教团体的代表也完全同意这种批评以及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所发出的正面的倡议。在让基督教组织为民主控制金融市场而工作的过程中，凯罗斯·尤罗帕组织了工场制造出用于教育和礼拜的材料（尤罗帕 1999，2000，2001 以及 2002）。高潮是 2002 年 6 月在荷兰举行的会议，主题是“经济为生命服务。这是西欧基督教组织对全球化和金融制度的反应”。^①

• 2003 年 4 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洲磋商会，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世界教会议会代表参加的南半球成员论坛。前者的主题是“生命全球化”。最后发表的文件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宣

^① 凯罗斯·尤罗帕 2003，以及 www.kairoseuropa.de。

布“够了”、“够了就是够了”。后者规划了最重要的“全球生命危机的宗教立场”，反对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宗教事务的意识形态并委托南半球的基督教组织为新的选择而工作（尤罗帕 2003）。

- 更进一步的磋商正在北美洲进行计划。

这个过程的组织目标就是 2004 年的世界宗教改革议会大会和 2006 年将要召开的世界教会议会大会。主要问题是基督教组织是否会在这一过程中从精神上、神学上以及实践上变成“忏悔的基督教组织”。他们能不能在生命和公平的上帝的圣经传统的基础上证明他们属于耶稣救世主？在（自我）破坏和完全市场面前，他们如何这样做？

成为一个忏悔的基督教组织？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和基督教组织对纳粹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挑战在同一水平上，那么它就是一种“存在”，而不仅仅是基督教组织的行动（见杜赫罗 1987）。这是一个基督教组织是否是真正的基督教组织的问题。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这里的问题，就像丹尼尔的书或者圣约翰的启示中所说的那样，是信徒社区能否适应反上帝、

极权主义帝国，还是对上帝忠诚，直到殉难（见理查德 1995）。迪特利希·潘霍华是在纳粹主义下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神学者，他通过直到今天还适用的方法研究了所有基督教组织问题中最困难的几个问题。^① 他的论证——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面前——可以用以下的文字概括。

关于国家训令，有两种基本的曲解：用神学的术语来说，对政府或“国家”的角色影响“太少”或“太多”。在纳粹国家的情况下，两种形式被等同了起来。在没有保护一些公民方面，对国家影响“太小”，实际上还在迫害他们，特别是犹太人；当它宣布自己的绝对权威并成为偶像方面，对国家影响“太大”。在正常情况下，基督教组织和国家只有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国家在这种意义上变得反常的话，基督教组织也并不倾向于成为牺牲品，就像倒在醉汉驾驶的汽车轮子之间——它必须阻止轮子行进的计划。^②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忏悔状态，也就是说，基督教组织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决定。潘霍华期盼着基督教组织采取强硬的立场，和由此

① 见潘霍华 1933: 349. 潘霍华的著作由费城堡垒出版社 (Fortress Press) 翻译并出版。这个版本显示原始的文版的卷数和页码，我们正在使用。

② 潘霍华在给路德的一幅图画中说了这番话，并被挪威的主教贝格拉夫在抵抗纳粹占领的时候所引用。

带来的所有结果。忏悔者和《巴门宣言》（1934）一起这样做。然后，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建成忏悔的基督教组织，因为制度化的德国福音教会是一个帝国基督教组织，有一个帝国主教，和纳粹主义相符合。

这就导致了“基督教社会的问题”。邦赫费尔（1936）。邦赫费尔在一开始并没有问谁属于真正的基督教组织。相反，他说，基督教组织必须和真实生活中看得见的耶稣较量。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将决定他们是否属于忏悔的基督教组织，还是属于飘忽不定或虚假的基督教组织。因此，这种忏悔必须是一种强烈的邀请，在宗教会议上必须将忏悔贯穿于毫无隐讳的决策的过程之中。这正是现在全球基督教的忏悔过程的意义所在。潘霍华走得更远，他说，当决定被作出来以后：“那些有意和忏悔的基督教组织脱离的人将和超度相脱离”。他通过基督教组织对忏悔的基督教组织的反应把飘忽不定和虚假的基督教组织区分开来。飘忽不定的基督教组织为了避免冲突会避开最终的决定；而在这里忏悔的基督教组织必须和它保持强烈的对话。虚假的基督教组织则会通过反常的国家积极地参与到对真正的基督教组织的迫害中，并因此而暴露出来。

那么在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的整体市场下这些意

味着什么呢？而且这种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今天的情况与纳粹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相比更加困难，尽管那里的斗争对基督徒来说已经足够困难的了。为什么这种情况看起来是如此不容易被抓住呢？在德国法庭面前，弗莱斯勒庭长公开问被告：“你会服从谁的命令？是耶稣救世主还是阿道夫·希特勒？”而希特勒通过他的所说所写以及他想要除去犹太人的行为把这个问题变得很简单。对于每一个长眼睛的人来说，这都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种既有“太多”又有“太少”的国家行为。贝特格（1982）后来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种‘只有’的事情——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帝国，”或者说“救世主自己”，就像《巴门宣言》所声明的那样。后来，在南非，那些改革和路德教会的白人基督徒非常明显地表示他们想要种族隔离，也就是分离。这不仅发生在公共和社会的场合下，也发生在基督教组织里。黑人和印第安人口很明显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

作为对比，在跨国公司和商业银行管理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或者日本政府里的什么人能够说：“我想通过我的商业行为和决定来向每天因饥饿而死亡的10万人作贡献，向物种的灭绝、全球变暖及其由此

产生的飓风、洪水以及淹没在海洋中的岛和海滩，向沙漠的扩大作出贡献？”没有人能说（除非那些完全是无情的嘲讽）。他们都说：我们想要最好的——国家福利、减少贫困、环境科技等等。但是他们又说——就像美国代表最近在联合国关于发展筹资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种财富只有在您接受了（全球化）资本主义以后才能够获得。但这就意味着通过在全球市场绝对资本机制进行产权的积累。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无意识的、间接的结果都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或者称为“附带损害”。

所以，这就是现在与纳粹和种族隔离时代的区别：纳粹和种族隔离时通过有意的、看得见听得着的行动进行排斥和谋杀、隔离和歧视，而在全世界市场是有意地保证财富的制度的间接结果，并承认其绝对性和不可替代性，它毁坏了生活，造成了人类和自然的死亡。

对这种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原则是很明确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哈耶克在其第三章中所说过的话：“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为了维持生活而被最大限度降低的道德——这也并不是为了维持所有人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体生活来拯救其他大部分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道德的惟一准则就是那些能够导致‘对生命的一种考虑’：产权和合同。”换句话说，在纯粹市场经济

下，只有那些拥有私人产权和/或有能力订立合同（例如工人）有生活的权利。私人产权和合同是市场的两个支柱。很少一部分人拥有私人产权作为生产资料，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出卖自己劳动力合同的权利，因为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下，国家没有能力让产权服从于为失败者的利益考虑的社会政策。因为所有这些原因，这种制度意味着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排斥，让更多的人死亡。

因此，仅仅从道德层面上对现在这场灾难进行打击或把它归为国际邪恶行为或活动者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意识到把私人产权当作绝对的必需品会导致人类和自然生活的毁灭，特别是如果和绝对市场上为货币积累目的出现的资本机制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从制度上降低按照公共利益标准来规范经济的政治上的失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动者不负任何责任。只是他们的责任并不是单个人的。他们并不能通过自己个人更好的行为来拯救这个制度带来的结果。一个公司的拥有者从竞争市场上招聘任意多的员工，他也将会成为失败者，而制度并未因此而改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斯·韦伯谈到了“非道德”市场。负责人的行

为将会被引导去改变这种制度，并把生活和公共利益变成所有人都同意的标准，而不是“中立”的在自动调节的市场上私人产权利益的最大化。按照所述原则，接下来还应该有实际的步骤。现在需要的是拒绝改变一种制度，它通过其间接结果表示公开杀人是道德上的错误的制度——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行动者必须因此受到谴责，而不是他们在这种制度下的个人行动。

对于基督教组织来说，这是最困难的挑战。这种制度的根源在几个世纪以来深深埋在我们的社会里，并置于我们的灵魂之中，这种制度现在正在显现它致命的结果。在各个学校和大学里，它们继续向我们年轻一代灌输。媒体完全被这种产权和竞争驱动制度的语言和思想结构所左右，因为他们收入的来源是号召人类牺牲的资本的神，有几个例外。一些北半球的基督教组织甚至给公关公司付费，让它们帮助把自己变成更易于为消费者接受并保留有钱的成员。

忏悔行为开始于对我们自己罪过和共犯的忏悔。耶稣救世主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没有为帮助受害者所做的事情——使得我们非常悲伤，这也导致了心理的改变和接下来的冲突。潘霍华代表基督教组织按照《十戒》所作的罪过忏悔，包括如下几点：

关于第一戒，“基督教组织……经常拒绝其保护和安慰的职责。于是他们经常拒绝给予那些被驱逐者和被轻视者他们应该得到的仁慈。基督教组织在它本应该叫喊的时候却保持沉默，因为无辜者的鲜血正在向天堂哭泣。”

关于第三戒，关于安息日：基督教组织“因为得不到休息的人、焦虑的人以及在休息的时候仍在工作的人而有了罪过。”

关于第七戒，关于偷盗：“基督教组织应该忏悔，在穷人被剥削和被抢劫的时候，强者的财富和腐败增加的时候，基督教组织只是静静地袖手旁观。”

总而言之，“基督教组织承认自己触犯了所有的十戒，它也承认背叛了救世主。”

- 它不能为寻求真理的上帝的真理作证，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都能承认它起源于这种真理；

- 它没有宣布所有人类规律必须看见的上帝的正直作为它自己的本质；

- 它没有能够把上帝的爱心变得可信，而让所有人的经济活动都能够从它那里得到委托（潘霍华 1940 -

43: 129)。

科学，在这里是自主法律的经济学和市场的自我调节，法律，把独占的产权绝对化，经济，适合于资本的排他性积累——在这里都和上帝的真理、所有人的公正和对生命的关爱相抵触。能否有一个清楚一点的关于今天选择财神还是选择上帝的意义的说法？为什么基督教组织不能加入到这种对罪过的忏悔中？比起经历了导致1929年经典的自由主义的潘霍华来，在事实和结果上是不是已经变得更加清楚了？当然，他知道一些基督教组织能够很少知道的——恶魔具有了像天使一样的明亮而善良的外形。他说：“恶魔的伪装让所有的道德概念变得混淆起来。恶魔以明亮、慈善、历史必须性和社会公平的形式出现，完全迷惑了从我们传统道德概念世界中的人。对于以圣经为生的基督徒来说，这是恶魔深不可测的邪恶的证据”（潘霍华 1943 - 45）。

基督教组织已经适应了现在的市场意识形态及其道德规范，他们没有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谈论“抗击贫困”，却通过加强结构性调整计划继续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和世界市场行动者的资本积累，制造并加深了系统的贫困（见世界教会议会 2001）；他们没有领会到一种把以货币来衡量的增长作为成功标准的经济模

式所带来的灾难，并故意把这种成功真实的结果排除在外，作为对人类和环境的间接影响。只有当基督教组织转向圣经和真实的受害者，他们才能够抓住潘霍华所看到的恶魔。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社会 and 心理学（也是神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穆勒·法伦贺斯（1995）曾经在美国心理学家里夫顿研究之后作了重要的强调。当我们感觉到整体市场把世间万物都变成资本以后，随之到来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的恐慌就会变得麻痹。根据穆勒·法伦贺斯的观点，在这里惟一有所帮助的是圣灵的经历，精神上的权利。它安慰我们（而不是抽象地像法律一样地命令），能给我们带来所有的真理，而且这些真理能够给我们自由（见约翰 8：32）。圣灵精神的涌现把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带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那里即使是产权也能够被共享。

所以潘霍华的罪过忏悔把上帝自由赋予的真理、公平、关爱的经历和主张放到了首要的位置。用神学的行话说，这意味着：福音，对穷人的好消息，要比法律优先，而法律上必要的规定失去了它们的抽象意义和正在枯萎的特点，并且展现了它们对真实生命的重要性。上帝的真理把对威胁的心神不安的恐惧，转化成对真正威

胁生活的事物的恐惧。上帝的正直证明授权人们看见并抓住行动的真实机遇。上帝的慷慨的关心表现了我们这个地球已经为我们的生活装满了什么，只要货币和产权积累不会带来缺乏和困苦。

非常荒谬的是，基督教组织可以拥有上帝的真理、公平和关爱精神上的经历，只要它和为生存而战的这种制度的受害者站在一起，而不是和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站在一起。在希伯来奴隶期间上帝已经以上帝的名义在“哭泣的人们”的情况下展示了自己（Exod.3），“我在那里”（I am there）（耶和华），和你们在一起，并不和法老王在一起，我要把你们从他那里解救出来。耶稣的一生也恰好展示了这些。他出现在罗马帝国及其当地同党的受害者当中，传播治愈的、舒适的、勇敢的新生活——这种生活传播性非常强烈，一些精英也受到了感染。

很明显，把自己的位置转向受害者一方——在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南非种族隔离下的黑人、今天被所有市场排斥的人以及这个地球上注定要失败的人和生物——将继续让基督教组织经历上帝的真理、公正和关爱。从这一点上说，对罪过的忏悔可以摆脱桎梏而获取自由。

对罪过的忏悔典型的结构并不只是针对过去的罪过。它还包括拒绝今天被认为和被谴责为罪过的恶魔。它不仅是道德上的恶魔，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过把自己绝对化，它还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偶像。潘霍华是这样说的（根据他的讲座要点）：

1. 帝国主义宗教。人类就是上帝。它是东西方的使命，权利观念的使命。

2. 资本主义者宗教。资本主义和拯救的确定性是被同一种牛奶所抚养的一对兄弟。他们都是（1）对产权的夺取，（2）对上帝的争夺。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救世主也是有道理的（潘霍华 1932 - 33: 159）。

带着令人惊奇的清晰度和精确度，他来到了问题的中心；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不仅作为政治经济权力，还作为在宗教背景下的权力。

关于“帝国主义宗教”，我们非常惊骇地看到，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上帝非常直接地认同了美国。到处都是旗子和海报，写着“天佑美国”。任何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也就是不和上帝站在一起的人——都是魔鬼。

至于“资本主义宗教”，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

就像在他之前的罗纳德·里根一样，得到了道德上的多数和新圣灵降临运动的选票。然后就有了“繁荣宗教”的传教士。如果他们很富有，他们就觉得被上帝所选中；如果很穷，他们就祈祷变得富有。这种精神正在席卷中美洲和南美洲。但是，我们欧洲就能够抵挡吗？当然不能。在这里的直接宗教性资本主义合法化比较低。然而，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习惯了把我们的信仰限定在私人的范围内，并把它看作私人产权。我们占领了上帝的位置，就像我们占有了物体（和人类），潘霍华说。通过这种虔诚，个人基督徒和基督教组织把以竞争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合法化，甚至在辩护的时候没有说一个字。

在忏悔过程（状态）中，基督教组织必须公开地、毫不含糊地反对：

1. 在权力偶像的支配下充满了帝国及其公共机构的全球市场。这种市场把在私人产权和合同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机制绝对化，把自己偶像化并把那些既没有产权又没有出卖劳动力合同的人排出在外。它正在越来越破坏人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地球——最终，它也将毁灭自己。

2. 所有的宗教，主要是虔诚和信仰的个人主义形式，它——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绝对

权威意义上的权力合法化，特别是帝国主义权力，以及产权积累，特别是政治上缺乏管理的、以此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机制。

但是，忏悔不仅仅是对上帝的真理、公平和关爱在口头上的肯定，它不光是对罪过的忏悔，对破坏生命的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偶像的拒绝。所有这些都必须达到人心的改变，没有这些，所有的对外行动将缺乏可信度。当产权依靠整体市场与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时候，作为基督教组织，我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改变方向？

1934年的《巴门宣言》在它的第三篇文章里阐明了这一点。它认为，一般而言，基督教组织，特别是在忏悔发生的时候，应当反映“这是他（基督徒）个人”这样一个事实（杜赫罗 1987 第 6 章）——不仅在其宣言中，还要在形式中，也就是，在其顺序和组成机构的行为上。在这种环境中，即全球市场在结构上服从于资本产权积累，并因此会破坏生命和公共利益，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德国，可使基督教组织的存款被用来“为了利益”而投资，许多基督教组织在其条例中都有这样的规定。所以那些负责金融的人在用所有德国的基督教组织储备在一起几十亿欧元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毫无有悖良心的感觉。

因此，在忏悔过程中的基督教组织必须采取实际的步骤。

1. 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条例，使得他们的储蓄不被用来做赢利性投资，而要负起社会和生态责任。

在国家对货币经济实行社会调节的年代，旧条例明显地负有管理的责任。然而，全球货币市场的缺乏管理和自由主义化的目标恰恰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抛弃所有的社会和生态方面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有利可图的投资者和基督教组织不能一致的原因。路德说获利的基督教组织不应该再把自己称为基督教组织，因为这正是参与高利贷活动。今天，这则意味着接受多于现金所能产生的利益的基督教组织正在参与高利贷，并在滥用救世主的名义。

2. 基督教组织必须立即从所有的商业银行中把他们的钱取出来，这些商业银行从事的是在交易市场上为产权积累而进行金融交易。基督教组织应该把钱投进和他们合作的、不在世界市场上运作的当地的和地区性的银行。或者其他的利率不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率的银行。这样的银行很负责地投资到社会和生态保护事业。

通过把基金从商业银行里撤出，基督教组织也不能说那些在银行工作的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是全球市场

的货币和金融交易不再遵从对社会和生命的结构性承诺。通过从社会和生态上的负责人的再投资，基督教组织会给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作为可能的选择，并说明对他们的需要。这样，他们可以和他们古老的合作性的传统相联系。例如在德国的基督教组织里，还有合作性的“基督教组织会众准备金”可以用来做建筑项目。基督教组织会众所得到的利息和他们把基金借给别人用于一项建筑项目所花费的费用是一样的，通常是2%~3%。通过合作性的行动，他们保留了这种利息和他们为正常借贷而必须支付的利息的差额。合作性的当地和地区性储蓄，过去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存款就保留在这个地区。今天，这种方案经常屈从于模仿商业银行做法的诱惑。个人监测必须说明他们是否对基督教组织的标准满意。有了可选择的银行，这就变得更加明显，尽管有些银行只是尊重生态标准，而不是利息的水平。

3. 基督教组织必须卖掉他们持有的、能够通过全球市场规律获利的公司股票，也就是没有对社会和生活的承诺，并只投资到对生态负责的社会经济中，也就是不提供以牺牲劳动人们和环境为代价的不劳而获的利润。

通过把投资从跨国公司里撤出，基督教组织不能说他们的工作人员的行动比其他机构里的人员的行动更加

不道德。然而他们可以说，对产权所有制的社会责任越来越有免疫力的全球市场正在通过竞争强迫他们服务于股东的价值，而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它们通过转移价格操纵、金融交易、逃避税务和导致过剩的合并。例如西门子集团，其 70% 的利益是来自金融交易，只有 30% 是来自生产性工作。相反，和社会经济中的生态导向的公司合作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表示的确有另一种选择。这个领域包括微观公司（micro-companies）的发展项目，例如通过奥依克信贷（Oikocredit）共同筹资，奥依克信贷是全球基督教会的发展合作社区。

4. 基督教组织应该号召其会众和成员在银行和公司问题上也这样做。

很明显，忏悔过程不能把基督教组织看成大的公共机构。会众和成员是基督教组织，而且，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这些机构只是那些在教堂里的人的服务设施。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的基督教组织斗争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告诉我们，有的决定只能自下而上地达成。上述步骤的公布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一种感觉，这种对制度的挑战本身就会对受害者的斗争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给予巨大的支持。甚至在提出任何确切的经济或者政治要求以前，基督教组织会通过这种行动产生巨大的公共冲

击。路德把它称为“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在这种环境下指的是经济和政治公共机构。人们能够看到，资本产权的积累不需要成为商业活动的目标，而且后者可以支撑生命并为公共利益服务。

5. 基督教组织土地产权问题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处理。教堂是不是房地产，包括土地和建筑（租金），是被用作通常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产权积累还是为生命和公共利益？这个话题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很有意义，在这些国家里，财富和权力在传统上是依靠大土地所有权获得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是想简单地提到，今天的秩序和行为必须用生命和公共利益的标准来衡量，而且，如果需要，应该加以改变。

关于新的产权制度对基督教组织的政治要求

除了人为的现在全球经济秩序不合法之外，对我们自己的参与表示忏悔并结束我们的参与，并把另一种供选择的经济行动作为象征，基督教组织很少有机会直接影响经济。然而，既然这个问题恰恰就出在政策制定者并不设想以他们的宪法责任来指导社会和生态意义上的经济，基督教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解决这

样的问题。用潘霍华的神学范畴的话来说，这正好就是基督教组织必须做出反应的国家行为“太少”。通过躲在全球化强制性神化的后面，国家允许人们被排斥在付薪工作和生存的尊严之外。它还允许赋税负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被雇佣者的身上，而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资产所有者越来越多地享受税务减免和补贴。更进一步说，它允许实际利益大大超过增长率，以致货币产权从实际经济走向投机。它允许大大超过需要的税务规避和逃避。它允许通过申请种子和生命形式的专利，地球上公共的资源转移到了私人的手里，而且为了资本积累而极其危险地被控制着。它允许公共服务，比如水供应和交通，以相同的利益被私有化，让许多国家里的穷人不再能负担起这种服务。

然而，也有许多和基督教组织相关的“太多”，至少在富有的国家里。这是因为所有这些间接的结果是在以产权为基础的全球市场的资本积累的全方位竞争引起的，而且它的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违反规定是受到八国集团政府通过他们的非民主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这是富国政府的责任，特别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霸权的责任。

但是欧洲政府也不能简单地撤退，原因是美国的控制。如果毅然决然地行动起来，并在欧盟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体内部一起投票，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内使用它们的投票份额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承诺，在美国也会有基层团体来经常提醒他们的政府履行它的责任。而且，他们现在还有许多被经常敲诈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他们一边。

当然，不同国家的宪法上的不同需要应被考虑。不过，基督教组织，特别是在有着福利国家传统的欧洲，能够公开挑战他们的政府来结束和改变他们新制定的削减产权的社会承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们也可以指出这种要求是非常紧急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全球市场的间接结果正在把毁灭变成自我毁灭。这也引起了下面的需求（有意表现出普通的方向）：

1. 基督教组织应该号召他们的政府（如果适当的话，是欧盟）结束关于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那里他们从结构上废除了产权所有制对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制度性承诺；所有的生命都要受资本主义所有权积累这惟一的目的所左右，并因此继续受到毁坏。为了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结构性政治学在经济利益上的转变，他们首先应该要求：

- 促进当地和地区层面的市政和合作性所有制，以便给人们组织生产和服务来满足他们在各自生态和文化条件背景下基本所需的机会；

- 立即结束世界贸易组织内部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这种谈判的目标是让公共服务私有化；水供应的私有化会产生致命的结果。因为贫穷国家把水转变成资本主义产权积累的方式会把穷人排挤出最基本的人权之外，即对新鲜水的获得；

- 废除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知识产权专利在种子和生命形式上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定，特别是阻止人们和他们的基因被注册专利、危险的世界食物危机以及商业操纵人类的未来；

- 增加无债公共货币的份额来对应银行通过信用机制产生的以债务为基础的货币；

- 把保护环境的财物转移到公共托管或者合作公共所有制，对其经济上的使用要有严格的社会和生态方面要求；

- 把个人生产资料和社会有用性的严格标准联系起来，鼓励被雇佣者和其他股票拥有者参与决策，特别促进在简单品和耐用品的生产上的投资；

- 在企业家对公共利益贡献做出宪法性承诺的基础上，重新引进明显进步的对企业家活动和资产的税收制

度，并把这种制度扩展到全球范围；

- 结束 1979 年实施的货币主义政策并把交易市场上的利率重新规范，把真实利息调整到真实增长的水平；

- 一致抗击金融、特别是货币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使用各种手段，比如托宾税收、资本流动控制和衍生事项的规范；

- 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防止避税并一致打击逃税，因为税收的流失通过合成公共债务直接和间接地损害了公共利益；

- 立即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为了给资本所有制支付利息，这个政策把整个社会带入了贫困和苦难。另外还要取消所有非法的（“讨厌的”）债务；

- 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分阶段把国际体系重新构造成民主的制度，这需要相应的改革。

2. 如果政府继续不沿着前述的方向履行对公共利益有好处的宪法性产权承诺，并继续通过资本主义者和全球市场机制否认这个中心宪法性规定，基督教组织应该宣布他们正在采取适当的行动，比如和其他相关组织联手，起诉到联邦宪法法院（以德国为例）（见第 4 章）。

3. 他们应该超越现存的吸纳法和法律实践，建议把土地转移到公共、市政、和国家所有制。

所有的这些建议都是要让经济、特别是市场来服务所有人的自我依靠的生活，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以及我们对地球。他们要把经济从一种强迫过程中解放出来，这种强迫过程把用自己富有的资源、他们的文化和地球转变成私人资本产权积累的工具，这一过程会间接导致所有生命的毁灭，并最终造成自我毁灭。

这些号召和建议并不是要求放弃法律。他们是要展示在忏悔过程中各种不同基督教组织可以用来发展适合他们各自层面的要求的方向和目标。在这一点上他们所承担的任何事情将会有助于提升公众意识以及反思和转变的必要过程。首先，这将加强这个制度受害者的斗争和社会运动。

很明显，在基督教组织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冲突可以预见。首先，由于一些组织成员仍然相信他们可以继续和胜利者站在一起，至少在北半球的一些基督教组织将努力阻止这些方面的一些决定。在这种制度下，没有长期的胜利者。为了表明基督教组织如何组织这种必要的学习和决定的过程，我愿意引用美国的路德教会，1977年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第六届路德教会世界联盟大会上决定种族隔离形成了一种忏悔状态。这个例子说明，谈论“这个”一般意义上的

基督教组织非常抽象。这个基督教组织有五个“社会表现”（见杜赫罗 1989：179）：地区性会众聚会、弟子团体（比如宗教秩序）、地区性基督教组织协会、世界基督教会结构和以隐藏和非故意形式出现的对邻居的基本需要做出反应的人们。关于基督教组织中真实弟子身份必要的冲突在这些社会表现中间相互交换。

在 1977 年大会之后，一个南部非洲路德教会联盟在美国成立。忠诚的基督教组织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小组。他们做出了一项可供讨论的提议，并把它们提交到尽可能多的地区性宗教大会上。这个提议包含了以下三点：（1）我们已经发现，在神学的基础上（已经在此文本中描述），关于种族隔离和以前的纳粹主义，我们是在一种“忏悔状态”中。我们肯定这一决定。（2）为了表明立场，我们将从那些不愿意和南非中断商业往来的银行和公司中撤出。（3）我们将让我们的国家宗教大会采取这些决定。^① 路德教会联盟赢得了所有地区性宗教大会 2/3 的投票。尽管整个基督教组织政府反对它，而且财务主管也辞职了，但是美国路德教会全国

① 简要地说，地区级和国家级大会被推荐给出：“美国的路德教会南部非洲忏悔状态存在情况的正式确认，并把投资从与南非有关的公司和银行撤出作为采取忠实立场的坚定的征兆。”

性宗教大会还是批准了这项提议。这说明在忏悔和行动以前必然有一个认识和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真正危如累卵的是作为在圣经基础上的基督教组织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或者政治细节问题，那么它就不能够只成为一个过程。在忏悔过程的概念被提出来之后，贝特格（在 1983 年 2 月 18 日）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

（忏悔）过程这个概念很有帮助，但它不能够代替忏悔状态。只有有了后者（这也是很难被遗忘的），它才能表达出有一个必然的带有不可避免的时期的史前史，然后也有一个带有接纳和结果的史后史——也和金融有关，但在中央的是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结束了那些无承诺争论。这个概念的使用肯定是一个缓和剂——为什么不呢，为了不再高估自己！——但它不应该不断地谈论以后某一天会有用的决定，谈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向左或向右的分岔通向真正的或伪装的教堂，而不再是“摇摆不定的”教堂。（对不起，我肯定你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比我理解得更好！）谁会想像自己能够超越各自的诱惑所带来的威胁而变成伪装的教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反应的教堂的如此不同的社会表现

这一难题中，可能对区分伪装的教堂和摇摆不定的教堂有所帮助？

在南非，路德和改革教会的忏悔斗争导致了对种族隔离的胜利（也是对基督教组织令人信服性的胜利！）。然而，现在所有的人都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得不遭受资本所有制、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政所带来的痛苦——这种专政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

南非并不是惟一的例子。整个世界都在受到这种痛苦。处在危险之中的恰好是对市场的胜利，市场已经把私人产权绝对化，并给自己附加了更多的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手段。这必须是可能的——毕竟，纳粹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已经被打败了。现在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基督教组织能够用为了生命的产权承诺和拓展生命的经济来代替（自我）破坏的“经济恐惧”。他们可以通过坚持他们作为基督教组织的美德的明确立场这样做。他们会不会冒着权利和财富冲突的危险，即使他们不得不付出代价？虽然这种代价经常会等待那些踏着耶稣的脚印，站起来直面把产权合法化的帝国、大产权和寺庙（马可福音 8：27 - 38）。

附录一

拒绝生命专利化

关于 WTO 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土著人的声明

在 1999 年 7 月 25 日日内瓦由 87 名来自土著人组织、民间机构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网络的代表通过。

拒绝生命专利化

我们，来自全世界的土著人民，相信，除了自然本身，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自然界所存在的事物。一个人

类不能拥有他自己的母亲。人类是自然母亲的一部分，我们什么都没有创造，所以我们决不能对本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主张所有权。但是，西方法定产权政权一次又一次地强加给我们，和我们的宇宙观与价值观相矛盾。

我们非常遗憾而且焦虑地认为，WTO 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27.3 (b) 条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诋毁和毁坏我们对我们的文化和知识遗产的权利，我们的植物、动物甚至人类遗传资源，并歧视我们的土著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一条规定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之间人为制造出区别，并为制造植物和动物给“基本生物”和“微生物加工”之家制造区别。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所有这些都是生命形式和生命创造过程，它们是神圣的，而且不应该变成私人拥有的主体。^①

我们知道在 WTO 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所定义的知识产权是把独占的权利赋予个人或者法人（比如跨国公司），他们能够证明他们所做的发明或革新是不平常的，包含了一个革新的步骤，并能够被工业化应用。把这种产权形式应用到生物上，并把它们作为机械或工业发明，是不合适的。土著人民的知识 and 文

① 全文请见附录一。

化遗产是经过几代人集体累积演变而来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主张发明或发现了药用植物、种子或其他生物。

这两种知识体系的内在的冲突以及它们被保护和使用的方 式将造成我们的商业价值观和商业行为更进一步的瓦解。它也将导致不同的土著社会之间在谁拥有某一项知识或革新所有权上的内斗。更进一步说，它恰恰违反了土著精神的本质，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是神圣的。

作为土著人民，我们知道 WTO 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各种暗示。它将导致把我们传统的药用植物和种子，以及我们土著人民对医学、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保存的知识据为己有。它将破坏食物安全，因为我们土著社会所依靠的多样性和农业产品将会被侵蚀并被个人、私人和外国利益集团所控制。另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定将会从根本上削弱我们对遗传和生物资源的使用和控制；抢劫我们的资源和领土；并会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考虑到 WTO 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第 27.3 (b) 条，于是，我们的建议如下：

这一条应该被修改成为无条件地禁止对生命形式进行专利注册。

对植物多样性通过专利或一种独特的系统，或者通过两者的结合进行保护的規定应该被修改并进一步地阐述。它应该：

- 保证将要产生的独特的系统能够保护土著人民和农民的知识及革新以及在农耕、农业、健康和医疗以及多样性的保存；

- 依靠土著人的方法和习惯规律保护知识和遗产以及生物多样性；

- 考虑到土著人民和农民亟需保存、共享和交换种子，以及收获、耕种和使用药用植物这种传统习惯的权利；

- 在研究人员、学术机构和公司等使用土著的种子、药用植物和相关方面知识的时候，防止把它们占为己有、偷盗或者盗用；

- 防止通过采矿、单一作物商业化种植、筑坝等工程破坏和改变土著人民富有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并承认土著人民对这些土地和领土的权利；

现在这种形式的 WTO 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实施，将会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而且这种后果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这个协议应该被修改来禁止对生命形式专利化以及禁止对土著人民的知识及资源盗用势在必行。

附录二

科恰班巴宣言^①

我们，玻利维亚、加拿大、美国、印度和巴西的公民：农民、工人、土著人民、学生、自由职业者、环境保护论者、教育工作者、非政府组织、退休人员今天聚在一起，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保卫生命攸关的水的权利。在这里，在这座已经通过民事诉讼、勇气和牺牲，站起来像英雄一样面对公司、制度和政府的滥用以及破坏这种权利的贸易协定而重新获得了这种权利的城市里，用我们的自由和尊严，我们宣言如下：

^① 国际全球化论坛，2001年夏，旧金山。

为了生命的权利，为了对自然的尊敬以及我们祖先和人民的使用和传统，下面的宣言应该永远被宣布为地球赋予我们使用水的神圣的权利：

(1) 水属于地球和所有物种，对生命来说是神圣的，所以，世界上的水必须为所有子孙后代和相关的自然分布热被保存、回收、保护。

(2) 水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各级政府保护的一项公共信任；所以，它不应该被商品化、私有化以及以商业目的进行交易。这些权利应该被各级政府所铭记。特别要提到，这些原则必须用一项国际条约来保证是毋庸置疑的。

(3) 水最好是由当地社团和公民来保护，他们在保护和规范水资源方面，应该被看作是政府平等的伙伴。地球上的人是促进民主和保护水源的惟一的媒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全球化: 产权为民, 不为利 / [德] 乌尔里希·杜赫罗, [德] 弗朗兹·J. 欣克拉麦特著; 倪延硕, 肖炼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2

(全球化译丛)

ISBN 7-80190-836-8

I. 资… II. ①乌… ②弗… ③倪… ④肖… III. 金融资本-国际化-研究 IV. F0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499 号

资本全球化

——产权为民, 不为利

· 全球化译丛 ·

著 者 / [德] 乌尔里希·杜赫罗 [德] 弗朗兹·J. 欣克拉麦特
译 者 / 倪延硕 肖 炼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85117871
项 目 经 理 / 王 静
责 任 编 辑 / 王 静 王兴权
责 任 印 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2.5
字 数 / 195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836-8/D·253
著 作 权 合 同 / 图字 01-2005-2953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本学术著作展示了财产积累所驱动的缺乏管理的市场全球化给更多人带来的贫穷以及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毁坏……只有认识到产权的制约性特点，使产品的所有权民主化，并使得经济发展符合人类需要和保护地球的要求，才能阻止这种现象。

—— 格雷戈里·巴乌（麦吉尔大学、王后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书，它对备受争议的无节制全球市场行为实施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对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并从中汲取教训。

—— 马丁·科尔（第三世界网络负责人）

正如这本书所分析的那样，诚信的群体对于全球公平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他们也在行动。运用我们的分析把各方面因素组合起来，在世界公平所要求的团结、现实和诚信下共同前进，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这本书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迈出的一大进步。

—— 苏珊·乔治（作家、军人）

我强烈推荐这本书。当历史的发展对当今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有不同思考的时候，资本主义经常会给出“自然的”或者“神赐的”这样的理由。这本书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它展现了另一种可能的世界。

—— 丹尼斯·豪勒特（加拿大基督教正义倡议者）

ISBN 7-80190-836-8



9 787801 908360 >

ISBN 7-80190-836-8/D · 253

定价： 28.00元